热风学术

网刊

冬

2018 年 12 月

目录

热风学术网刊

点击文章标题 自动跳转至内容

4 编辑手记

7 内容提要

12 专题 _ 看不见的网络文学

13 编者按

17 行将隐失的证词
何平

27 情感的退场：网络文学发展中关键词的转换
许苗苗

34 “坏”与“顺从”：对网络文学主角形象演变的一个观察
周敏

45 关于网络文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反思与期待
黄艳明

特稿 _

54 普遍贫困的时代
姜来熙　许多 译　郝玉满 校

殊音 _

68 再暴力化与底层突围：当下内地电影中的暴力叙事及其文化嬗变
张登峰

83 他们坐的冲下了长江……
王晓明

87 我们如何讨论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
李许涛

（接下一页）

（接上一页）

点击文章标题 自动跳转至内容

n 地域 _

96 老钱做账
霍维克

来稿 _

112 献给当代平民女性的颂歌：评《江湖儿女》
刘亭亭

120 现场 _

123 “性别在燃烧”：国际文化研究学会
第 12 届 Crossroads 双年会性 / 别议题小组会议掠影
杨玲

131 乡村的全球性：Crossroads2018 参会感想
Jennifer Macasek

135 Crossroads2018 中的保洁阿姨
吴月　张少璞

书讯 _

140 “见人”与“见物”：“经济”的政治及其挑战
朱羽

165 《热风学术（网刊）》稿约

166 封面故事 & 网刊信息、下载方式

勘误：2018 年秋季刊中作者罗皓名的个人简介在部分刊物（9 月 17 日之前电邮及可下载刊物）中误刊为“明治大学教养设计研究科博士”，应为“明治大学教养设计研究科博士生，特此更正。

编辑手记

倘若被问起在当代生活中的感受，大概少不了“碎片”“流动”“即兴”“松散”之类的形容。这些词语刚被揪出来、命名新一轮现代性之时，还有不少人不太服气，现在却成了对当代生活的标准化描述。然而，翻检这一期的《热风学术》，却忍不住怀疑，这些习以为常的表达，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描述人们的现实感受，又有多少只是重复媒体教给我们的语言，并对海量信息掩埋之下正迅速集结，且越来越铁板一块的现实视而不见？

这是因为，本期文章，议论的主题不同，研判的对象迥异，从中国的网络文学到韩国的社会运动，从影视文本对底层暴力的再现，到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的社会舆论机制。但各自思考和分析的最终指向，却是同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如果说，在过去，看多了中国的社会新闻，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把它想象成一只运转已久、积累了太多“怨念”和矛盾，即便“铜墙铁壁”，也总是一不小心就“戾气”侧漏的高压锅。那么，现在，壁厚而漏气的高压锅，远不止中国这一只。“戾气”侧漏乃至喷涌，已经成为金融危机十年之后，全球面临的普遍状况。于是，并非太平世界，环球却也同此凉热了。中国的现实和全球的状况，彼此的病症和病理，更是日益同步、紧密呼应。这种同步和呼应，既意味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正被前所未有地严密组织起来，在散乱即兴的生活碎片之下，是体制和资本不断增生的钢筋铁骨，也意味着，壁厚而漏气的警报，势必越来越频繁。你经不住要怀疑，这种日趋一致、越是厚壁越是漏气的高压锅模式，到底要把人们挤压 / 喷射向哪里？

专题《看不见的网络文学》能赶在 2018 年最后一期推出，是特约编辑许苗苗的功劳。这一专题的野心，是要在“网络文学 20 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无论是官方还是资本，都隆重庆贺着的——时间节点上，给出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无论是何平老师对于网络文学更易消失，也更易被后来者以历史之名“改编”和遗忘的警告，还是苗苗对强大的政府之手的记录和对商业资本的警惕之心，都意味着，周敏老师谈论的新一代“好人”/“顺民”的兴起与流行，绝非偶然。来自“晋江文学”黄艳明的报告，更是从网站运营者的角度，详细记录了这一历程。在阅读它们的过程中，不断联想起雷蒙·威廉斯的概念：“选择性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和信念——资本的、政治的、大众趣味的、文学的，最终沙里淘金，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档案？而百年之后的人们，又将如何评定这其中的功过是非、美丑高下呢？

本期“特稿”刊登的，是姜来熙老师在 Crossroads2018 青年场上的主旨演讲《普遍贫困的时代》。他的讨论，依据是韩国社会的现实状况。然而，这种戾气越来越重，由差异而来的针锋相对、彼此仇视，显然不是韩国的特殊状况，而是全球右转中颇为普遍的现象。类似的不安和警觉，我们也可以在“殊音”一栏的两篇文章中读到。一篇是讨论当代影视作品中底层再暴力化的问题（张登峰：《再暴力化与底层突围》），而另一篇则分析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中社会舆论话语的基本走向（王晓明：《他们坐的冲下了长江……》）。

“现场”呈现的，是今年 8 月在上海大学举行的国际文化研究双年会的状况。作为大会的承办者，在筹办、组织和实际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很高兴地发现，在越来越多青年学人的眼中，“文化研究”首先是一个有力的形容词。用它去判断现实、议论事件、臧否人物，往往具有进一步澄清理想、设想美好社会的良好效果。不过，同样需要警惕的是，过于简单地挥舞“文化研究”或左翼的棒子，笼统地要求一个大会或者一个群体具有文化研究的批判面貌，而不思考其实际所处的社会环境，理解它们之间的

关系，这样的要求/“理想”，很可能是戾气的又一种样态。如果说，本次大会让我们对文化研究在今天中国的处境认识得更加清楚的话，那么，最值得牢记的一点大概是，既没有天然“文化研究”着的广告公司和餐馆，也没有几面之缘、聊得热火便足以成为“我们”的志士仁人或“劳动人民”。文化研究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分歧与异议；经历的，是充满耐心、向着“无中生有”的努力和从来无法保证结果的创造过程。

最后，要做一个广告。“当代文化研究网”新版即将上线。在新版的网站中，有两个需要各位同仁广告而之、煽风点火的栏目。一是，新增“动态”一栏；该栏目欢迎大家上传与文化研究相关的信息（刊物、大学、会议、工作坊、社会活动、短期课程等），以促进同行之间的交流。一是，进一步充实英文网页“文章”栏目；我们将在往期的《热风学术（网刊）》中选取优秀的文章（每年4篇左右），翻译并上传到该栏目，供英文世界的研究者和读者参考，并由此促进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和世界同行的交流。也借此机会，再次诚邀各位投稿。具体投稿方式，见《稿约》。

所有这些，对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建设而言，都是有限的工作。就让我们，在雪崩来临之前，做一片认真着陆的雪花。

《热风学术（网刊）》

2018年12月12日

专 题

世纪之交，网络文学的草创期，最先到达网络的写作者吸引他们的是网络的自由表达。至少在2004年之前，网络文学生态还是野蛮生长的，诗人在网络上写着先锋诗歌，小说家在网络上摸索着各种小说类型，资本家也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快速圈钱生钱的盈利模式。也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我对被资本定义的网络文学的“文学性”持激烈的质疑态度，一直延续到现在。

——何平《行将隐失的证词》

此后，制度参与对网文面貌的强力塑造，在中国作协、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推优、排行榜和审读、阅评之下，网络文学也逐渐变成“玄幻、穿越”：不指涉、不追究、纯幻想、纯娱乐；“小白文、正能量”：简单轻快，话题保险；近年来在强力导向下，又出现大批“现实题材”以及“强国流”等与生活相关的主题征文作品。网络作者纷纷加入专门的组织网络作协，成为人大代表，号称社会“新文艺群体”“新社会阶层”。

——许苗苗《情感的退场：网络文学发展中关键词的转换》

阅读网络文学（尤其是 2005 年之后越来越类型化的网络文学），一个最为突兀的感受是主角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如路见不平不顾个人利害的侠客、单纯善良的“白莲花”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知进退、有计谋、很会自我规划的个人主义者。他们不能随便吃亏，不想做“滥好人”，同时不愿和外部世界有过多的牵扯。……在网文的作者与读者看来，如此自利的人才是“真”的人，或者说在一定范围内承认自私自利的合法性才值得信任，自利与利他并不冲突。

——周敏《“坏”与“顺从”：对网络文学主角形象演变的一个观察》

大多数人对贫困已经习以为常，就不得不自相残杀，去争夺越来越少的资源。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异和对立也是由共通的经验造成的，就是说生活资源的短缺主宰了我们。因此我们应该关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共通经验，尽管也要同时留心不同群体的差异。在这个普遍贫困的时代，我们必须始终专注于共同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敌人，还有什么疑问吗？难道不是资本主义造成了普遍的贫困吗？

——姜来熙《普遍贫困的时代》

图片来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aug/10/hunt-for-south-korea-feminist-sparks-backlash-against-sexist-police

当暴力与现代法治文化的悖逆而遭遇治理并受到“污名化”的指控之时，它在荧屏中的反复出现蕴含着深刻的意味：当下社会对于文明的塑造在杜绝通过暴力寻求正义之时却无法提供给大众可靠的安全保障，当他们丧失对于社会法治性正义的信任之时，“再暴力化”便成为了“弱者的武器”，以卵击石地对这个社会表达抗议。

——张登峰《再暴力化与底层突围：当下内地电影中的暴力叙事及其文化嬗变》

殊音

一辆公车犹如一个社会，方向盘即是公共权力，那女乘客的持续撒泼，相当于某种恶质因素越来越严重地破坏公共事务，一旦这种破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全社会的灾难：当时安然不动的乘客们，大概没有人明确地这样想过吧。既不觉得公车是一个小社会，也没有警觉到方向盘和我的座位属于一个整体，更因为不习惯关注和干预公共的事，从来都是只在意私人的事的，即便隐隐有点不安，看看四周，也就松懈下来了：不会有什么事的，大家都不动，我一个人起来也没用……

——王晓明《他们坐的冲下了长江……》

图片来源：《爆裂无声》剧照；中国重庆万州区长江二桥公交车坠江事故现场 http://news.dwnews.com/china/news/2018-10-28/60093973.html

现　场

在 Crossroads2018 大会中，因为有一以贯之的“共同参与”的理念，因为身为文化研究双年会的主办方，我们格外关注平等、阶级、互助这些问题，保洁阿姨的拒绝才会显得突兀，从而引发思考。

——吴月 张少璞《Crossroads2018 中的保洁阿姨》

看不见的网络文学

编者按

■ 许苗苗 *

这次“热风专题”名为“看不见的网络文学”。在如今这个人人谈论“IP”，人人为流量痴狂的媒介环境里，网络文学霸占银幕、手机甚至印刷品，bling bling 得让人睁不开眼睛。无论原创故事还是涉嫌抄袭的“调色盘”，无论粉丝 QQ 群还是作者朋友圈，网络文学简直有曝光过度之嫌，何来“看不见”呢？这里所说的“看不见”，可能是由于行业专业限制，外人看不见的一些小苦衷、小秘密；可能是阅读过程中由于读者 / 论者视角差别而尚未被广泛看到的作品特质；可能是某些曾盛行于网络，却由于规章制度、外部审核或市场筛选而无法再看见的类型；也可能是由于权力意志、媒介手段、文学观念等缘故“不看见”的话题。

在这个专题里，我邀请了位置不同、代际不同、视域不同的作者。他们是 60 后的何平老师、70 后的我自己、80 后的周敏老师以及 90 后的晋江妹子们。稿子收到，没有我想象的振聋发聩，但我认为，只要你认真读，其中一些文字和观点，也足够在一干冠冕堂皇、不偏不倚的言论（包括我自己的几篇）中，展示出不同的样貌。我期待，这一组文章，能够在话语的汪洋中被看见。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何平教授的文章，其实也是我的心里话。我多希望自己的笔也能带上他那样犀利的锋芒。以往诸多评选中，当我试图主张候选名单应当有更开阔的面向时，我单薄又不够坚定的声音总会被

* 许苗苗，博士，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首批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文化、都市文化。电子邮件：miaomiao@189.cn 。

数据、资本、社会效益等其他宏大指标淹没。而何教授在他《行将隐失的证词》中说得明白：“这是一个被逐渐缩小的‘网络文学’概念，逐渐被资本垄断重新定义的‘网络文学’向前倒推出来的‘推选结果’……每一次资本的强劲注入，都是‘网络文学’重新被定义，一直到现在将起点辽阔的网络文学收缩在不断制造爽点的类型故事。……如果当事人不回忆不讲述，后起的网络文学研究者是不是就会以为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被少数巨型网文平台垄断？网络发布和纸媒发表有一个很重要不同，许多曾经重要的网站时过境迁会打不开而无法还原历史现场。可以说，活到今天的大型网文平台都有它们的‘小’时代。”何教授带着批评家特有的攻击性气质写下本篇，以他清晰、直接、有力量的文字，从作品发展和网络文学生态出发，说出这些年其中没有被指明的、被掩盖过去的问题，传达出文学研究者永不放弃的精神品格和对理想的坚守。

我自己的文章《情感的退场——网络文学发展中关键词的转换》虽然用了严肃体面的“学术范儿”标题，却夹带了不少情感私货。我结合自己的上网经历，通过关键词的转换回顾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从文化先锋们“无功利”“超线性”的技术理想，到写手“挖坑”、读者“催更”的窘迫，这期间的网络文学基本受网民的情感和想象支撑。发展到以“爽感”“类型文”打底形成网文“IP”产业链时，资本力量的登场极大左右了网络文学主流面貌。2014 年后，监管之手强力干预，网站上许多子类型萎缩甚至消失，网络作者也在推优、排行榜等的激励下，积极向“现实题材”靠拢，为紧密贴合时代主题的“强国流”“改革流”等贡献网络故事。特别将 2014 标注出来，是因为我和我的编辑朋友们亲历了那一年严厉的“净网行动”，我也就此意识到对于如今的中国网络文学来说，无论资本多么庞大，依然达不到掌握产业命运的程度。

嘉兴学院的周敏老师从读者、粉丝、研究者的角度总结网络文学主

角的演变过程。他阅读网络文学的视角正好与我相互对照——男频、个子高、比我还年轻。这几条并非搞笑，尽管网络 ID 可以随意编造，但如今网络阅读中，身体物理属性的分值却比以往更重要。与印刷媒体里反反复复阅读的经典文本不同，在网络文学里，男频女频、何种性向、颜值高低、点击习惯、近视度数都能够影响一个人接触到的阅读对象。尽管一个个榜单已经列出网络经典文本，但那么长、那么多又不断变动的网文世界里，不同人根本看不到同一个对象，所以，网络文学因人而异。在周敏眼中，“网文主角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知进退、有计谋、很会自我规划的个人主义者。他们不能随便吃亏，不想做‘滥好人’，同时不愿和外部世界有过多的牵扯……他们只想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让自己（也包括自己的亲人与朋友）首先发展好。在他们的发展轨迹里，外部世界的大小是不断变化的，其大小与个人能力的大小一定要匹配……”（《“坏”与“顺从”——对网络文学主角形象演变的一个观察》）我从来都不期待类型网文在已经发展得很严密的文学性方面有所突破，只是想要探索它在何种程度上触及各种管制力量的边界。而周敏却在小说阅读的视域内察觉到网文主角形象的新变，这与一代人的阅读体验和视角紧密相连。

“晋江文学城”是我个人阅读钟爱的文学站点，这么说，爱看网文的女粉丝们一定大都心领神会。但我对它的钟爱，不仅在于诸多大热女频作品以及那些认真写作的女神妹妹们，还在于它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纸质出版、影视改编、数字版权保护、网文出海之类重要事件中从不缺席，而且并没有单纯为盈利而屈从于资本。作为著名文学站点中唯一一个没有被当年的“盛大”或其他资本全盘收购的企业，晋江的创始人冰心和管三始终将站点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确实在创业的同时坚持着对网络文学的理想。这篇来自晋江的文章切实反映出外部导向在对

市场极其敏感的网络文学中产生的影响，以及既要维护作者利益又要符合政府要求、还要谋求利润增长的网站身处多方权力漩涡中心的小心谨慎和无奈。他们在《关于网络文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反思与期待》指出：IP 热潮把作品的类型集中到一两个方向导致作品类型向利润丰厚方向集中，会对网络文学多样性造成伤害；对现实题材的大力倡导导致作者为追逐政策利好蜂拥而上，放弃擅长的题材，形成知识、资源的浪费等等。这些言论能够从业界角度对网络文学提供一份诚恳的回顾。在这里，我要对笑起来很憨厚的刘旭东（管三）、黄艳明（冰心）以及王双和豆豆狼表示感谢，他们体现着“网络文学”一词汇背后隐形英雄们的专业性和敬业精神。

行将隐失的证词

■　何平 *

2018 年 3 月 29 日，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作家协会、阅文集团联合主办的“中国网络文学 20 年发展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公布了包括《间客》(猫腻，2009)、《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痞子蔡，1998)、《悟空传》(今何在，2000)、《大江东去》(阿耐，2009)、《诛仙》(萧鼎，2003)、《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辛夷坞，2007)、《斗罗大陆》(唐家三少，2008)、《飘邈之旅》(萧潜，2003)、《步步惊心》(桐华，2005)、《家园》(酒徒，2007)、《繁花》(金宇澄，2012)、《回到明朝当王爷》(月关，2006)、《鬼吹灯》(天下霸唱，2006)、《复兴之路》(wanglong，2015)、《斗破苍穹》(天蚕土豆，2009)、《巫神纪》(血红，2015)、《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2006)、《盘龙》(我吃西红柿，2008)、《全职高手》(蝴蝶蓝，2011)、《神墓》(辰东，2006) 等“中国网络文学 20 年 20 部优秀作品 · 20 名优秀作家”。

可以从“推选结果”作为本文的一个起点。

当然，对于网络文学的元年是不是以 1998 年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为标志，并非已经全然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应该以 1997 年罗森的《风姿物语》，或者以朱威廉的“榕树下”为网络文学的原点。或许因为“以十

*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当代文学，电邮地址：pinghe1968@hotmail.com.

为单位”约定俗成的仪式感研究习惯，在 1998 年谈论网络文学理所当然权宜、妥协地将网络文学元年锚定在 1998 年。我不知道到了 2021 年，会不会有人以《华夏文摘》或者少君的《奋斗与平等》为原点撰写汉语网络文学 30 年史。以哪个时间和事件作为网络文学元年可以商榷，是不是一定以整十年为述史单位也可以再讨论，但网络文学经典化首先可以开始做起来。可以举中国现代文学做例子，1935 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距离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还不到 20 年。同样，1970 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文学”早在 1980 年代就开始有人撰史。

由于“中国网络文学 20 年 20 部优秀作品 · 20 名优秀作家”的推选者都是专业的网络文学研究人员，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推选结果的专业性和权威性。遴选一定意义上也是经典化和述史实践。当然，由于多人参与共同完成，推选是个人趣味和集体意志的共同结果。就我个人而言，这个“共同结果”并不和我想象的“个人结果”完全重叠。不完全重叠，深究下去肯定涉及到立场和观点。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这里我只想关注，如果我们把这 20 部“优秀作品”按网络发表时间排列并分析每一部作品在 20 年的样本意义，考虑到推选也是一种述史，这个推选结果是否尊重网络文学 20 年的客观现实？就像已经有人指出的推选结果女频占有的份额偏少。男频和女频的比例不平衡，还不是数字意义上，它可能造成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的“隐失”，影响到对整个网络文学生态的判断。20 部作品的预先设定，如此少的数量，对 20 年网络文学海量作家作品，谁进谁出，各种类型的权重，不同发表平台之间的平衡，等等，都值得仔细思量。

也许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可以想象按照现在的 20 部作品，即使平衡男频和女频的作家和作品，类型的权重和来源网站，其对 20 年网络文学实质性的立场和观点并不会带来大的改观。简单地说，这是一个

被逐渐缩小的“网络文学”概念，逐渐被资本垄断重新定义的“网络文学”向前倒推出来的“推选结果”。我们可以对网络文学 20 年做观察，从盛大，到腾讯、百度、阿里、掌阅等等，每一次资本的强劲注入，都是“网络文学”重新被定义，一直到现在将起点辽阔的网络文学收缩在不断制造爽点的类型故事。

诚然，这是网络文学自身属性使然，在海量文本面前，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范式几乎完全失效。失效不是说对于具体文本文学性的确认，我相信所有网络文学研究从业者的审美判断力，而是这些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具体文本是如何被择选出来的？基本上，它们依靠的是类似“选秀节目”粉丝票选式的点击量胜出。平台据此确定其界面的推荐位置和推荐力度，进而高票者也更容易进入研究者视野。那么，问题是，动辄千万上亿计的点击量，除了数据的统计（我们姑且承认这些数据真实有效），我们很难看到个人更丰富的审美表白。因此，几乎无一例外，那些大神都是人气王和吸金小能手，但高人气和吸金并不都是文学性使然，这应该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因此，我认为对“大神”的过于倚重，从产业布局和资本运作的角度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文学研究也片面倚重“大神”可能直接导致研究为资本畸偏，甚至不自觉地研究为资本背书。像这里的推选结果，即使有现实主义导向和专家审美鉴赏公信力作为尺度，习焉不察地，投出 20 部“优秀作品”还是存在遗憾的隐失。比如安妮宝贝的“短制”，在个人电脑和网络还没有普及的网络文学初期，网络是小资的聚集地，俨然小资代言安妮宝贝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缩影，她和推选名单残余的今何在是网络文学的不同源头。在未有玄幻之前，小资、无厘头，还有愤青，是初期网络文学接受的第一批传统文学的流民。再有，韩寒的“杂的文”，

为什么不可以进入 20 部优秀作品？

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不同的，做网络文学研究，我是一个与时俱在的在场读者。因而，个人记忆和个人研究史会对强制性被命名形成一种反抗和修复的力量；也因此，即使无力改变最终的被定义——毕竟今天每个人都置身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但个人对网络文学的记忆和研究有可能成为行将隐失的证词。

对网络文学，我的个人记忆要远远早于研究。现在说到网络文学如何发生，很多研究者语焉未详，或者强调其和纸媒时代文学的断裂。事实上，至少“榕树下”阶段，写作者对网络文学的认识除了媒介变化，更重要的是对写作自由的体认，就像安妮宝贝所说：“现在的传统媒介不够自由和个性化，受正统的导向压制太多。就像一个网友对我说的，我的那些狂野抑郁的中文小说如果没有网络，他就无法看到。”所以，她在电脑上写，在网络上写，在黑暗中写，在寂静中写。绝望、孤独，“陷入沉沦，并寻求着挣脱”。而她想象的网络时代的读者，“他们存在于网络上，也许有着更自由和另类的心态。同样，也更容易会感觉到孤独”。安妮宝贝网络写作的时代，谁在读，谁在写，是一个少数人的审美共同体和交际圈。而当网络文学有了赢利模式之后，和一切中国式互联网生意一样都是以人口红利的人口总量兑现经济效益，这必然导致以牺牲文学性换取大量的阅读人口接入网络文学平台。和早期网络文学不同，当下的网络文学本质上，像饿了么、滴滴、淘宝、美团等等一样，网络文学是一门依靠互联网的生意。所以，它要依靠爽点开发周边来吸引尽可能消费者，而不想去设置审美门槛。网络作家中的大多数考虑的不是“文学”尺度，而是不去触探可能导致的查禁和查封的底线，以保证财富增殖。就像抖音和直播，商业化之后的网络文学说到底是娱乐业，而不是文学，虽然它具有文学性。也因此，

我觉得对许多所谓当下大众传媒和公众谈论的所谓的网络文学放在产业范畴里研究，比放在文学领域研究更适合。

网络时代不但诞生了安妮宝贝这样的所谓网络作家，纸媒时代的写作也可以毫无违和地无缝接驳进网络文学。富有象征意味的是早期网络也是借助电话拨号上网。我注意到 1999 年王蒙和宗仁发主编的一套“网络文学丛书”就包括李敬泽、张生、李洱、夏商、李冯和李修文等当时刚刚出道的 70 后“新生代”作家。宗仁发在其撰写的序里说：“作为‘人学’的文学，迅速地介入网络空间是与这一空间提供的条件密不可分的。网络上表达的自由给写作者带来一种空前的释放感，纸上写作的那种潜在的约束在网上不复存在，……人们对创作自由的希翼没想到这么简单地就实现了……”网络文学对写作自由的释放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从社区、BBS 到个人博客的写作，尤其是“博文”的大炽。苗炜说的：“博客写作改变了原来互联网论坛贴子那种议论公共话题的状态，进入完全个人化的叙述，每个人都有一块地方可以展现自己的理想、才华、趣味”。即便网络审查客观存在，和纸媒相比，“博文”是属于自己的自由王国，不是报和刊圈出来的“飞地”。翻翻的韩寒《杂的文》、刘瑜《送你一颗子弹》、阿乙《寡人》这些“博文”的结集就能感受得到网络写作的自由。

如果当事人不回忆不讲述，后起的网络文学研究者是不是就会以为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被少数巨型网文平台垄断？网络发布和纸媒发表有一个很重要不同，许多曾经重要的网站时过境迁会打不开而无法还原历史现场。可以说，活到今天的大型网文平台都有它们的“小”时代。而在它们的“小”时代，也是社区或者 BBS 蜂起的时代。作为历史遗存，我们看看“天涯社区”可以大致就会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这些社区和 BBS，在当下可能会转型为 APP、微信公号或

者豆瓣、简书那样的公共性的写作和发表平台。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安妮宝贝在“自序”《网络，写作和陌生人》说：“网络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幽深的花园。我知道深入它的途径。并且让自己长成了一棵狂野而寂寞的植物，扎进潮湿而芳香的泥土里面。”“很多人在网络上做着各种各样的事物。他们聊天，写 E-mail，玩游戏，设计，恋爱，阅读，或者工作。而我，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在写作。”小、个性、自由书写、非赢利等等，这可能是当下被资本命名的网络文学排除而隐失的一个重要传统。

从我个人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也能看到妥协中的渐次隐失。大致检索了下，我专题谈网络文学的论文并不多，一共有九篇，分别是：《诗歌在网上》（《当代作家评论》2008 年第 5 期）、《衰退期的网络诗歌》（《当代作家评论》2009 年第 1 期）、《私媒体时代的网络诗生活》（《当代作家评论》2009 年第 5 期）、《媒体新变和短篇小说的可能》（《当代作家评论》2012 年第 1 期）、《类型小说：文学分层中的“第三条道路”》（《博览群书》2012 年第 9 期）、《对话和协商的“新批评”》（《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23 日）、《我们在谈文学，他们在谈 IP》（文汇报）2016 年 6 月 10 日）、《网络文学的文化自觉何以可能》（《光明日报》2016 年 11 月 7 日）、《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文艺争鸣》2017 年第 6 期）。我不知道文学研究中还有像网络文学这样，研究对象灭失得这么迅速，比如《诗歌在网上》一文，才十年的时间，文中罗列的网址绝大部分已经无法打开，可以节选一段，立此存照。

关于诗歌和网络的关系，参与“橡皮”网建设的乌青说过一句最简单的话：“诗歌在网上”。“诗歌在网上”强调的是“以第一速度到达诗歌现场”（口猪）。这样看，我现在对网络诗歌的观察，几近凭吊旧战场的味道了。2004 年初，小鱼儿的《2003 年华语网络诗歌

不完全梳理》认为：“想查看各路诗人作品，可去诗生活诗人专栏。想查诗歌资料，可去灵石岛。想看诗人骂战的硝烟弥漫，可去诗江湖论坛。想送书和领书或者看诗人吵架，可去扬子鳄论坛。想看大众化和学生作者的诗歌交流，可去中诗网论坛。想看知识分子写作，可去文学大讲堂。想看丰富多彩的诗歌活动和火热的诗歌交流，可去诗歌报。想看官刊对网络诗歌的参与与态度，可去星星诗刊论坛。想看伊沙一脉诗人，可去唐论坛。想看论坛结盟的规模：可去哭与空。想看市民文学视野里的诗歌：可去榕树下现代诗歌社区和网易现代诗歌版。想看互联网诗歌早期发展的历史，你可以去翻看一下橄榄树网站。”时间过去了三、四年，我再到这些诗歌网站和论坛。小鱼儿说的大格局、小趣味没有多大变化。“诗生活”（http://www.poemlife.com/）还是那样包容和稳健；“诗江湖”（http://my.clubhi.com/bbs/661502/）还是那样“恶语”相向；“天涯诗会”（http://cache.tianya.cn/index.htm）、“新千家诗”（http://bbs.book.sina.com.cn/tableforum/App/index.php?tree=0&bbsid=13&subid=2）还是那样人来人往，但即使热闹和繁华，那种旧日里呼朋唤友的好勇斗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从 1999 年的“界限”算起，明年中国网络诗歌满十年了，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回过头来检讨中国网络诗歌的经验或者教训了。我在 2008 年 7 月 3 日上午打开《诗歌报》论坛（http://www.shigebao.com.cn/），会员 95462 人，最高日贴 1743。单数人头，不能不说是诗歌的泱泱大国。但仔细看呢？以“诗歌大厅”为例，累计 1862 屏，点击过千的仅仅 21 屏。点击靠前，四个月就有 5356 点击的官儿的《十二夜 · 第七夜》：“怀抱锦绣的女子多么忧伤 / 所有的路都打了结儿 / 偶尔的梯子也是纸的 / 风永远不敢从正面 / 察觉时已然变成双面刀 / 拿去我的瀑布、雪崩、和砍伐 / 拿去所有的能量和悬疑 / 时间本无答案 / 天空何止是空”，还有陈傻子《我们相互把对方压在身底下》这样“没有粗

鲁就没有爱”的动辄就粗口俚语的诗歌，也有 4713 不俗的点击。一个温婉得古典，一个粗俚得俗世。这两种类型的诗歌往往也是其他论坛和网站点击的大户。就是大户，过千的也就区区 21 屏而已。至于“或者”（http://my.clubhi.com/bbs/661424/）、“今天”（http://www1.jintian.net/bb/）、“翼”（http://bbs.poemlife.com:1863/forum/list.jsp?forumID=60）、“界限”（http://www.limitpoem.com/）、“北回归线”（http://www.bhgx.net/）、“第三说诗坛”（http://bj3.netsh.com/bbs/80584/）、“终点”（http://www.zhongdian.net/）、“扬子鳄”（http://tw.netsh.com/bbs/853675/）、“桶”（http://bj3.netsh.com/bbs/128785/）等等，我留意了一下，点击能够过五百的也很少见。

虽然网址无法打开，内容灭失，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网络诗歌扩张了新世纪诗歌的疆域，也现实地推动了新世纪汉语诗歌的进步。同样，这也是我们很多研究者谈论的网络性的结果。

除了专题论文，从我在一些网络文学会议上的发言也能看到一些隐失的线索。2009 年 5 月 23 日，江苏无锡的“中国网络文学研讨会”。印象中这次会议，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和网络作家保持着戒备、误解甚至“敌意”。慕容雪村和十年砍柴参加了会议，批评家黄发有就慕容雪村发言中的常识性硬伤有激烈的批评和纠正。

2010 年 11 月 10 日，浙江绍兴的“鲁迅精神与网络文学”中国网络类型文学高峰论坛。大概是有感于 2009 年无锡会议的印象，我在会议的发言中强调“和解”。媒体会后的报道也是这样写的：“‘如果依旧用传统文学标准对待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是没有生路的。’何平认为，要给网络文学以自由的发展空间和独立的评判系统。他建议，传统文学的坚守者应对网络文学少些敌意，多些宽容和理解。”

也是在这一年夏烈主导的“西湖类型文学奖“启动。这个只办了一届的文学奖，对于未来网络文学的源流、谱系和归属有着建设性的意义。作为从推评、初评到终评自始自终的评委，我的基本立场是类型小说可能是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为商业化的网络文学的审美上升预留了空间和通道。

这种对话和协商的立场延续到 2014 年 7 月 14 日北戴河召开的“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虽然有个别学者，比如许苗苗研究员，她基于中国网络文学的历史事实认为网络文学应该不只是大型商业“网文”平台的网络小说或者网络故事，但这种观点基本上不再引起广泛共鸣。在会议的发言中，我谈论的所谓“网文”也是商业化的“网文”，其核心价值观是草根伦理、江湖伦理，而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则是建立在五四以来的精英评价体系之上的，因此，传统评价体系很难适应网络文学研究。但即便如此，我坚持认为网络文学一开始不是这样的，在网络文学还没有被窄窄地定义为类型通俗小说即现在俗称的“网文”的时代，网络文学也不是现在这样开足马力，疯狂地计量着每一个 IP 可能的粉丝量以及可能产生的财富的掘金机器。世纪之交，网络文学的草创期，最先到达网络的写作者吸引他们的是网络的自由表达。至少在 2004 年之前，网络文学生态还是野蛮生长的，诗人在网络上写着先锋诗歌，小说家在网络上摸索着各种小说类型，资本家也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快速圈钱生钱的盈利模式。也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我对被资本定义的网络文学的“文学性”持激烈的质疑态度，一直延续到现在。2015 年 9 月 25 日上海的“首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这届论坛恰逢“IP 热”，整个会议笼罩着热捧“IP”，前景看好的乐观情绪。会上，我作了泼冷水的发言，这就是会后整理成文发表在次年《文汇报》的《我们在谈文学，他们在谈 IP》。我对“IP”

时代的网络文学作的基本判断是：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的网络时代这样产生这么许多平庸，甚至是垃圾的文学，今天地摊文学式的网文是资本、大神写手和广阔的粉丝读者群共同造就的商业帝国。最好的结局是，他们喧嚷地谈论他们的 IP，我们还可以安静地谈论我们的文学。审美的分层分众的时代现实地来临。只是中国的文学阅读和审美呈现出金字塔状，普通读者文学启蒙任重道远。2017 年，我将《我们在谈文学，他们在谈 IP》的立场更明确地在《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一文展开，指出网络文学的传统对接上《故事会》和《知音》的中国式故事传统。这表面是对网络文学的一次审美降格，但却是试图寻找到网络文学自己的美学规范和经典化道路。

2001 年，安妮宝贝说：“我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时候网络文学能够得到稿酬，它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网络作者要坚持走下去，绝对需要沉得住气。因为这是一个矛盾。张扬个性的自由空间和踏实有力的版权稿费上的保护。不可能很快就会有完满结局。”（《桀骜不驯的美丽——网路访安妮宝贝》）她根本没有想到的是，未来的网络文学会发展成商业帝国吧？同样，稿酬，甚至天价稿酬带来的也不是她想象的写作者的自由和网络文学的开疆拓土。

情感的退场
——网络文学发展中关键词的转换

■ 许苗苗 *

二十年前，当我刚刚考上当代文学研究生的时候，“网络文学”也刚刚作为一个新鲜词进入少量能接触到互联网的人的视野。是的，它只是一个词语，所有想表达态度的人都能说上几句。那时候，有关互联网的想象多少都会带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中的狂妄，认为技术不受束缚、互联网能够保持特立独行。作为一枚曾经的文学少女，我申请了独立域名，开始建网站、编程序，就为将文学作品完完全全按自己的想法呈现出来，不论是美是丑。个人网站，就好像童年的笔记本，写着画着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期待，还能被世界看见，那时的网络相对平静善意，没有如今常见的“喷子”或“键盘侠”，同样隐身在无名 ID 之后，人们对网上的内容多半给予鼓励。早期网络生涯是我身体与精神共同投入、共同亢奋的时代，我切实体验到建造虚拟世界的快感——用自己熟悉的文字和陌生的代码，为一片荒芜的网络填充内容。早期在网上写文字的人，无论是理工气质的写手邢育森、雅痞范儿的批评家葛红兵、大

* 许苗苗，博士，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首批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文化、都市文化。电子邮件：miaomiao@189.cn 。

洋彼岸的在线导师云惟利，英雄不问来路，通过字符就能敲出情意。早期网络文学带着先锋和技术色彩，但连线终端的人们在自由表达和无疆界沟通的狂喜中，投入的是情感。他们对互联网有着理想化的体认，觉得它松散、概括、极不清晰，因此也就有足够容纳异见和酝酿新奇的空间。从当时流行的“非线性”“超链接”“无功利”之类词语中，能看出人们对网络和网络文学寄予的厚望。

伴随网络媒体一路更迭，我也随之一同成长转变：网络上从辛苦打铁获得“新浪论坛十佳写手”的 ID，到博客 10 万点击的早期小规模“网红”，再到暴虐“人肉搜索”的亲历者；现实中从硕士生到 IT 小白领、再到获得博士学位并开始文学研究……曾经那个满腔热情跳进虚拟世界寻找慰藉的我，慢慢冷静下来拉开距离，见证网络文学的这些年。

网络文学，先是从一种无功利的缥缈精神追逐变成遍地开花、充满欲望的言说方式。越来越多新鲜的、套路的、引人振奋的和令人作呕的文字不断涌现——互联网不再空寂，大量言说在我们习惯的文学性“书面语”之外，把日常生活加入这个“网络文学”范畴。每个人的故事都迫不及待地想要透过新媒体生长。那些自称“草根”的作者，真的带来了草一样的写作，有奇葩也有杂草，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杂草：不见理想、个性和独创性，大多是记录、复述以及不加掩饰的关于金钱、女人和权力的梦。它们也许真实，却并不好看。即便如此，这类网络写作依然是自由的，个别特别擅长讲故事的人还带来了早期网文关键词：“挖坑”“催更”“太监”等等……从中可以看出那时依靠身体写作和充满荷尔蒙气息的网络氛围。

不得不承认，让如今我们所见的“网络文学”活下来的，是它挣到了钱。所有知名文学站点都认可，单靠向传统媒体如出版、影视剧改编输出活不下来，是 VIP 收费和线上支付救了它们。说不上什么时候，网

络文学画风突变！从自娱自乐、非常穷酸变成志在娱人和特别有钱！与之相配的，是满屏“大大”“打赏”“跪求”和“舔屏”的文风。其实，我真不是对赚钱有偏见，我相信有充分物质保障，见过足够多的世面，会带来更好看的故事，我特别希望认真敬业的网络作者能通过写作在现世就赢得体面的生活。只是，钱、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运作让个别变成主流、让试探成为模式。资本不介意对象是什么，只关注自身的增值，它用最直接见效的方式对网络文学从形式、内容、题材方面设计摆布。这一波动作让曾经不起眼的网络文学突然变成体量大增的巨型产业:“类型文”“爽感”“代入感”“打赏”“全产权运营”“网络作家富豪榜”等等，充斥着这一阶段的网文圈。

如果就这样不受拘束地发展下去，网络文学肯定比现在的类型和内容更多，但是，创作是否会更兴盛、作品是否会更好、更上一层楼呢？从我自己阅读“成人情色”或者干脆就是“黄色小说”的经历中，或许可以看到回答这一问题的难度。

我第一次读到成人小说的时候，已经23岁。很抱歉，虽然研究文学，但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女生，此前我从来没有读“禁书”的经历。那次中学同学聚会，听说我做“网络文学研究”，一名男生主动推荐我看《金鳞岂是池中物》，“写的也没什么稀奇”他说“就是特别特别长”。在当时的网上，“金鳞”堂而皇之地张贴着。它不仅有千奇百怪的情色组合、有将权力金钱与现实结合巧妙的幻想，还有非常清晰的逻辑和故事情节，代入感超强！更重要的是，“金鳞”是网上自发的写作，在没有依靠字数收费打赏的时候，这部一百八十多章的性小说慷慨地一章章坚持连载，它的动力机制可能只是个人表达的欲望。但就是这种欲望开创了后来许多网文类型:“后宫流”“种马流”或者“总裁文”“杰克苏”、爽文之类，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影子。

震惊之余，我才意识到网络写作在当下的先锋性：它不会仅仅是形式的试验或观念的探索，它理应接触到人性更多的层面。通过它，也许，民众的媒介素质和文化理性能够向无微不至的监管制度展示自治和自律的可能性。自发的创作不应刻意回避某些现实，网络文学让我充满期待，哪怕就是这些成人、情色和性的话题。我期待网络文学能打开新的维度，我期待读到三岛由纪夫之外的另一种“禁色”，我期待“百合”不仅在川端笔下盛开……然而，谈到性，又是多么刺激，它尤其能让一贯受屏蔽的中国读者开开眼界。果然，网文中涉及性的内容越来越多，它们向着另一个极端奔去——只有性没有情、只有欲望没有故事，连身体都只剩下器官……粗糙幼稚得可笑。为什么？网站编辑朋友告诉我，在大批新试水网文界的网站里，资方为增加点击数据，要求添加性描写“无下限”。是的，我认为性在文学中不应该缺席，许多话题不应该是禁区，但是，也不应该受利益胁迫而无限放大。

对于许多文学网站的老编辑来说，2014 年 4 月 11 日是不堪回首的一天。当晚 19 点 40 分，“新浪读书”17 名接到检查通知正在加班处理站内读物的编辑突然被警察带走。24 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通报：新浪网读书频道 20 部在线作品，经鉴定为宣扬淫秽色情。那年 7 月，中国作协在北戴河召开网络文学大会，满载文学网站管理人员和编辑的大客车从北京进入河北，停车例行检查身份证时，车里突然静了下来，气氛紧张诡异。直到民警离开，车重新开了一段之后，大家的呼吸频率才慢慢恢复正常——对于办公室里每日处理文字的小白领们来说，被带进公安局是怎样的刺激、惊吓和震慑！那一年“净网行动”措施之严厉让我这个观察者都颇感触目惊心。下文引我于 2015 年对当时“净网行动”文学网站反应的统计，以及对自 2002 年以来各有关部门对网络文学监管历程的回顾[1]。

1 表格及监管回顾均参见许苗苗《2014 网络文学：监管的强化与产业的转变》，《首都网络文化报告 2014》，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2014 净网行动后的文学网站 [2]

序号	时间	网站	行动
1	4 月 13 日凌晨 3 点	看书网	关站升级自查
2	4 月 13 日上午	移动阅读 PC 端 WAP 端	防问屏蔽，下架敏感作品
3	4 月 13 日下午	凤凰读书	频道关闭
4	4 月 13 日下午	百度多酷	跳转纵横
5	4 月 13 日晚上	3G	关站维护
6	4 月 13 日晚上	中润飞跃网	关站维护
7	4 月 13 日晚上	一千零一页及一些小网站	关站维护
8	4 月 13 日晚	逐浪网	全体编辑加班自查
9	4 月 13 日起	创世，起点，纵横，17K 等	开始处理敏感作品
10	4 月 13 日起	腾讯云起、小说阅读网、潇湘、红袖、晋江等网站女频	逐步开始自查

网络文学十年监管历程

2002 年 6 月 27 日，新闻出版总署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由新闻出版总署“对互联网出版内容实施监管，对违反国家出版法规的行为实施处罚”，该暂行规定引入了传统文学的出版管理规定，基本原则是图书里不能有的内容，互联网上也不能有，

2 部分数据参见《“扫黄打非 净网 2014”专项行动开始 网络文学界动荡数家文学站维护整顿》，http://www.admin5.com/article/20140414/542048.shtml

明确要求互联网出版机构实行编辑责任制度，有专门编辑对审查内容，编辑人员接受上岗培训等。由于当时网络文学娱乐成分居多，众多站点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这个暂行规定基本上被搁置。

2004 年 7 月 16 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发起“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网络文学首次成为“扫黄打非”对象。中国成人文学城、成人文学俱乐部等网站被取缔；天鹰网、读写网、翠微网等因存在色情内容，被要求关闭整顿；起点、幻剑等网站展开自查，大量作品被删除或屏蔽。一些知名情色文学写手如从不乱、罗森、泥人、半只青蛙、秦守等从内地网络消失。

2007 年 4 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全国网站立即下架十五部“有严重政治问题的网络长篇小说”如《重建帝国》、《共和国之怒》、《中国特工》、《共和国士兵》、《新中华战记》、《共和国 2049》等。8 月 14 日，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出了《关于严厉查处网络淫秽色情小说的紧急通知》，348 家刊载淫秽色情小说的网站被查，或关闭网站，或删除作品交纳罚款。新闻出版总署还公布了《四十部淫秽色情网络小说名单》，要求各地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处理。

2009 年，国新办、工信部、公安部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10 月 19 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下发“进一步查禁互联网上淫秽色情小说及相关内容”的通知，包括网络小说、手机小说在内的 1414 种淫秽色情和低俗网络文学作品被查处，20 家传播淫秽色情文学的网站被关闭，累计删除各类淫秽色情文学网页链接 3 万余个。

2010 年 1 月 6 日，新闻出版总署再次公布 197 家登载、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内容出版网站名单，查处淫秽色情及低俗内容作品 195 种，删除违规网页链接两万余条，对 74 家登载淫秽色情网络小说网站进行

了查处。由于此时文学网站已经走上商业道路，一些主要文学网站在监管部门帮助下，建立了严密的多级审读、监督制度，并启用关键词过滤来审查站内作品。

2012 年 7 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再次开展“打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传播淫秽色情信息专项行动”，受青少年网民追捧的黑道文学作品成为新的重点对象。由于较强的现实指涉性，这一阶段，网络小说中黑道、帮派、耽美、官场等容易触碰管理红线的题材逐渐从文学网站退出。只留下历史、玄幻、仙侠等纯娱乐性质的类型。[3]

此后，制度参与对网文面貌的强力塑造，在中国作协、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推优、排行榜和审读、阅评之下，网络文学也逐渐变成“玄幻、穿越”：不指涉、不追究、纯幻想、纯娱乐；“小白文、正能量”：简单轻快，话题保险；近年来在强力导向下，又出现大批“现实题材”以及“强国流”等与生活相关的主题征文作品。网络作者纷纷加入专门的组织网络作协，成为人大代表，号称社会“新文艺群体”“新社会阶层”。如今希望以写作成名，依靠网络比依靠印刷媒体更加容易。

中文网络文学发展 20 年之际，到处都在总结回顾。作为一个早期的作者、读者、疯狂打铁和猛烈拍砖的 ID，我曾经将有血有肉的自己完全抛进网络文学的世界里。而如今，作为一个观察者和批评者，脚踏阅评和推优两界。我不得不抽离感情，保持冷静。网络和政治、金钱挂钩并不是中国特色，无论水军、广告还是不期而遇的“404”，那个预言中的网络乌托邦，在很多方面已被证明，是一种更为强力且有效的监控和权力体系。所以，网络文学，没有也许，没有必须，它依然需要我们——我们这些爱它、关注它的人，指出问题，发现优点，同时为它在资本和制度之间的生存作出解释并拓展新路。

3　参见记者张英：《网络文学“扫黄打非”十年记》，《南方周末》，2014 年 5 月 31 日。引用时有删节。

“坏”与“顺从”
——对网络文学主角形象演变的一个观察

■ 周敏*

一

阅读网络文学（尤其是 2005 年之后越来越类型化的网络文学），一个最为突兀的感受是主角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如路见不平不顾个人利害的侠客、单纯善良的“白莲花”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知进退、有计谋、很会自我规划的个人主义者。他们不能随便吃亏，不想做“滥好人”，同时不愿和外部世界有过多的牵扯。于他们而言，外部世界太混乱，是对个体有着强烈压迫感的他者。因此，在生存的逻辑面前，他们只想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让自己（也包括自己的亲人与朋友）首先发展好。在他们的发展轨迹里，外部世界的大小是不断变化的，其大小与个人能力的大小一定要匹配，也即有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事情，去多大的地方。如此才能有安全感，并牢牢成为所在世界的掌控者。这也基本上是玄幻、修仙、穿越小说的空间演进逻辑。不少高人气的幻想类小说，主角的“金手指”（在功能上类似于网游中的“开挂”）都与能随身携带又不易被人发现的空间法宝有关，因后者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主角们“躲进小楼成一统”，自成“小世界”，并追求“猥琐发育”，逐渐把外部世界吞噬、转化为自己的小世界。本文认为，主角的这一自我呈

* 周敏，嘉兴学院中文系讲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当代中国通俗文学与文化；电邮地址：zhm656@126.com。

现的方式正是网络小说近些年呈现的主要特点。

与其将这种对传统叙事伦理的偏离看作网文作家故意标新立异，毋宁说其中反映了网文对读者普遍的阅读代入与心理认同的把握，进一步说，它反映的是网络时代人们（尤其是青年群体）新的情感结构。在网文的作者与读者看来，如此自利的人才是“真”的人，或者说在一定范围内承认自私自利的合法性才值得信任，自利与利他并不冲突。同理，狠毒与善良、狡猾与单纯、猥琐与正经、痞气与纯情、多疑与信任等等都可以和平共处，关键要分清场合、敌我与尺度，其中自有一些道德原则，但却是相当粗浅的。所以，尽管读者称《凡人修仙传》（忘语）主人公韩立为“韩老魔”，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对这一人物的喜爱。网文作家无罪还创作过一系列“猥琐流”小说，如《流氓高手》、《通天之路》（其主角的姓名就叫“魏索”）等，也都收获了巨大的点击量。在《盘龙》里，主人公林雷要消灭代表恶势力一方的“光明教廷”，不是因为后者的恶行，而仅是因为这种恶行恰巧实施在了林雷母亲的身上。

在女频小说里这种情况依然普遍存在，如在有关《后宫·甄嬛传》（流潋紫）的读者讨论中，读者几乎一面倒地对甄嬛为了自保和保护她所爱的人所表现出的“心狠手辣”与“爱恨明了”表示理解与支持，称赞她有“真性情”，并且“骨子里是善良的”。其背后真实反映了 2006 年以来在民间 / 青年亚文化中蒸腾而出的“反白莲花”浪潮。[1]

在淡化道德立场的同时，网络文学对既有规范与权力逻辑却又表现出了相当的顺从与认同。实际上，承认性格的多面性，所谓该善良时善良、该毒辣时毒辣，就是对外部世界残酷性体认的直接反应，其出发点是自我的保存与发展，不是通过改造世界来改造自己，而是在承认世界的前提下使自己越来越走进世界的中心。所以，即使他们已经处在巅峰，也

1　王玉王．从《渴望》到《甄嬛传》：走出“白莲花”时代 [J]. 南方文坛，2015(5):47-49.

不会试图去改变规则。对于他们而言，这是最坏的世界，处处是竞争与压迫，但也是最好的世界，给了奋斗者无穷的动力与机会。还以林雷为例，当已修炼成为最强者因而有很多人找他主持公道的时候，他尽管表示同情，但还是拒绝了，“非亲非故，我都要帮？那我要分身万亿了”“别说帮别人了，就我自己的事情，还有许多都没做好”。世界依然改变不了，“自己的事情”永远是首要的。在《通天之路》里，当“散修”出身的魏索以其最强大的实力震慑住了所有和他为敌的大家族与大门派并与他们划定停战协议时，特别做了如下的申明：“你们今后要按照修道界既定的规矩办事，公平交易，若是恃强凌弱，或者再想和我对敌，我和你们现在划定的协议，便全部取消，我必定会杀上你们山门。”这也不是重新制定规则，而毋宁说是对“既定规矩”的再次强调。修道界原本就存在已经相当完善的建立在良性竞争与公平交易之上的规则，需要的不是推翻而是复兴。即便像《新宋》《宰执天下》《回到明朝当王爷》这样的历史穿越小说，主人公改写历史的豪情与自信也不过是来源于后见者对既有的西方大国崛起经验的把握，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建造一个另类世界的想象力与胆略，只是在规则的范围内行事。

网络文学一向在“YY 无罪，造梦有理”中经营“爽点”，但从上述两个方面而言，它恰恰最真实地捕捉到了当下青年的情感结构。陶东风曾经批评玄幻小说体现了“游戏机一代”青年的“非道德化”与“犬儒主义”[2]，尽管本文对这种评价有所保留，但它无疑从侧面证明了网文与现实的深刻关联。不过，本文更想从 20 年网络文学文本的内在演变中去分析与把握目前这种流行的自我呈现方式的源流。

2　陶东风 . 游戏机一代的架空世界——“玄幻文学”引发的思考 [J]. 文艺争鸣 ,2007(04):36-40.

二

可以发现，在早期网络小说如《第一次亲密接触》（痞子蔡）、《缘分的天空》（宁财神）、《活得像一个人样》（邢育森）等中，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卸下了道德包袱，他们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痞气”，贫嘴、滥情、放荡、混乱、蔫坏、玩世不恭，对一切似乎都漫不经心，并以此形象与心态自我标榜与吸引异性。但实际上痞气只是其表，它不过充当着抵挡 / 抵抗现实种种不如意和强烈挫败感的一个硬壳，其背后隐含着对“纯情”“永恒”的守望。邢育森在《活得像一个人样》中调侃主人公天灰“天生一副小资产阶级的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这句评语可以挪用在这一时期很多网络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惟其如此，当面对现实与理想的错位时，他们才会时时挣扎在“自我”与“超我”、“痞子”与“小资”的夹缝之中，既对现实无法认同，又深知自己的理想无处寄托，因此只能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以角色扮演的形式肆意释放自我，挥霍青春，但同时又不间断地被不经意冒出的不安与伤感所侵蚀。如此，个体就只能在喧哗与躁动中浮沉。

如果说 1990 年代的纸面文学进入到一个“无名”的时代，文学对个人的想象开始逐渐告别集体话语，那么世纪之交网络文学的兴起明显加速了这样的进程。正如陈村在 2000 年所说，网络生活的匿名性，使得“人们身上许多隐形的东西现出原形”“人终于知道自己原来可以这样，知道人原来是这样。性别、年龄、经历，种种我们赖以成为一个人的东西，在网上，都可以被忽视和改变。”[3] 所谓“隐形的东西”，主要是指被社会主导价值所压抑的个人性的东西，它们在浮出历史地表之际，因未经道德裁决，往往会表现为让人既亢奋又不安的小颓废与小堕落。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感状态含有一定的正面价值，背后的逻辑是以带有

3　陈村 . 网络两则 [J]. 作家 ,2000(5)

瑕疵的“真”（也即“自然”）人性对抗崇高价值、完美人格的“伪”道德。这与王朔“痞子英雄”的逻辑多少有些类似，而且王朔也是在“躲避崇高”的背后藏着对纯情与理想的坚持与缅怀[4]。所不同的是，网络文学所反抗与坚持的，更显轻飘与模糊，带有更强的娱乐性，追求的是“过把瘾”，但很难到“过把瘾就死”（即使这一时期的网文写了不少的“死”）。由于宏大目标的烟消云散，所谓伤感、苦闷，往往成为了可以消费的小情绪。

对这种小情绪的表现无疑占据了当时网文创作的主流，它也符合此时原创网络文学最重要平台“榕树下”网站所倡导的“生活、感受、随想”这一文学理念。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网文的生产与传播当中，在网文的“草根化”趋势面前，“榕树下”的过于“沙龙化”、纯文学化和小资化开始显现了它的不足，于是更为随意自由和大众参与度更高的“天涯社区”则迅速替代了“榕树下”的地位。而“天涯”（也包括此时有着类似性质的其它文学论坛）的“江湖气”又给网文的角色塑造带来了一些新变化，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恶声恶气”被注入进了原有的痞气之中。因在“天涯”上首发《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而迅速成名的慕容雪村就曾如此谈论自己的写作，“写文章也一定要恶声恶气，惟恐别人不知‘老夫是个恶人’”。他对文学与道德有着自己的理解，“我强烈反对道德对艺术作品指手划脚”“文学与道德无关，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他在心灵上应该是自由自主的”。在他这里，写作的自由自在与卸下道德包袱有着一定的因果联系，所以他才会“恶声恶气”并不无得意地宣称：“以下是我的重要缺点：自私、冷漠、孤僻、对世界缺乏爱心。还有一个更坏的：我为我的缺点感到自豪。”[5] 慕容雪村的这一认知与个人气质才可能更容易在“网文江湖”中脱颖而出。如果说“痞气”多少带有一点多愁善感的“文青”气质，那么“恶气”则世俗气息更浓，荤素不忌更适宜在“草根”中摸爬滚打。

4　张永峰．“顽主”的“伤心”之处——王朔小说再解读 [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4):41-52.

5　吴虹飞．慕容雪村 一个狐疑的家伙 [J]. 南方人物周刊，2009(5):66-69.

而由“痞气”到“恶声恶气”，是一个逐步挣脱理想主义、堕入尘世并自我麻醉的过程。《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将主人公命名为“陈重”（“沉重”），带有相当明显的象征含义，小说也给人消极压抑之感，这一切都意味着现实的向下的逻辑全方位地压倒了理想主义的向上逻辑，与天灰们总是在“完美”与失意之间苦闷相比，陈重对纯情已经不抱奢望，而理想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模糊的背景。当对现实的质疑与反思的微弱力量几乎完全被肉体的放纵所倾覆，主人公最终指向了“将我遗忘”，借自我催眠与自我欺骗，来告别沉重。这种在沉重与告别沉重之间的摇摆，既有猎奇也有探索，一方面加剧了人的自我分裂感和精神痛苦感，一方面使网文从“小清新”走向“重口”，从此“残酷”也成为网文最重要的青春书写方式。

当然，网络小说还有另一种不同于从痞气到恶声恶气的发展趋势，这里所指的就是以 2000 年今何在《悟空传》为代表的一类作品。无论是痞气还是恶声恶气，它都给人一种沉郁之感，个人在环境面前显得羸弱和无能为力，而悟空这一形象则充满着力量感与明确的反抗意识，尽管他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我分裂，但其身上依然有着掩饰不住的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激情。不过，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发现，悟空也承续着这一时期网文人物的一些共性，经“大话”文化和网络文化共同洗礼之后，前文所说的痞子气依然渗透进了悟空的英雄气之中，他被塑造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爱惹是生非的“真人”，或者至多不过是个不断克服恐惧的“修仙者”。与此同时，原本的“普度众生”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自我成神”，悟空也因此成为了网络文学类型化之后大量涌现的个人奋斗者们的先驱。这种建立在自我意识觉醒与膨胀基础之上的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追求（从“天下再无可拘我之物，再无可管我之人”到“再无我到不了之处，再无我做不成之事，再无我战不胜之物”）以及为此殒身不恤，满足了新世纪青年对青春叛逆的期待，并成为这部小说最打动人心之处。但《悟空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没有夸大反抗的摧枯拉朽，让“燃”进行到

底，而是写出了反抗的不可能性（如悟空所说，“反抗不过徒增痛苦”），豪情壮志注定要跟着岁月一起消磨，反抗的结局不是改变了世界，而只是改变了被世界所改变，大闹天宫、冲决一切网罗的美猴王没有了，取经路上只知杀妖（实际上是同类）赎罪、感受到金箍存在才安心的孙悟空登场了。这又与从痞气到恶声恶气这一网络文学发展趋势中人物的无力感、分裂感相呼应。当然，悟空的少年梦想并没有完全消散殆尽，只是被压抑到记忆的最深处，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宁愿死，也不肯输”的悲情结局。但所谓“不肯输”，实际上不过是在承认“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之后的一种“情怀”补偿，安慰更大于激励。这与作者在再版序言中所说的“这个世界我来过，我爱过，我战斗过，我不后悔”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前提下，着力在提高“心力”之价值，这么做的后果是反而进一步确认了现实的不可改变性。

三

玄幻小说兴起、网络文学的类型化趋势越发明显以后，那些在多重自我之间以及自我与他人、自我与世界之间挣扎的文青型、情怀型主体基本消失不见了（也许尚有个别见于以“文青”著称的猫腻的一些小说中），陈重（《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悟空（《悟空传》）们纷纷转世投胎，成为对“成功需要奋斗、奋斗必会成功”深信不疑的新的自我奋斗型主角，自我开始统一，并要高于他人与世界，后两者都是个人成功的“踏脚石”）。为了达成这一点，他们往往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不那么成功的主角（如像《活得像个人样》里的天灰，职场和情场都不得意的公司白领）“穿越”到异时空或者前现代（也有“重生”到青少年时期，利用后见之明重新规划人生），并赋予其拥有“金手指”的能力，从而凸显其绝对的比较优势。典型的角色有猫腻《庆余年》里的范慎，穿越前只是个得了重症肌无力的少年，但穿越之后这种疾病体验

却成了他修炼神功的基础；哥斯拉《宰执天下》里的贺方，穿越前是为生存疲于奔命的采购员，想的都是如何顺利报账，但穿越到宋朝成为韩冈后，立刻运筹帷幄、全在掌控，一套做生意的理论所向披靡；月关的《回到明朝当王爷》也是如此。在对当代的演绎中，由于是亲历主角重生，选择和后果的对应更加直接。瑞根《官道无疆》里的陆为民重生到 20 世纪 90 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前夕，利用后见之明提前掌握政策变化，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走上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路。女性穿越也遵循类似模式，如《步步惊心》里，女主穿越前是遭遇上司打压、男友欺骗的小白领，一穿越就成了诸多皇子钟情的玛丽苏。这自然是通俗文学“爽文”机制影响的结果，但也确实能看到人们对新的掌控型人物形象的期待。这与现实的无力感，“启蒙的绝境”恰成反比，也正反映了类型化网络文学善于造梦或者说折射现实的能力。

不过，“新”中自有“旧”，前一阶段中的“痞气”——或者说由痞气而生发的对何为“自然”人性的理解以及对主流道德“伪善”的体认——以及慕容雪村所主张的“道德与文学无关论”依然得以保留与发扬。这不仅表现为主角们都不以“好人”自居，而且在叙事中还质疑那些“好人好事”的行事动机以及公平无私的真实面目。例如《凡人修仙传》里主角韩立的三师兄刘靖由于幼年时被邪修掳走过，因而当修炼有成，常以主动灭杀邪修为人生追求，并因此赢得了巨大的正面声望。但叙事者明显没有将其塑造成修仙界“楷模”的企图，而是一边叙述一边解构，揶揄刘靖不过是“渐渐迷恋上了这种受人尊崇的感觉”“大半是为了享受他人的敬仰之色而已”，最后直接将其写死，让其在死亡的威胁下彻底暴露自己。相比而言，多少有些“黑化”的韩立才是活得真实的，也活得更为长久。无罪《通天之路》里，甚至戳穿所有道貌岸然大门派的虚伪面目，而把一个名为魏索的猥琐“散修”小人物树立成了让人喜爱的形象。

除此以外，他们对既定规则 / 权力体系也越来越采取顺从的姿态。而这种认同，也是有网络文学内在基础的。在《悟空传》里，我们就看到了这种发展的倾向。不过，如果说《悟空传》的规则顺从是主体被强力压制的结果，规则始终外在于主体，那么类型化网文则是通过“金手指”将规则内化了。“金手指”以及其它所有化解矛盾的神奇方式的大量出现，表面上意味着对规则的不满，但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能发挥神奇的作用，全赖于这些规则的满血运转。“打脸”、“打怪”，莫不如此，只有别人全在规则中，“我”才能利用这些规则脱颖而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主角所想的不是去批判、改变与反思，而是如何为我所用。不仅玄幻、穿越、重生，甚至官场、职场类网文莫不如此。大家的关注点和爽点都在“打怪”之后的“升级”。比如《侯卫东官场笔记》虽然也有对人性、权力与制度的反思（这是传统官场小说的重点书写对象），但主要还是聚焦在侯卫东一步步升迁的过程，看他如何在暗流汹涌的官场中运用自身的强大能力脱颖而出的。这依然是“升级文”，官场的级别与修仙的层级实际上并无二致。而关注“升级”，也就必然要重新界定外部世界的性质（所谓“丛林法则”的世界）以及我与世界的关系（即疏离、对立又顺从、利用），从而进一步突出了自我，使得活下去并活得好的生存技术考量远大于活得善与安心的道德考量。

这自然会招来不少从道德角度出发的批评，其中最典型的是来自陶东风的一系列文章，前文就曾提及，他相当不满网文中所弥漫的“非道德化”与“犬儒主义”，并从 80 后“游戏机一代”的成长环境中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这不仅批评了网文，也批评了与网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80 后青年一代，认为他们“一方面在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下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坏者为王”的逻辑，不择手段地捞取现实利益，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游戏等手段打发自己的无聊，发泄自己的剩余精力。”[6] 这一论点是在考察 2005 年度由新浪网所

6　陶东风 . 游戏机一代的架空世界——“玄幻文学”引发的思考 [J]. 文艺争鸣 ,2007(04):36-40.

评出的“最佳玄幻文学”前三名作品《诛仙》、《小兵传奇》与《坏蛋是怎么炼成的》而得出的，之后又针对《甄嬛传》批评了其中的“比坏心理”，认为它腐蚀了社会道德[7]。

这种为网络文学与当代青年（亚）文化把脉与诊断的方式，自然有一定的准确性与合理性，但是一味停留在指责上，却也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其中的积极性与合理因素。怎样理解非道德化、犬儒主义甚至充满“负能量”的主角形象的积极与合理性呢？当然不能从其自身上发掘，而应从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上去分析。中国文化向来有“伦理本位”的特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义与无私，反对讲利益与私心。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其结果很容易造成人的表里不一，甚至滋生出相当普遍的“表演性”人格。中国文化中的这种消极面向，早在“五四”时期就引起过新文化人士的高度注意，如鲁迅就曾化大力气痛评过国人的“做戏”性质，但这种现象似乎至今依然有存留。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规则顺从还是犬儒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也是由于“表里不一”文化所带来的，“利己”之所以要“精致”，就是一种把“利己”装扮起来好以虚假好看面目现于人前的结果。另一方面，尽管当下中国“犬儒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确实盛行，但基本上一经谈起就要在祭起的道德主义大旗下被打入另册，很难得到更为深入的讨论，更不用谈妥善的引导和转化了。不愿意正视“私”，甚至严密防范“私”，很有可能逼迫“私”以一种更具破坏力的方式登场。在此意义上，网络文学以较为正面的态度想象和创作大量自私而顺从的个体，将个体的自私性等问题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让问题浮上水面，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反抗性，所以自有其正面意义。更何况，那些主角们也并非毫无原则与底线，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一直在努力追求“自由”（更多是以赛亚·柏林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即免于被他者、世界所压迫、吞噬的自由）和维护“本心”（尽管含义模糊），此外他们对勤勉奋斗的执着和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珍惜维护（在

7　陶东风．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 [N]. 人民日报 ,2013-09-19(008).

玄幻等网络小说中，亲朋爱人往往是主角的“逆鳞”，不容侵犯，否则就会遭到主角的疯狂报复），都包含了一定的“正能量”。这些品质正是主角与反派们最大的区别所在，后者的无所顾忌、毫无廉耻与不择手段处处反衬着主角内心所拥有的对基本道德的坚守。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正如邵燕君所说，由于这种原始朴素的道德观是从“在欲望深处升起来的”，所以“特别靠得住，是重建‘主流价值观’的基础。”[8]

当然要一再重申的是,这里并不是说欲望本身就真得能“倒逼出”更为合理、良善的人性，“主观为自己”与“客观为他人”之间还间隔了好多个精细的转化。贺照田在分析 1980 年代的“潘晓讨论”时曾指出，“要真的建设性面对潘晓的问题，就必需思考如下问题：如何在顺承、转化此宝贵的理想主义激情，为此理想主义激情找到新的稳固的支点的同时，消化和吸收因此理想主义的挫折所产生的强烈虚无感、幻灭感能量和冲力。”[9] 这给本文带来了一定的启发，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网络文学的“真小人”气质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掘和重新唤醒其中潜藏的“文青气”与“理想主义”及其背后的精神思想传统，从而形成更好的转化与“升级”的契机。

不过，近两年网络文学所遭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在塑造人物上越来越要与主流价值观靠拢。因此，像唐家三少《斗罗大陆》这样的表现少男少女团结友爱努力修炼的“小白文”因不出差错而屡获各类推荐，以至成为了中国网络文学的代表[10]。尽管现实题材这两年被提倡，起点等网站上还专门辟出了“现实频道”，但从现状来看，反而造成了网络文学现实精神的缩窄，前文所说的“契机”也因此变得面目不清。

8　邵燕君 . 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 [J]. 名作欣赏 ,2015(16):63-66.

9　贺照田 . 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 [J]. 开放时代 ,2010(07):5-44.

10　许苗苗 . 网络文学 20 年发展及其社会文化价值 [J]. 中州学刊 ,2018(07):146-150.

关于网络文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反思与期待

■　黄艳明

网络文学的诞生及发展与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阶段、国家的宏观调控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由于其具有很强的更新节奏，传播范围及阅读群体庞大，所以网络文学作品对应的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微电影、游戏等多方位的版权也同样得到了重视，可以说发展至今，网络文学作品的版权所创造的价值已经今非昔比。

作为国内建站较早的一批文学网站中的一员，我们晋江文学城有幸陪伴着网络文学走过了“婴儿时期”和“幼儿时期”，直到现在的“少年时期”，也与整个行业一起经历了这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亲眼见证了网络文学的迅速发展，其影响之广泛也让人始料未及，但仔细想想又是情理之中的事。

一、网络文学源起与收益模式的转变

（一）非功利阶段

1998 年，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爆红，标志着网络文学的诞生。也是在那一年，华语文学门户网站“榕树下”创立，聚集了安妮宝贝、宁财神、

* 黄艳明，晋江文学城创始人、站长，2003 年创办了晋江文学城，在网络文学领域有十余年的实际工作经验，负责晋江文学城网站的初期组建及后期管理工作，使晋江文学城从一个简单的文学爱好者的集散地快速且稳健地成长为行业内的翘楚。

李寻欢、蔡骏、今何在等一批在华语文学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99 年 7 月，晋江万维信息网成立，晋江文学城作为其组成部分，随之成立。这一时期是网络文学的发展初期，这一阶段的主要参与者是文学爱好者，他们把文学作品发表在网络上，主要是为了解决传统文学投稿、出版相对较难的问题，以较低的门槛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收获心理的满足感。这个时期的网络文学作者基本没有经济目的，也基本没有实现经济目的的可行方式。因此当时的创作，无论是从形式上，题材上，还是写作方式上，都非常自由和自我，追求内心的真实表达，通常写作速度会很慢，也不过于注重与读者的交互。

（二）出版阶段

2002-2003 年间，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计算机及互联网的普及率有了很大的提升。由于同好者众多，且对网络文学有了一定的接触，大家对阅读和发表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一大批原创文学网站在此阶段开始建立并快速发展，包括幻剑书盟、龙的天空、起点中文、晋江文学等。而且这一阶段，网络文学的经济价值也逐渐被出版社发现，处于金字塔顶端、特别受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品开始被市场认同，网络文学进入可取得经济效益的出版时代。一系列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开始实体化。当时的实体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言情类作品在大陆出版，比如《泡沫之夏》《何以笙箫默》《梦回大清》等，一个是玄幻奇幻类作品在台湾出版，比如《飘渺之旅》《小兵传奇》等。

实体出版是当时唯一的可以使作品实现经济收入的方式，同时，实体出版也代表了更高程度的文学水准认同。这导致当时绝大多数网络作者的写作状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题材的选择不再像第一阶段那样天马行空，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容易出版的类型；女生的言情小说开始大量诞生，男生

的玄幻奇幻无比繁荣，原本占据网络文学重头的武侠小说开始没落。

这一阶段文学网站普遍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推荐出版、收取代理费，因此，这一阶段文学网站对于作品的推荐，也主要是看作品适合不适合出版。长期合作的出版社也会非常认同文学网站的推荐榜单。比如晋江文学城的官方推荐榜，就曾经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每一本上榜作品都能得到出版。

（三）VIP 收费阶段

网络文学步入出版时代后，其创作形式与传播方式就开始受到市场机制的强烈影响，然而，能够出版的作品毕竟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少量作品，一个网站几十万作者，每年能够出版的作品不过几百本，这一数量显然不能满足广大作者和读者的需求，所以网络文学的 VIP 付费阅读应运而生。晋江文学城于 2008 年开始施行 vip 收费阅读制度，至此各大文学网站基本全部完成 vip 收费商业模式的转化。

VIP 付费阅读制度将在出版阶段只有极少数作者可以获得经济利益的作者数量扩大到了成千上万，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国民对于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加，版权意识也有所觉醒，所以作者通过网络文学创作获得的经济利益的数额也有大幅提升。

有很大一部分作者可以通过 VIP 制度来获取不低于工资的收入，得以全职投入创作。故他们便不再以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参与到网络文学中来，而更加具有专业性和专注性。他们会有目的地研究如何创作可以更好地获得收入，从而总结出一些写作的经验和套路。

在 VIP 制度下，文字变现的即时性远远超过出版，发表的当天即开始收获，文章是不是受欢迎，卖得好不好，有最真实和直接的数据反馈。这

时期的作者读者互动性空前增强。甚至出现了打赏、催更等直接用金钱来反映喜爱程度的方式。

二、付费模式与网络文学的新特质、新问题

（一）付费网文的新特质

由于变现的即时性，更新字数直接影响月收入，这一阶段，网络文学的更新字数开始呈现爆发性增长。二十万字精雕细琢三五个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一个普通的全职网络作者，平均收入水平是千字三十元的话，每天保持六千字的更新量，才能保证月收入在五千元以上。因此，全职作者的更新压力非常大。

也是由于字数变现的即时性，文学网站整体更新字数与收入的相关度同样非常高，因此在推荐上，会绝对性地倾向千字收入高，以及更新速度快的文章。要提高千字收入，相当于要提高作者写作水平，这一点非一夕之功，因此，更多时候，网站推荐的重点也会落在更新字数上。

由于更新量大，这一阶段的网络文学作品呈现出字数长、更新快、故事性强、文字不洗练的特点，俗称“注水”。尽管“注水”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但是由于连载的特点，在内容精练但好几天更新一次的焦急感和内容“注水”但每天都大量更新文章的比较之下，读者宁可选择大量更新的“注水”文以缓解对于故事后续发展的渴望。

在作者、网站、读者三方的合力下，同等精彩程度的作品，更新快的比更新慢的更受欢迎。这是这一时代传播的特点之一。

相较于文字水平的下降，这一时代的内容创新却特别出色。由于电脑屏幕大，鼠标操作简单，一个文学网站首页内页各种推荐榜单加起来，一

期总共可以推荐大约五千篇文章，再加上按类型定制的搜索和排序等功能，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有可能被人找到看到，这大大增强了网络文学的长尾效应。[1]

由于长尾效应的增强，让更多的作者可以放心尝试新的类型和题材，不害怕找不到同好的读者。这是网络文学创新的黄金时代，许多别具创意的流派或桥段，都是在这个时代诞生的，比如无限流、随身空间、种田文、重生、盗墓等等。

（二）利益引发的新问题

但是同样，每一个火热的创新点，都会迅速引起跟风写作。一个题材火了，模仿的同题材作品会迅速产生。但是由于之前提到的，文学网站拥有海量推荐位，跟风写作会带来一个个潮流，却很难将整个网站淹没。

另一个问题是，由于 VIP 制度的实行，盗版网站便有了生存空间。这一时代的传播媒介不再是正版文学网站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有统计表明，同一篇文章，在所有盗版网站的点击之和，大约是正版网站的十倍。一篇文章的读者数与它的应实现收入是不能简单计算的。盗版网站的存在，虽然损害了作品与作者的利益，但在扩大传播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不过这部分外延的传播，变成收入的转化率相当之低。

三、手机阅读、新市场机制与网络文学的再次转变

随着手机和移动网络的普及，人们的工作、生活开始与手机紧密结合

1　编者注：“头”（head）和“尾”（tail）是统计学名词。正态曲线中间的突起部分叫“头”；两边相对平缓的部分叫“尾”。长尾效应通常指将非流行的、零碎、个性化的需求充分利用，形成一个更大的市场。

起来，网络文学阅读终端也顺应时代的发展，开始由电脑端向手机端转移。2014 年左右，各个文学网站的阅读 app 逐渐面世，网络文学迎来了手机时代。

在这之后的几年，如我们所见，智能手机的流行，使得电脑的使用率迅速下滑。手机占据了生活中大量的碎片时间，原网络文学的读者，其阅读行为也越来越多地发生于手机。

从积极方面来看，手机能够比电脑更加有效地利用碎片时间，因此读者的总体阅读量有所提高，相应的作品收入也会提高。然而从另一方面去观察，出于便携的考虑，手机的屏幕相较于电脑，非常小，手机的点触操作，相较于电脑上的鼠标操作，也不够精细。因此，手机上的文学网站无法再像电脑上一样，提供足够多的推荐位和足够方便的搜索排序方式，以致于长尾效应会在手机上不断减弱，而马太效应[2]则会越来越强。

这将导致收入开始迅速地向更少的作品集中，成功者更加成功，但成功者会越来越少；同时，为了降低风险，后来者的跟风行为会越来越多，创新行为则会越来越少。这最终导致题材的雷同淹没作者的创新行为，以及安心全职写作的作者减少，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历史的螺旋上升，换了一种展示形式，回到了实体出版时代那种金字塔结构。

在这样的市场机制下，网络文学的传播也会产生相同的由长尾效应转向马太效应的变化。另外，手机阅读的 app 化，让作品不再是统一一个浏览器，而是被分隔于不同的 app 之间，读者搜索和阅读盗文变得麻烦起来，而推广盗版 app 的风险则会增加，这让盗版的传播比以前困难了，对于正版文学网站来说，是一个不幸中的好消息。

2　编者注：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指两极分化现象。在《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中有此说法：“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四、IP热与文学盈利模式的飞跃

网络文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慢慢占据大众文化的主流地位，而大众文化，本身就是各种影视游戏的基础。所以，网络文学 IP 化，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只是它需要一个契机。在此契机之前，影视游戏作品大都遵循着传统方式由编剧来撰写原创剧本或脚本，虽然零星也会有一些网络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游戏，但都不是因其网络文学的特殊身份，只是一部有名或优秀的作品被改编，而它恰好是网络文学。直到 2015 年网剧《盗墓笔记》和《花千骨》的热映取得巨大成功，才引爆了 IP 这个概念，网络文学正式进入影视游戏制作人的视野。

同年《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由新华社全文播发，其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网络文艺，推动网络文学等新兴文艺类型繁荣有序发展。有了国家政策的扶持和改编成功的案例， IP 热现象产生。

IP 开发和运营将“读者”范围从原来的网络文字阅读者拓展到纸书阅读者、电影电视观赏者、游戏玩家等更广阔的的受众群体，也就跳出了纯网文读者这一范畴，形成了新的“全 IP 读者金字塔”，所面对的受众广阔无垠，变成了一种全民作品。相对于原来的“网文读者金字塔”，新的“全 IP 读者金字塔”基数更大，其主要群体更具有社会主流性，也必然更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大 IP 之所以“大”，就是因为它已经超脱了网络文学作品，成为了一部全民作品。而能够成为大热 IP 的作品无一不是具有独特性，精雕细琢，经过长时间发酵，读者沉淀筛选出来的精品。IP 热标志着更多网文作者渴望突破、渴望超越的心情，这无疑对网络文学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有巨大的正面影响。很多辛辛苦苦耕耘的作者通过 IP 的转化，极大的提升了作品的价值，这给追求短平快的网络文学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使网络文学作品的成功又有了一种新的模式。从收入来看，以前作者创作出

一部作品，可以出版一本书，收入两三万元；进入到 VIP 时代，一部作品如果有幸拿到重要推荐，可能收入十来万；而进入到 IP 时代以后，被选中的作品基本上百万元起步。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IP 热使网络文学出现了题材更加窄化的现象。因为一部作品的 IP 转化可能带来上百万或者上千万的收益，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但是这个机会太少了，比如改编影视连续剧，一年全网顶多有一百部作品可以获得这个机会，这一百个机会作者会怎样去争取？哪个题材更受欢迎？作者会去衡量，网站也会去衡量。这使得作品间的竞争更激烈了，作品题材进一步窄化，作者创作倾向进一步集中的现象更加突出。

与此同时，现在国家政策也会对作者在创作题材上的选择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近一阶段在大力倡导现实题材作品的创作，一些原本擅长现代题材作品创作的作者会继续执着于现实题材作品，很难愿意进行其他类型题材的尝试了；一些原本擅长古代题材创作的作者为了赶上这波利好的政策，也会尝试进行现代类作品的创作。IP 热潮把作品的类型集中到一两个方向，但作为在网文行业十几年的我们其实更愿意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五、从业者的一些思考和期待

作为十多年的从业者，我认为网络文学经营者不能只把眼光放于网络，单纯追求短平快的网络成绩和由此带来的商业价值，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同样不可小觑。以《花千骨》为例，其书籍已经在东南亚发行，广受好评，并有泰国、日本的电视机构商洽购片。这对于中华文化在当今时代的文化传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是在走出去的号召下软实力的体现。

中国的网络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一枝独秀，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播着中国文化。在海量发表读者选优的基础上，在庞大的国内电子阅读市场的多年培育下，网络诞生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和一支有能力从事写作，也有足够的收入可以维持写作的网络作者队伍，同时诞生了庞大的读者群作为他们的后勤保障。这样的一支历经十多年“战火”考验的队伍，是国外完全不具备的，也是我们的作品走出去的根本原因。这支成熟的作者队伍以及读者后勤，是经由十多年的市场行为反复磨合形成的，是不断试错再反复纠正后取得的成果。

我们晋江从 2011 年与越南签署第一份版权合同，便开始了版权海外输出。至今已向包括越南、泰国等国家输出版权作品 500 余部，合作模式包括：授权海外图书出版（将作品翻译成当地文字进行图书出版）、信息网络传播权向海外输出（将作品翻译成当地文字在网络或手持移动端发布）、文学作品在国内已经改编出的成品，以成品的形式（如影视作品）在当地电视台或视频网站等平台播出。

对于今后的发展，我们认为主要还是要以内容为核心发展新的市场以及开拓新的模式，虽然晋江在海外版权输出方面很早就开始了，但是受限于转化成本、文化辐射度等原因，主要的对外输出国家还是以东亚、东南亚地区为主。目前我们在努力拓展，希望以新颖的题材内容（不仅限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内容，如仙侠等）开拓新的市场，不再仅限于亚洲国家。同时也希望能够和更多的合作方进行多元化的合作，开发新的模式，降低海外输出的成本，能更多更好地将作品输出到海外。

最后，倡议文学网站尽量在本站内容多元化方面做出尝试，不要因为短期商业利益而让编辑影响作者的创作自由。“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呼吁反对“网络八股文”，争取为中华民族奉献绚烂多彩的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化对外输出多做一些贡献。

普遍贫困的时代

■ 姜来熙 *

许多 ** 译　郝玉满 *** 校

当今世界在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下，最令人不安的状况莫过于人们并没有携手抵抗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困境，反而陷入了互相敌对。新自由主义越是造成社会不公，人们似乎越会陷入到互相敌对和仇恨中。韩国自 1990 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进程加速，而这正是韩国正在发生的状况。韩国近年来由仇恨引发的冲突和犯罪急剧增多。比如女权分子相比以往，更多地采取了“镜像复制”的策略来对抗右翼男权主义，即依样采取了他们的做法。尽管这种反应情有可原，问题在于“以牙还牙”并不能消灭施暴者和暴行。只要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还在盛行，暴行总会找到足够的营养存活下来。我们急需克服当下的困局，搞清楚这种状况是如何产生的同样很重要。这就意味着，必须仔细分析和探究造成当下困局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之所以各种社会群体纷纷陷入不断升级的互相敌对，关键在于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基本生活资源的普遍匮乏，比如工作机会、收入、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当然更可恶的是，新自由主义蓄意造成了这种普遍的匮乏。更糟糕的是，这种困乏越来越泛滥，会殃及越来越多的人。我会通过韩国的种种案例，试图考察今天为什么变成了普遍匮乏的时代，以及我们如何应对。

* 姜来熙（KANG Nae-hui），韩国中央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韩国《文化/科学》期刊创办人。
** 许多，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 郝玉满，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一

在 2010 年代前几年，韩国的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叫 Ilbe 的极右翼团体，异常激进的身份政治开始显现出最邪恶的样子。这个团体的成员在网上宣泄前所未见的仇恨言论和行为。他们公然宣扬男权统治，歧视女性，还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其他社会少数群体。女性、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变性人、残疾人、移民劳工、左派活动家和自由派政治家往往成为被攻击的对象。2014 年 4 月的世越号沉船事故造成 304 人丧生，而且绝大部分死者是高中生，这时候几个 Ilbe 成员甚至出来攻击受害者家属！当家属们在光华门广场上静坐抗议当局推卸责任，这几个 Ilbe 成员当着死难者家属的狂欢胡闹、大吃大喝，嚣张地吃着披萨、炸鸡和方便面。2016 年 5 月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在首尔地铁江南站10号出口旁边的一间公共厕所里，一名三十出头的男子无端杀害了一名年轻女子。很多女性感到恐慌，觉得任何一个女性都可能成为男性暴力的牺牲品，于是开始组织起来。惨案发生后，她们立刻把江南站的 10 号出口打造成缅怀死者的空间，市民们纷纷赶来，向死者表达哀思，把印着悼词的海报贴在墙上。这时一名 Ilbe 成员来“献”花圈砸场子，更激化了人们的愤怒。花圈上挂着一条标语，上面写着“不要忘记在天安号上死去的战士，他们都是男人”。天安号是韩国海军的一条小型护卫舰，2010 年在北朝鲜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 104 名船员，最终 46 人遇难。尽管韩国官方调查说北朝鲜是幕后黑手，但沉船的真正原因仍有争议。一些女权主义者发起集会，悼念凶杀死难者，抗议男性对女性的仇恨和残害，这时另一名 Ilbe 成员穿着连体衣，戴着头盔，装扮成粉红色的大象，突然出现在集会上捣乱。虽然他声称“男人和女人携手共创更安全的韩国”，但是他夸张的装扮只会激起女权主义者的怀疑和愤怒。

当然，反对妇女的行动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在 2015 年 8 月，一帮女性主义者在网上成立了一个名叫 Megalia 的团体，开始发起反对男性的斗争。Megalia 成立时正值中东呼吸综合症在韩国爆发，两名韩国女人在从首尔飞往香港度假的航班上被确诊感染，一些韩国男人大肆攻击这两名女性，认为她们拒绝被隔离治疗，Megalia 要反击这类污蔑。韩国有一个很红的网络论坛叫 DC Inside，上面一些男人恶毒地批评和攻击染病的女性，骂她们太自私，说她们去国外丢韩国的脸，骂她们“泡菜婊子”（就是说成天只想着买买买）或节衣缩食去买奢侈品的“大酱女孩”（大酱是一种很廉价的炖菜）。虽然后来谣言被澄清了，但是论坛上的女性用户联合起来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抗议幼稚的、过激的仇女言论。她们对男人的批评反唇相讥，骂他们“泡菜男人”或“hannamchung”（可怜的韩国人渣）。一些女权主义活动者认为，这种反击行为更像是“一报还一报”，“采取同样恶毒的语言去反击男人”。比如一些女性主义者更激进，痛斥骗婚的男同性恋。

Megalia 的出现标志着韩国正在兴起一股凶悍的女权运动，尽管 Megalia 的激进程度跟 Womad 相比就相形见绌了。Womad 是另一个网上的女权团体，由于和 Megalia 的成员就如何看待男同性恋的问题有了分歧，于是脱离了 Megalia，自立门户。前面提到过，Megalia 也在排斥男性的性少数者，但只是攻击“捣乱的人”，比如骗婚的男同性恋。但是还有一些女权分子遇到男人就一定要排斥，激愤到排斥一切男同性恋的地步。这个分歧“造成了社团的分裂，促成了 Womad 的成立”。Womad 甚至断然否认少数群体的权利，经常取笑和嫌恶任何“带把儿”的男性，甚至包括婴儿、残疾人，激烈到了如此地步。

去年 5 月，一名女体模特被逮捕，因为她在大学课堂上拍摄男同事的裸照并发到了网上，而这名女裸体模特儿正是 Womad 的成

员。然而她的被捕在妇女群体中激起千层浪。媒体大肆报道这次逮捕，女性主义活动家们于是组织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集会，谴责韩国社会风行的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这次集会尤其针对警察对非法拍摄存在的明显双标。5 月 18 号爆发了第一场集会，吸引了 12000 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抗议领袖说：“与之前大多数非法拍摄受害者都是女性时不同，这次弘益大学拍摄男性落体模特的非法拍摄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巨大的关注……警察反应出奇迅捷有效，简直前所未见，这是针对不同受害者的偏颇执法。”6 月 9 号举行了第二场集会，规模更庞大，参与人数达到了 22000 人，抗议者举着标牌，上面写着“我的生活不是你的黄片”。不用说，去年世界各地已经开始爆发了 #MeToo# 运动，激发了韩国妇女对仇女文化和权力滥用的义愤。在第二场集会上，妇女对韩国男人的不信任已经高到不可思议，她们甚至不准男记者接近集会中心，遑论采访报道。只要有男人胆敢拍照，一律驱逐！7 月 7 号第三场集会有 60000 人出席，声讨韩国的男权统治，现场出现了更多的标牌，比如上面写着“你有鸡巴，你就没罪。你没鸡巴，你就有罪”。8 月上旬还爆发了一场集会，据组织者称有 70000 人参加。

二

无论反动的男权至上团体，还是极端的女权团体，显然都出现了激进化的倾向，我们需要将其放在历史语境中理解，重新思考身份政治最早在韩国是怎么形成的。1990 年代早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是重建自由民主体制的后果。经过几十年的民主化运动，韩国的军事独裁政权在 1987 年垮台。韩国颁布了新的宪法，重要的社会机构都被解除了官方限制。很多自由派政治家以前被禁止从政，现在都能参选了。出版社、广播、电影、戏剧、流行音乐、游戏等

组成的媒体工业以前受到集权政府的严格控制和审查，如今已经彻底开放了，可以随便参与市场竞争。大财团的商业活动也不受政府的直接干预了。更重要的是身份政治兴起了，由此自由民主体制造成了新的社会状况，少数群体（包括妇女、年轻人、性少数、残疾人和外来劳工）都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了。但是可以说这种身份政治也给标榜进步的社会运动带来了一些麻烦。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考察历史，才能理解这个状况。

关键是要指出，自由民主体制造成的新政治不仅是对威权独裁遗产的回应，还是对 1980 年代民主化运动中男权文化反动性一面的回应。一方面，身份政治可以说是对少数群体权利长期被忽视的抗议。在军事独裁时期，人们的个人欲望完全被压制，甚至到了重建自由民主的时代，情况也没有多少改观。自由民主体制向少数群体郑重保证，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需求。于是，尽管少数群体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心声，社会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只会把他们映衬得更讨厌，在那些自诩“正常”的人眼里，少数群体太张狂，太有攻击性。少数群体的崛起让 Ilbe 成员感到了恶心和仇恨。我会在后面解释为什么 Ilbe 成员会这么反应。

在民主运动这边，情况也没什么两样。旧的运动直到 1990 年代中期还有很大影响力，看起来非常像他们顽强抵抗的集权体制。集权国家动员人们的方式是，把他们啮合成一个集体，拥有统一的身份。他们是韩国人、工人、士兵、学生，唯独不是个人。民主运动圈子的状况也差不多，活动家和参与者们被认为只是推动运动的一个环节，而不能是自主的人，被要求为了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勇敢牺牲。虽然这种信仰推动了民主进程，但是民主运动的文化还是跟威权文化一样反动，缺乏人性关怀，漠视人们的关切和欲望。最后，民主运动圈内圈外怨声载道，以至于斗争传统也很难维持下

去。随着自由民主体制的重建，人们不仅批判集权，也批评民主运动的文化本身。

身份政治在 1990 年代后期的兴起，要放到以上背景里才能理解。1990 年代后期，一个叫“100 名女性的委员会”的秘密女权团体发起了一项严重指控，震惊了左翼运动圈。该团体揭露，进步运动的圈子里也普遍存在性暴力。她们曝光了一批涉嫌性侵女同志的男性活动家。这次严正的谴责让左翼圈子关注到了进步运动内部的男权中心主义，同时身份政治在进步运动内也开始引人注目。从此女性反抗男权统治的抗议之声就没有停息过。

韩国重建自由民主时期，身份政治越发活跃的另一个证据是年轻一代对社会运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回顾进步运动的历史，韩国的年轻人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在 1960 年四月革命中，高中生和大学生在推翻独裁总统李承晚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到了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也正是大学生在英勇反抗朴正熙和全斗焕的军事独裁政权。没有人可以否认年轻人在韩国民主运动中的力量和影响力。然而到了 1990 年代早期，进步运动的风气开始变化。新的社会运动提出了挑战，要求现在多多少少应该关注人们个人欲望的重要性。1993 年《新生代，为所欲为》的宣言发表正是变化的明证，一些运动参与者站出来宣称，年轻一代应该抵制旧运动圈子的文化，因为它打着集体利益的名义压制了私人欲望和个人幸福。

除了妇女和年轻人，其他少数群体也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韩国在 1990 年代早期也开始兴起性别政治。男女同性恋在那几年开始公开宣示自己的性取向。残疾人和外来劳工不久也开始发生自己的声音。因此，这些群体开始参加游行，让自己的声音可以被更多人听见。可以说，韩国的身份政治在 1990 年代兴起，正是韩国社会变得越来越民主和自由的时候。

三

然而我们还需要了解，经过多年的发展，为何身份政治变成了今天这么激进的形式。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回过头仔细考察身份政治在韩国兴起的那个历史时刻。前面已提到过，正是在自由民主体制开始重建的时期，一种新的身份政治作为新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开始兴起，新的政治环境正是身份政治的社会土壤。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尽管自由民主体制的确立让社会少数群体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自由民主体制本身还有缺陷，还值得怀疑，很难说得上是完备的民主。

当然，自由民主体制的重建肯定是一种可喜的进步，改善了政治环境，但仅仅带来了不完整的民主。别的不说，这是军事独裁势力和民主势力妥协的结果。在军事独裁时期，绝大多数反独裁人士被完全禁止参政。1987 年的修宪改善了政治条件，但只有自由派获得了跟独裁势力竞争的资格，而独裁势力没有受到政治上的清算。相反，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曾经积极参与了激进的民主化转型，但如今在政治舞台上完全被边缘化了。虽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需要解释，但我们仍然可以说自由民主体制的重建过程失掉了进步运动的一些宝贵财富，导致了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大量运动人士心灰意冷脱离运动。

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1980 年代社会运动的遗产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不断被简化，即使说还没有丢掉全部的财富，前面所说的新社会运动的崛起也是这种简化的后果。旧的社会运动艰苦卓绝，致力于推翻独裁政权，夺取国家政权。相反，新兴的社会运动采取了更偏向市民社会或公民权的路子。虽然新旧社会运动之间还存在斗争和合作，但是毫无疑问旧的路子越来越难赢得民心，而新的运动

强调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和参与性，已经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自由民主体制的重建跟新自由主义在韩国作为规范确立下来是同时发生的。朴正熙政权首先把新自由主义引进韩国。韩国政府把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改革的策略引进来，在1979年4月发布了经济稳定计划，要求放松国家对资本活动的管控。但是朴正熙不久就被暗杀了，全斗涣发动另一场军事政变上台，继续整合和推进1980年代早期确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全斗涣的军事独裁政权让新自由主义在韩国打下了更坚实的根基。独裁政权不仅把新自由主义运用到经济领域，而且还运用到了文化领域。但是全斗涣政权没有存活太久，来不及把新自由主义确立成稳定的政治策略就垮台了。对于韩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新自由主义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此外，全斗焕政权完全没有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其在1980年的光州事件中杀害了至少606名平民。这样一来，全的政权面临来自社会运动持续不断的挑战。韩国的统治阶级把自由民主体制的重建当做救命稻草，目的是进一步推进新自由主义。然而这就使得重建的自由民主推动社会运动的能量极其有限。至少部分身份政治的激进化的倾向需要放到这个历史背景中才能理解。尽管自由民主体制保障了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但只有当少数群体的诉求威胁不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时候才会保护他们。对于少数群体来说，新社会运动的核心诉求还是改良主义式的，对改善少数群体的境遇作用不大，因为新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还是一种“批评性的支持”。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交，韩国陆续成立了一些重要的市民社会组织，直到今天还有很大影响力，如公民经济正义联盟、参与式民主联合会、韩国环境运动联盟、韩国妇女

团体联合会。所有这些组织多多少少都具有改良主义的性质，因为都支持和推进参与式民主。韩国妇女团体联合会和韩国环境运动联盟都是新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都致力于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革，这两个团体对待社会改革的态度都是自由派的，社会运动会跟这两个团体合作。结果包括身份政治和环保运动在内的韩国社会运动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抉择，一边是 1980 年代社会运动的革命路线，一边是市民社会运动的改良主义路线。正如前面所说，重要的市民社会组织都认为前一种路线已经快失效了，都倾向于遵循改良主义的路线。但是就像旧社会运动长期秉持的态度，这个选择也给韩国的社会运动带来了难解之谜，不知道怎么处理新的任务。韩国从 1990 年代早期开始面临各种新的社会议题，如言论自由、文化权利、性工作者、同性恋权利和外来劳工，这些议题从前完全被独裁政权忽视，也没有被纳入旧社会运动的视野。然而，现在市民社会组织号称代表了新社会运动的方向，也漠视这些议题！

新自由主义同时在高歌猛进。全斗涣政权在 1980 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但遭到了社会运动的猛烈抵抗。但是随着自由民主体制的重建，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获得了一种合法性，这在独裁政权下简直不可想象。部分原因在于 1990 年代的市民社会运动多多少少都支持新自由主义，现在代表 1980 年代运动遗风的团体，包括韩国总工会、韩国农民联盟和全国无房者大联盟等，都眼看着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急速衰落。1990 年代后期情况变得更糟糕，韩国被外国资本和商品猛烈冲击，社会危机日益深重。韩国政府到这个时候仍然在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好在还能保持国家的自主性，有能力控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程度和步骤。但是直到韩国当局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全盘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了一揽子救市方案，新自由主义改革才完全臣服于外国资本的要求，而这正是救市方案

夹带的私货。韩国的社会运动这时候也束手无策，没能阻止新自由主义化造成的社会灾难：大银行倒闭、大量失业、家庭解体、自杀流行。

我们还有必要指出，即使金大中上台后，新自由主义仍在猛烈推进。人们普遍认为，在 1980 年代出名的政治家中，金大中是最进步的一位，比金泳三还具有进步色彩。金泳三与独裁势力合作赢得了 1992 年大选。但是金大中政府对新自由主义的深化更是“居功至伟”。正是金大中政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虚拟化的资本市场，引进了一系列金融机制，如金融衍生品、项目融资、资产担保证券、抵押贷款、资产担保商业本票、共同基金、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房地产投资。新自由主义体制最重要的资本增值策略就是金融化，于是韩国民众被迫背上巨额债务，生活从此被毁灭。但是值得玩味的是，韩国的社会运动对金融化的抵抗很弱，市民社会运动方面的抵抗尤其弱。实际上，市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以及来自身份政治的合作者与自由民主政府携手促进新自由主义政策，当然他们还是会偶尔批评一下新自由主义过激的地方。

随着金融化的全面展开，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管理财产的方式彻底改变了。1997 年外汇危机爆发时，全国的家庭债务总额是 211 万亿韩元；到了朴槿惠政府垮台前（2016 年），数额飙升，超过了 1500 万亿韩元。全国 GDP 总量同时期增长了 3 倍，从 506 万亿上升到 1637 万亿。以 2017 年 3 月的数据为准，平均每一个韩国家庭欠银行和金融公司的债超过了 7000 万韩元（折合 65000 美元）。我们还必须指出，家庭债务飙升的同时，自杀率也在上升。1997 年金融危机以前，韩国很少有人自杀，但从此之后韩国的自杀率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高居榜首。

四

我们应该指出，反动性的身份政治正是在韩国自由民主体制下兴起的。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结构调整、私有化、弹性工作制和金融化。这些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大规模失业、工作环境恶化、房租上涨、家庭债务负担过重等，于是人们开始对自由派打出的民主口号感到失望和幻灭。即使是自由派的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也在推进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一般认为这两届政府比卢泰愚和金泳三代表的与独裁势力合作的政权更民主，于是人们觉得被背叛了。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以往年轻人比他们的父辈更进步，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投票给保守派的政客。他们在 2007 年大选中投给了现在身陷囹圄的李明博。2012 年大选的战况如出一辙，现在已经被弹劾的朴槿惠击败了文在寅。Ilbe 团体正是在这个语境下于 2010 年创立的。

现在不仅年轻一代的右翼分子站到了反动身份政治的前台摇旗呐喊，而且老一辈右派也粉墨登场，越来越引人注目。2016、2017 年之交的冬天，韩国爆发了长达数月的烛光游行，要求弹劾朴槿惠，惩罚腐败的朴槿惠政府，清算与权力勾结的大财团。同时在光华门广场对面，保守主义者也组织了一场支持朴槿惠的游行，其中不乏年轻人的身影，但主要成员还是老年人。他们捍卫朴槿惠的行为被看作跨越代际的回应，朴槿惠是被暗杀的独裁者朴正熙的女儿，朴正熙是他们成长年代的偶像，他们认可朴槿惠。他们年轻的时候正是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但是如今老被年轻一代口诛笔伐，觉得他们又老又反动。在朴槿惠被弹劾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太极旗纵队”，挥舞国旗组织游行，经常与反对朴槿惠的抗议者发生暴力冲突。太极旗纵队的成员大部分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右翼，排斥少数群体，特别厌恶 LGBTs。去年 6 月第十届大邱酷儿文化节举办时，

一帮反对同性恋的基督教徒阻挠性少数群体的节日游行，骂同性恋都是鸡奸犯。去年 7 月第十九届首尔酷儿文化节期间也发生了类似闹剧，“一帮反对同性恋的保守派悍然踢馆砸场子，除了反对同性恋，还反对劳工权利和难民。”

Ilbe、太极旗纵队和基督教徒对妇女、LGBTs、反政府抗议者和外来劳工释放的恶意和仇恨，正是今天韩国保守的身份政治的突出案例。虽然这些人罪不可赦，但更重要的是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在近来出现。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日渐稳固，韩国已经沦为最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 2014 年，全国最富有的 10% 和最贫穷的 10% 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了 56 倍！在 2012 年，全国最富有的 1% 占有总收入的 12.23%（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占第三位），最富有的 10% 占有 44.87% 的收入（第二高）。最高收入的集中与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是同步发生的。“2013 年的税务报表显示，最富有的 1% 占有 26% 的财富，最富有的 10% 占有 66% 的财富。”社会不平等还伴随着工作岗位的急剧减少，令穷人的生活雪上加霜。根据 2013 年的就业数据，官方宣称年轻人的失业率是 6.4%，大大低于很多国家。但是如果算上“尼特族”（NEETs），即“不满 30 岁，没有工作也没有上学的年轻人”，“15 到 29 岁年轻人的真实失业率”跟“欧盟国家差不多，达到了 22%”，而且这个数据仍然可能远远低估了就业状况的恶劣。稳定的工作岗位减少的同时，烂工作倒在增多，比如临时工、不稳定就业、低薪水岗位和那些自我剥削式的工作，韩国年轻人陷入了更恶劣的工作环境。老年人的处境也是灰暗绝望的。2011 年的数据显示，“韩国 48.6% 的老年人陷于贫困线以下，在 34 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是最高的。”

如果我们稍稍想想韩国人的处境，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工作环境恶劣，贫困缠身，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陷入了愈演愈烈的互相

敌视。当然并不只有韩国人遭遇了缺少工作机会、工作条件恶化和陷入贫穷等惨状，但是如果我们想了解状况的惨烈程度，有必要意识到由于韩国进步势力在政治上的软弱，韩国没有建立起坚实的福利系统来保护弱者。结果韩国青年沦为了“抛弃的一代”。一开始他们被看作“三抛弃”的一代，就是说他们为了渡过难关，只能放弃恋爱、婚姻和孩子。但是现在年轻人已经沦为“七抛弃”一代了，被迫放弃了社交、买房、理想和希望。毫不奇怪，年轻人把今天的韩国戏称为“万恶的朝鲜王朝”，500 年的朝鲜王朝被严酷的儒家等级秩序统治着，封建等级制一开始就决定了谁高人一等，谁永不可能出人头地。不仅年轻人感到绝望，而且老年人也心如死灰。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韩国 65 岁老人的自杀率是最高的，达到了每 100000 人就有 54.8 个人自杀，是平均自杀率的 3 倍。这一切都说明在自由民主体制的掩护下，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大多数人韩国人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找不到出路。

五

我认为，新自由主义统治造成的普遍贫困，在近年身份政治的崛起和泛滥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进程使得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生活资源越来越短缺的困境。Ilbe 的成员都很年轻，大多数才十多二十岁，顶多三十出头，也不能免于贫困。有研究证明，Ilbe 成员变得不安愤怒，主要是因为获得正常、体面生活的愿望落空了，好生活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虚无缥缈，比如上大学、谈恋爱、做体面的工作、买房、结婚等。当然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认清祸根，资本主义才是让他们失望的罪魁祸首，但是他们把怒气洒向了另一些新自由主义统治的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和少数群体。

鉴于 Ilbe 成员、太极旗纵队和反动基督教徒的仇恨暴行实在太

过分，以 Megalia 和 Womad 为代表的女性团体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就不足为奇了。虽然一些妇女团体的行径很荒谬，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反动的男权分子激起了妇女“一报还一报”的回击。但是问题在于，复制男权右翼分子的粗暴行径并不能消除导致反动性身份政治的社会土壤。尽管男权反动分子行为可耻，罪不可赦，但是把他们当做唯一的敌人就会搞错问题的症结。正是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普遍的贫困，使得无论老幼的男人都觉得他们应得的生活条件被其他势力窃取了。只要新自由主义不死，错认敌人、敌视其他社会群体的行为就不可能消失。

不仅差异性在决定人们的生活，而且共通性也在塑造人们今天的生活，换句话说，普遍的贫困是新自由主义蓄意造成的。今天就是普遍贫困的时代。新自由主义统治全球政治经济已近 40 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争抢有限的生活资源。大多数人对贫困已经习以为常，就不得不自相残杀，去争夺越来越少的资源。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异和对立也是由共通的经验造成的，就是说生活资源的短缺主宰了我们。因此我们应该关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共通经验，尽管也要同时留心不同群体的差异。在这个普遍贫困的时代，我们必须始终专注于共同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敌人，还有什么疑问吗？难道不是资本主义造成了普遍的贫困吗？

再暴力化与底层突围
——当下内地电影中的暴力叙事及其文化嬗变

■ 张登峰 *

摘要：暴力在江湖社会中、在“义气论”的观念支配下曾被赋予了合理的色彩，它成为解决个体争端的重要方式。然而伴随着社会的文明转型、法治体制的建立，江湖社会这一底层空间渐趋消逝，暴力也作为前现代的文化加以清理。然而，当法治试图使自身成为当下社会裁决正义的唯一尺度之时，它自身的公正性、公平性、公信力却遭遇滑坡，导致信任危机。暴力由此再度成为“弱者的武器”，对个体存在加以抗护。暴力的浮现是底层阶级替自己发声、由“沉默的大多数”向反抗的个体的被动转变。然而事实上他们的暴力举措却是无效的，这是由“主观暴力”在“体系性暴力”压迫之下的孱弱无力所内在决定的。对暴力的书写因而整体勾连起了个体与社会、正义与非义、困境与突围等多重维度，成为矛盾丛生的社会中重要的文化表征。

关键字：底层；主观暴力；体系性暴力；“弱者的武器”

所谓暴力，是指“为了个人利益的满足，旨在伤害受伤害者并不顾社会的制裁而采取的有意的、反社会的、使人遭受痛苦的行为。”[1] 暴力通常体现为对某一对象的毁灭式破坏，它既可以发生在物质现实的层面，包括对人的肉身性的摧毁或者对某一物体的毁坏，也可以发生在精神层面，例如通常所说的“话语暴力”、“冷暴力”；它既可以是个体之间的行为，也可以发生在群体之间。暴力在电影中逐渐被审美化、风格化，发展成为成熟的“暴力美学”，这同时造成了对暴力的形式化，“那就是把暴力或血腥的东西变成纯粹的形式快感……电影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

* 张登峰，南开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影视与大众文化研究方向。

1 阿・沃泽尔，盖・洛梅蒂，胡正荣．电视暴力研究 [J]. 世界电影，1992(4):153-169.

化效果从来不是暴力美学的关注焦点。”[2] 而本篇文章中的暴力特指不对其进行美学化的设计而是还原为纯粹、真实的场景的暴力，它通常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简单直接的方式对个体肉身加以摧毁，或者说它是一种日常生活当中的暴力。

暴力在当下内地电影中的演绎在文化表达上具有重要意涵。它作为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是个体在被围困的社会中所能采取的唯一行动，是在非公正遭遇中对自身加以抗护的手段。它言说着个体在当下社会艰难的生存处境，暴露出社会正义性匮乏的同时还揭开了由此导致的弥散在社会当中的广泛暴戾情绪。对暴力的书写因而整体勾连起了个体与社会、正义与非义、困境与突围等多重维度，成为矛盾丛生的社会中重要的文化表征。通过对《天注定》（2013）、《追凶者也》（2016）、《暴裂无声》（2017）、《绣春刀》系列电影中暴力叙述的分析可以展现当下社会真实的生存图景。

一、暴力治理：从“义气”叙事到“暴力”的污名

“以暴制暴”曾是江湖儿女解决冲突的惯常方式。在古代中国，江湖的兴起与社会的动荡有着重要的关联，流离失所的人们出于生存的需要集结他人，组成了各式各样的江湖团体社群、帮派。在古典文学的叙述中，江湖与庙堂相对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行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江湖”被赋予了与正统社会相对抗的文化意味。而在中国的武侠电影中，江湖则被赋予了快意恩仇、逍遥浪漫的诗意想象。在其中，杀伐厮斗的血腥惨烈和义薄云天的热血壮怀成为武侠电影中江湖的生动写照。暴力频繁出现在这类江湖中，甚至成为基本的生活形态，“江湖成了一个非历史的‘非政治’、神话式的地方，世俗的恩

2 郝建.“暴力美学”的形式感营造及其心理机制和社会认识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 2005(4):1-7.

怨不停地透过以冤报冤的暴力形式循环出现……人在江湖，可以为着维护一己之需，任意进行残暴的杀戮。”[3]

江湖作为充分自治化的底层空间，是处于行政管辖领域之外的法外之地，它在官方的法治结构之外建立了一套以“义气”为原则的世俗规范。“义气”建构了底层民众对人际交往和社会伦理的理解，它在亲缘和血缘关系之外塑造了后天的人际关系，它甚至比前者更为牢靠，在江湖社会中，舍生取义之士往往受到人们的尊崇。在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一大批侠义之士，关羽被塑造成为“侠义之神”，而《水浒传》中更是有一大批忠肝义胆之辈。“义气”精神的体现则需要通过冲突实现，这种冲突不是为着个人私利而产生的矛盾、攘夺甚至戕害，而是在自己的朋友兄弟遭遇不公之时的复仇行动，通过暴力的方式为正义张目，为自己的义气证明。暴力成为在“义气”观念支配之下的合理化举措，并且它还带来了正义战胜非义的大快人心的效果。

然而，这样的一种推崇“义气”的江湖世界已渐趋消逝。贾樟柯新近的电影《江湖儿女》（2018）描绘了江湖作为历史性的空间 / 生活形态在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趋于消亡的事实。如果说贾樟柯以前的电影在为时代立传的话，《江湖儿女》则为女性的义气立传，通过后者透露出对旧时代的江湖义气的消逝的哀婉情绪，从而贯穿着从《小武》到《三峡好人》中现代性批判的主题。在电影中，廖凡扮演的黑社会老大斌哥有过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他在喋血街头的日子里同时享受着风险与风光。而当他终于锒铛入狱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在他出狱之后，他以前的小弟在经济化的市场浪潮中攫取了财富，而他的牢狱生涯使得他错失了财富积累的关键阶段。他的人生被截然隔成了两个不同时期：前期他是势力广泛的帮派头目，而后期他努力使自己成为经济社会中的“商业人”但最

3　陈清侨 . 当代香港武侠电影中的希望喻象及江湖想象 [J]. 电影艺术 , 1997(4):24-32.

终以潦倒落魄收场，遭受侮辱与损害。然而，不论是哪一个阶段，赵涛所扮演的巧儿始终是他忠实的伴侣，也是电影中“义气”的担当，她勇敢承认是手枪是自己捡到的，从而代替斌哥坐了五年牢；在斌哥落魄投奔她之际，她也热情的接纳了斌哥，仍然期待着与之伴守。不少评论者认为，影片《江湖儿女》应该将名字改为“江湖女儿”，这是因为在电影中，只有赵涛所扮演的巧儿始终坚守住了江湖义气，当斌哥对她说“我早已不是江湖中人”之时，巧儿则以“但是我还是在江湖中”予以回应，她的勇敢和担当成为消逝的江湖中最后一抹亮色和永恒的乡愁。

江湖的消逝紧密地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文明转型。现代化的行政体制在纵向上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细密的网络，而在横向上则设置了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机构、行会等组织，从而将整个社会无所不包地纳入到自身的管辖范围之中，尤其是户籍制度的设立终结了此前社会中混乱无序的流动状态，在此社会中的游民被固定在了某一居所，失去了自由迁徙的可能。同时，社会法制的建立与普及也不再允许以“义气”为核心的江湖伦理大行其道，法治要求“法”本身成为裁决正义的唯一尺度，它规定了任何私自以武力解决事端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最终都要受到法律的惩治。现代社会对于法治秩序的尊崇从根本上要求江湖受到行政权力的制约，江湖自身具有的反社会性、自治性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因而，随着法治精神在民间的逐渐深入，“以暴制暴”这种在旧日江湖中充满豪气的举措不仅显得老派，而且迂腐蛮横。

在《有话好好说》（1997）中，失恋的青年赵小帅与前女友的现男友产生了冲突，小帅发誓要砍掉他的一只手。而在他实施“剁手”计划的过程中一幕幕啼笑皆非的闹剧则给他的复仇行为赋予了荒诞的色彩，他最终也没能完成自己的计划。在《有话好好说》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的江湖规矩不再适用于通过法制构建起来的社会，而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在管虎导演的《老炮儿》（2015）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值得一提的是，结合两部电影拍摄时间以及主人公的年龄可以得知，他们两人的身份大致重合，即是成长于七十年代左右的北京青年。在这一代人身上，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共同滋育着他们身上的江湖气质。冯小刚饰演的老炮儿在年轻时生逢“阳光灿烂的日子”，他是一伙群体的头目，在他的情人话匣子的叙述中，他曾经以一人之力对抗十几个人，虽然他们时常打架斗殴，但是却有情有义，讲求道义和原则，这也即是他口中的“江湖规矩”。他看不惯现在年轻人的种种做法，同时也和儿子有深刻的矛盾。因为儿子的一次事故，他被掺入到与富二代小飞的纠纷当中，并且双方最后都选择用“茬架”这种老北京的、颇带江湖气的方式解决冲突。老炮儿并没有采取话匣子的建议，话匣子主张通过法律惩治这帮人，他们私自囚禁，可以被判以五年刑期。老炮儿并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在他身上留存的顽固的江湖习气及其观念使他更倾向于以暴力反抗暴力。《老炮儿》的最后，在一幅不无悲壮的画面中，老炮儿穿着军大衣、拖着军刀在冰面上完成他人生当中最后的仪式，然而昔日的血色浪漫如今只剩下最后的余晖，属于老炮儿们的光辉岁月已经同那个时代一起被彻底埋葬。

与《江湖儿女》中的斌哥类似，老炮儿同样经历着从高峰跌落下来的失意、辛酸、落寞。“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以来顽主扮演着社会文化舞台中心和组织者的角色，那么到了《老炮儿》这儿，六哥面对一座新的北京成了‘格格不入’的人，就像那只被关在笼子里憋屈的鸵鸟……相比原来比较自信、有主体感的顽主，老炮儿显得有些落魄和‘生不逢时’。”[4] 个人经历的曲折除开个体的因素之外，更是与社会的整体变迁勾连在一起，蕴含着时代变化的讯息。不论是斌哥还是老炮儿，他们地位的变动、在社

4 张慧瑜 . 父亲的位置与当下中国的文化状态 [J]. 文化纵横 , 2017(3):134-140.

会中位置的改变都同江湖社会的消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现代社会的文明转型在成就一批人的同时也埋没了另外一批人。

随着对江湖这一法外空间的治理以及法治观念的普及，暴力这种通过悬置法制私自寻求正义的行为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还会面临法律的惩治。如果说，在江湖社会，“以暴制暴”带来快意恩仇的浪漫情绪，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它则是一种愚昧无知的野蛮冲动。消弭暴力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在诸多现实主义影片当中，如《光荣的愤怒》（2006）、《人山人海》（2011）、《心迷宫》（2015）等，“法”的介入成为调停各方、终止事端的最终力量，“法”对暴力的超越强化了对于法理的信念，同时也完成了对暴力的否定性和“污名化”的叙述。

二、“再暴力化”：弱者的武器

然而，当现代社会通过文明法治取代暴力成为裁决正义的唯一方式之时，它自身公信力的丧失却使之无法充当个人坚实的守护屏障。电影《暴裂无声》（2017）为我们呈现出另外一幅寓言化图景，在这里社会民众对法治的信任出现了巨大的滑坡。《暴裂无声》围绕男主角张保民寻找自己失踪的儿子开始。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他误入一个矿场，正好在此时，由姜武所扮演的昌万年派使手下接管这个他从别人手中抢夺过来的矿场。他的手下和矿场的工人起了冲突，张保民也卷入其中。昌万年听闻他在寻找一个孩子，便叫手下将他带到自己公司，张保民误以为孩子藏在昌万年公司里面。此时，昌万年与袁文康饰演的律师徐文杰发生了纠纷，徐文杰曾为了帮助昌万年摆脱法律的制裁伪造口供，并且他还掌握着昌万年犯罪的证据。昌万年为了拿回证据，绑架了徐文杰女儿，张保民无意间救了他的女儿，自己的儿子却永远不知道下落。

《暴裂无声》是一个独特的电影文本。它以一种全景扫描的视角描绘了中国当代社会中阶层的整体图景，由张保民所代表的底层阶级、徐文杰所代表的的中产阶级、昌万年所代表的上层阶级构成了电影中阶层的三重表征。张保民是一个煤矿工人，在一次和别人的冲突中，他自己咬掉了自己的舌头，从此以后闭口不语。底层民众野蛮的力量、执拗的脾性以及纯朴的善良在他身上交织共存。他喜欢用拳头解决事情，影片一开始就呈现了他与另外一名煤矿工人在矿洞里相互殴打的场景；他还与全村人作对，拒绝签署卖土地的协议，在打斗中，他用骨头刺瞎了一位屠夫的眼睛；他在找儿子的过程中又与一群到矿场滋事的打手发生冲突；而影片中最酣畅淋漓的打斗发生在他到煤矿老板的公司里寻找儿子、一个人挑落十几个混混的场景中。张保民浑身上下充满洋溢着暴戾的情绪，他习惯于用拳头而不是舌头，用暴力而不是言说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咬断自己的舌头，是因为他认识到言谈已经无法发挥它在争求利益、达成共识方面的效用，它已经不再具有交流、商榷、劝服的理性力量，置身于社会的底层，由张保民所代表的的底层阶级不管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都已经丧失了话语权力，因而只能用拳头在这个不讲理的世界中横冲直撞。在这里，哈贝马斯所言明的“交往理性”无力发挥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理性化的，因为它的规范一致性并非通过强制，而是间接或直接地通过在语言交往中取得相互理解而达成。人与人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相互理解来调节的。”[5] 哈贝马斯试图重构建基于语言之上的有效规范，通过“言谈”“对话”达成共识，然而在张保民身上，这种“交往理性”的美好构想被轻易地洞穿，最终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美丽幻象。

5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M]. 曹卫东，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41.

在《暴裂无声》中，我们看到，张保民所代表的的底层阶级清醒地意识到自身表达的无用因而主动地选择沉默，这种沉默恰恰体现了对于社会法制缺乏信任。相反，在《秋菊打官司》（1992）中，秋菊为了讨一个说法，向层层公安机关申诉，最后不服市公安局的判决向法院提请了诉讼，和公安局对簿公堂。秋菊“不相信没有个说理的地方”，她相信法律会给自己一个“说法”。而最终，在自己的执着努力下，村长终于被行政拘留，虽然这并不是她所寻求的结果，却依然向观众传递了公平、正义、有效的法制观念，这与张保民诉诸暴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社会所养育的对法制文明的执着信仰在秋菊身上得以充分实现而最终在张保民身上出现裂隙。

出于对法治的不信任，暴力再一次作为“弱者的武器”给予他们守护自身的最后的盾牌。贾樟柯的《天注定》（2013）通过四组不同的社会事件的叙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暴力寓言。对自己昔日同学焦胜利私吞矿产、村长和会计收受贿赂不满而将其射杀的大海；到处持枪劫掠的三儿；不甘羞辱奋起反抗、将羞辱者刺死的玉儿；受到爱情、生活、工作多重压迫终于选择自杀的小辉，他们构成了电影中最为鲜明的底层景观。在缺乏公正的不义社会中，他们都选择通过“以暴制暴”这种简单、决绝的方式为自己的正义张目。所不同的是，前三者的暴力针对的是具体的他人，是对他们构成伤害和压迫的有钱却无德的阶层，小辉的暴力却指向自身，他是以毁灭自身的方式表达抗议，他所面对的是社会系统性的压迫，是社会整体对个体的盘剥，他无法找到具体的施暴对象，于是通过自我毁灭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存在，表现自己与这个社会“不合作”的态度。与之构成对照，王宝强饰演的三儿通过毁灭他人的方式获取人生的一点“意思”。在他看来，生活没有

任何意思，“只有枪响的那一刻才有一点意思”。对于三儿而言，枪杀所获得的快感不仅仅在于劫夺财物，更在于那种毁灭带来的绝对兴奋，在于从整个社会秩序中“刺出”而体验到的刺激与高潮。这是一种“自成目的的暴力”：“‘之所以选择暴力，往往不是因为它能够获得某种结果，而是因为暴力行为本身内在的吸引力’。暴力的病态吸引力，在于可以暂时缓解暴力行为者自己因为处于次要地位、不利地位——弱势、不幸、无事可做、无足轻重、无存在感——而产生的屈辱感。”[6] 三儿面对的是社会系统性的压迫，他无法在对单个的他人的施暴中倾泻自己的愤怒，便将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对其施加暴行。他施暴的对象是随机选择的，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小辉和三儿都在无意当中体验到了社会的结构性、系统性压迫，并且他们以两种相反的方式表现了对此种压迫的拒绝。而在大海和小玉的事件中，社会的压迫被具体化为煤矿老板、村长、会计和前来享受服务的客人，后者是社会中有钱却无德的阶群，他们企图用钱购买身体、尊严、道德，但是这种交易方式在大海和小玉这儿不仅失去了效用，反而激发出他们的愤怒。

如果说在《天注定》和《暴裂无声》中是无力改变现实生存处境的沮丧和压抑感而催生了暴力的话，那么在《追凶者也》中暴力在实施的过程中本身也是无力的，这即是说，暴力已无法准确地施加于客体身上。由张译饰演的小凤号称“五星杀手”，他接到了一个杀人任务，要杀掉由刘烨饰演的维修工人宋老二，宋老二拒绝接受地产开发商的要求——迁出他家的坟地，以便在这儿建造商品房。然而，小凤一开始就找错了目标，让别人当了替死鬼；随后在追杀掌握他杀人证据的王友权的过程中不断遭到意外。他不仅无法完成他的杀人任务，而且自己也不断遭受

6　齐格蒙特·鲍曼，怀旧的乌托邦 [M]. 姚伟等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8: 54.

损辱。电影在后半段以黑色幽默的风格将追杀的过程打造成啼笑皆非的荒诞喜剧，而小凤则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一个被摆弄和讥笑的对象：吃饭烫嘴、被门挤压、从楼梯上滑倒等等，狼狈不堪，丑相百出。事实上，小凤也是在资本的社会分配中的弱势者，他受到商家欺骗买了一套并不值钱的房子，一怒之下抢劫金店却发现这些金子都是假的。小凤连续受到了商家的欺骗，继而产生了强烈的反社会心理，这一次他就不是仅仅满足于打劫，而是充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杀手，社会对他的一次次欺骗彻底塑造了他的反社会人格和暴力倾向。与《天注定》、《暴裂无声》不同的是，暴力施与的对象指向了底层而不是造成他们艰难处境的得势阶级，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小凤作为实施暴力的主体，实际上却只是一个施暴的工具，真正实施暴力的则是地产开发商——占有资本并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疯狂剥夺底层的阶层。小凤的悲剧也是社会底层的悲剧，导演曹保平将这种悲剧以黑色幽默的形式表达出来，但却无法掩盖影片对于资本社会非正义性的揭示，小凤以及他追杀的对象都遭遇着资本社会的隐性暴力——得势阶层对失势阶层的剥夺式暴力。

《天注定》、《追凶者也》以及《暴裂无声》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意义表达上都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而《绣春刀》系列电影则通过对历史的想象言说当下的处境。在《绣春刀Ⅰ》（2014）中，卢剑星、沈炼、靳一川是强大的国家机器中的孱弱的个体。他们具有高超的武艺，然而这并没有强化他们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反而使得他们陷入不自由的状态之中。他们三人的行为都带有强烈的个人动机，卢剑星希望能升为百户长，沈炼希望能将自己的心爱之人赎出青楼，靳一川希望能摆脱自己不光彩的历史身份和以此要挟自己的师兄。然而通过被社会所规范的的合理途径实现他们的个人欲求几无可能，他们便在既定规则之外寻

求解决之道。沈炼违抗命令没有杀死魏忠贤并制造他已死的假象之时，他们便已经注定了一个悲惨的结局，暴力最终成为他们保全自身的唯一方式。而在《绣春刀Ⅱ：修罗战场》（2017）中，不论是沈炼还是他试图保护的北斋都是在权力的棋盘中被人摆布的棋子。《绣春刀Ⅱ：修罗战场》仍然延续了《绣春刀Ⅰ》当中小人物在大历史中被倾覆的悲壮感。然而，不难发现的是，《绣春刀》系列电影仍然隐藏着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下社会中底层群体鲜明的生存体验，“表达一种个体在社会剧烈转型中所遭遇的压抑感”。[7] 不论是卢剑星、沈炼还是靳一川，他们都试图开启新的生活状态，而只有在一种流动的社会中才能产生对于未来的希冀，才会广泛存在着“奋斗”“进步”“逆袭”等文化叙事的话语，而这种流动性恰恰是现代社会独有的特征。在这里，《绣春刀》被解读为理解当下社会的寓言性文本，这种解读方式被周志强教授概括为“寓言论批评”，它突出文本与当下现实的相关性，“将文学的经验通过寓言阐释的方式‘还原’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8] 通过以“历史”言说“当下”、以“彼处”言说“此处”的方式，《绣春刀》投射了现代社会个体无力改变自身处境的焦虑感并最终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对其纾解。暴力成为维护自身的最后手段恰恰说明了社会所提供给个人的保障性体制的匮乏。

当暴力与现代法治文化的悖逆而遭遇治理并受到“污名化”的指控之时，它在荧屏中的反复出现蕴含着深刻的意味：当下社会对于文明的塑造在杜绝通过暴力寻求正义之时却无法提供给大众可靠的安全保障，当他们丧失对于社会法治性正义的信任之时，“再暴力化”便成为了“弱者的武器”，以卵击石地对这个社会表达抗议。

7　张慧瑜 . 现代焦虑感的消失 [J]. 长江文艺，2018(17).

8　周志强 . 伪经验时代的文学政治批评——本雅明与寓言论批评 [J]. 南京社会科学 , 2012(12):104-111.

三、“暴力”的政治：从“沉默的大多数”到反抗的个体

在这几部电影中，显而易见的是，暴力实施的主体呈现出了底层化的趋势。《天注定》中的几位主角分别是无所事事的村民、务工者、服务员以及工厂员工，《追凶者也》中的小凤是一个歌厅的保安，《暴裂无声》中的张保民则是一名煤矿工人，即使《绣春刀》中几位主要人物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锦衣卫，对他们的叙述同样也是在言说着当下普通人的生存体验。

如果说底层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的话，它在电影中同样也是一直缺席的。直至第六代导演的出现才使得对底层的叙述成为电影中重要的叙事类别，他们立足边缘立场，在同主流叙事对位书写中展示在转型社会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阶层，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贾樟柯曾不无真诚的说道：“我只是觉得现在是一个转型时期，变化是非常大的，对这样一个时期，中国长期以来缺乏一种真实的民间影像，我想通过自己的工作来留下这个时代，这一刻的真实的影像和声音，作为一种文献，至少作为一种文献保留下来。”[9] 贾樟柯电影中各式各样的小镇青年、娄烨电影中大城市迷惘、困惑的年青一代以及王小帅电影中被历史、社会裹挟的孱弱个体构成了 90 年代以来丰富的底层群像。除此之外，周晓文的《二嫫》（1994）、章明的《巫山云雨》（1996）、管虎的《上车走吧》（2000）、王超的《安阳婴儿》（2001）、张猛的《耳朵大有福》（2004）以及李杨的《盲井》（2003）、《盲山》（2007）等，都深刻地聚焦于底层这一弱势阶层。

9　贾樟柯，郝建，吴丹．关于《小山回家》、《小武》的对话 [J]. 黄河，1999(4):146-166.

在这些电影当中，底层生活的苦难被讲述成了多种形式。他们或者是在国家体制的重大调整与变更中充当历史的炮灰，如王小帅的《十八岁的单车》、《青红》以及《巫山云雨》、《耳朵大有福》等；或者遭遇强硬的暴力机器的摧毁，如《安阳婴儿》；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算计、攘夺甚至相互倾轧如《上车走吧》、《盲山》、《盲井》。电影极富同情地表现他们悲惨凄然的生活现状，并且在电影中他们几乎都统一地的与这种生活现状相和解。《巫山云雨》中男女主角最后的结合、《上车走吧》中打工仔对自己的选择的坚守、《盲山》中被拐骗的妇女选择留在大山里，他们对于生活的服从其实只是在不幸与更不幸之间进行利弊权衡。对于他们而言，不存在根本性改善自身处境的出路，他们的诉求得不到表达，在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处境之时也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形成了“底层失语”的社会现状，而这些底层自然而然构成了当下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

相较于这些电影中底层的失语、沉默，《天注定》、《暴裂无声》则选择通过暴力起身反抗，以这种极具破坏性的方式表达对自身处境的强烈不满情绪，在底层中鼓动着燥热、愤懑、怨怒，它们突破了底层心理承受的阈限，终于将无名之火演化成为极端的暴力行动。他们所采取的暴力近似于齐泽克的“主观暴力”的概念。所谓“主观暴力”体现为以可见的形式对物质包括肉体的摧毁，它是普遍意义上的对具体对象的暴力，充斥着破坏的欲望，也比较容易被识别。这正是《天注定》、《暴裂无声》中底层群体所采取的暴力，它们形成局部的破坏效果，但却无法重整社会的结构秩序，反而吞噬自身，因为他们面对着的是社会整体的“体系性暴力”。

“体系性暴力”是与“主观暴力”相对的“客观暴力”的主要内容，在齐泽克看来，“体系性暴力”是以隐匿、无名、抽象的形式，有组织

地对个体进行剥夺。齐泽克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语境中对“体系性暴力”进行批判，资本在疯狂的自我繁殖的过程中对其所造成的人道和环境的破坏不加理会，它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但是它却采取一种意识形态的叙事策略将它的不合理悄悄掩埋。“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并不在于人们被困于意识形态的幽灵之中、不在于忘记了意识形态是以真正的人和他们的社会关系为基础，而是恰恰在于我们忽略了这一幽灵般的真实界。”[10] 意识形态的缝合术使得系统性暴力在社会层面上的运行呈现为客观、隐形的形态，它造成的人伦道德和资源分配的灾难是巨大的，但是吊诡的是它们看起来又是如此合理，因此它又可以被称作是“隐性暴力”。

“体系性暴力”相较于“主观暴力”而言，造成的后果更加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逆转性。资本分配的失衡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效应是其主要后果之一。在当代中国，伴随着上个世纪 90 年代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化浪潮的风起云涌，社会经济资源遭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新分配，阶层的迅速分化成为当下最为显著的社会现象。而如果借重齐泽克“体系性暴力”的概念，处于社会经济结构中被剥夺的阶层则是“体系性暴力”的施暴对象。他们遭遇着资本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的现实，又无力对其进行改变，只得以破坏性的“主观暴力”对社会的“体系性暴力”进行无谓的抵抗。在《天注定》中，除了小玉之外，大海、三儿、小辉都是通过“主观暴力”反抗“体系性暴力”的典型形象。在大海的故事中，赫然出现的两种阶级构成了戏剧式的张力。焦胜利所代表的新富阶层对大海的压迫构成了阶级之间的压迫；而在三儿和小辉的故事中，压迫的主体消失了或者说，压迫的主体成为抽象的社会资本分配系统。三儿对暴力的痴迷（体现为对枪声带来的兴奋感）蕴含着打破非正义的社会资本

10　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 [M]. 唐健，张嘉荣，译. 蓝江，校.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3.

秩序的强烈欲求以及此种欲求得不到实现的愤懑，他同大海以及《暴裂无声》中的张保民一起，充分挥洒着郁积于他们身上的暴戾之气。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小辉的故事中，悲剧意味则似乎更为绝望，带有更为强烈的幻灭感。他的同乡——一位酒店女郎戳破了他对爱情保持的美丽幻象，她并不属于小辉，而属于利用手中的财富进行消费的权富者；他的朋友也因为小辉的不负责任的出走而与他决裂，差点对他大打出手；而在亲情这种本应该是最为亲密的关系里，他也无法找到依偎。贾樟柯对小辉所寄寓的同情可以在“小武”的身上产生回响，相互呼应，所不同的是，小武对发生于自己身上的一切近乎麻木和冷漠，而小辉则以决绝的姿态、将暴力加诸自身展示了自己对现实的拒绝。

当下内地电影尤其是现实主义电影中对暴力的叙述重新赋予了其强烈的社会内涵。对于他们而言，暴力往往是他们在被围困的现实社会中所能采取的唯一行动，他们试图以此来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同时也宣泄他们郁积深广的愤懑情绪。而一个极为残忍的事实则是，他们作为施暴的主体同时也是受到暴力胁迫的对象，并且施暴的过程同时也是毁灭自身的过程——他们最终都将在“更暴者”的强力之下受到惩治，电影由此透过他们折射出当下社会在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社会管理的公正性、法治文化的公信力方面存在的缺憾。

他们坐的冲下了长江……

王晓明 *

10 月 28 日万州公交车惨剧曝光后，网民立刻开始追责。先是“私家车女司机”，接着是公交车驾驶员和公交公司，甚至万州二桥的栏杆，都一度成为众矢之的。但很快，实情公布，那位撒泼的女乘客，成了千夫所指。

从“女乘客”这里，追责的思路开始分岔，一路回到公交公司（“早就该给司机装隔离门！”），一路扩大到她的同类（“撒泼的大妈……”），还有一路往抽象的方向走：不能放任“冲动”、命运的“魔鬼”竟然离我们这么近！……

但也有一些追责的视线，指向了女乘客之外的其余 13 位乘客。在一片痛惜其“陪葬”的伤叹声中，有人开始质疑他们的“无辜”：“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还有人现身说法，回忆“几年前也遇到类似的事情”，但“我”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上前劝阻“泼妇”，最后问道：“安全下车后，我就想，为什么其他人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更有人条分缕析，认为那些乘客是“枉死有责”：“他们视若无睹，或觉得与己无关…… 除了看见的明哲保身，看不见的还有对别人、对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的缺失。如果（仅仅是如果）这十三个枉死者每人代表的是中国的一亿人口，那后果真的是很可怕了……”

上面这一番概述，自然是粗糙主观、多有遗漏，但我们遇到这一类突发灾难时常有的几种反应的思路，却已经显露分明。

*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比如，出了事故，首先就怀疑官家有责，这“官家”并不仅指政府，也包括一切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和企业，例如这一次的公交公司，和万州二桥的设计/建造者。官家人可能觉得冤枉：我怎么能替所有事情背锅？可是，在官家领导一切的情况下，要人凡事不觉得与官家有关，实在也不容易。就以万州的惨剧而言，肇事者确是一介平民，但她会如此目无法度，一车人会如此熟视无睹，恐怕跟整个强弱失衡、懦怯自私的社会氛围，也是有关的吧？而一旦事关社会氛围，官家的作用也就在了。看来，这一种凡事先疑心官家有责的思维习惯，还是会继续存在，甚至更为壮大的。

再比如，发现是这一个女乘客坏的事，立刻联想到其同类，进而确定一个群体性的“她/他们”，再进而把“我们”遭遇的很多坏事都归到“她/他们”头上：这一种迅捷地造出一个箭垛式的意象，将平日累积的大小愤懑畅快地直射过去的习性，在我们对许多——不只是万州这样的灾难，还包括其他各种冲突性——事件的反应中，似乎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了。值得注意的是，如此营造出来的“她/他们”，常常并不指向真正强大、因此要负更大责任的势力，而是指向一些确有可嫌之处、却相对处于弱势、尽可放心抨击的群体。没有篇幅详述这一种习性的社会肇因，只讲一句：如果这样的反应习惯，跟着各种社会灾难一同膨胀，我们的生活前景，就真是堪忧了。

还比如，听闻一件惨事，禁不住就要仰望苍天、感叹凶机之叵测，这样的反应这一次也相当普遍。这自然显露了悲叹者的善感之心，却同时也——请恕我过敏——同时显露了某种无奈之感，尤其当这种迷惘情绪与一种“没别的办法，只能反求诸己”的消极意识相融合，酿出“以后凡事要克制，切忌冲动……”的呼吁时，我就觉得，这背后可能是直通那种“我们无力要求现实，只能适应现实”的普遍心理，因而与近年大盛的自名“丧”和“佛系”的心智倾向，形成互助。

相比起来，那个由“雪花”论领头、指向车上其余乘客的追责的思路，显然更值得关注。据“鹰击早发现”统计，类似这一路向的讨论，在整个网络舆论中占比不到五分之一，但其打开的思考空间，却比上述的另外几种路向大得多。

比如，那位现身说法者的疑问，就引我禁不住揣测，在撒泼者与驾驶员纠缠的那段不短的时间里，其余的有劝阻能力的乘客，是出于何种意识——或下意识——而安坐不动：是觉得那女乘客太魔头，惹不起？还是从来都习惯于默声旁观、缺乏干预的习惯和勇气？是因为自己带着小孩，所以等别的人 / 男人出手？还是觉得这种事经常有，没什么要紧的？或者更简单，“这是他们两个的纠纷，干我何事？……”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女乘客撒泼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会造成整辆公车的倾覆。一辆公车犹如一个社会，方向盘即是公共权力，那女乘客的持续撒泼，相当于某种恶质因素越来越严重地破坏公共事务，一旦这种破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全社会的灾难：当时安然不动的乘客们，大概没有人明确地这样想过吧。既不觉得公车是一个小社会，也没有警觉到方向盘和我的座位属于一个整体，更因为不习惯关注和干预公共的事，从来都是只在意私人的事的，即便隐隐有点不安，看看四周，也就松懈下来了：不会有什么事的，大家都不动，我一个人起来也没用…… 我相信，多半正是类似这样的思绪，令那些乘客丧失了起身干预、避免没顶之灾的时机。

这不奇怪。近三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各种硬软不同的手段，驱引着日渐习惯于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谋眼前食。各种快餐化的数码教育和娱乐文化——这可是今日社会的主流教育和文化，更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心智结构，令我们从小就习惯于放大局部、无视整体，聚焦于眼前、不看未来，对现象很敏感、对其背后和深层没兴趣…… 在这种种情况下，我们其实一直是以与这些乘客相类的态度，在许多远比公车更像小社会

的空间里，安心地玩着手机，无视近在咫尺的公共危机的。对危机的敏感和警觉，需要有对公共事务的基本的感觉－思维能力的支持，可在某种程度上，今日社会，恰恰是一个不鼓励、甚至从多方面削弱这种能力的社会。

从这个角度看，万州公车的惨剧，就不单是关乎官家的管理水平和市民的守法意识，更是关乎乘客对于“公共”的感觉和思维能力。前述那位条分缕析的网民，之所以把 13 位“枉死者”与 13 亿“中国人”挂钩，大概也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吧。我们都是一样的乘客，只不过他们坐的那辆车冲下了长江，我们的还没有。

11 月 30 日，还是在重庆，又有人抢夺公车的方向盘，却立刻有四名乘客跳起来按倒了他：看起来，灾难是能改变人的想法，而想法变了，人也就可能改变现实的。痛定之后能思痛，撞了南墙能回头，这不算是太糟的结局，惟愿痛苦能短一点，脑袋也不没有被撞得血流满面、不可收拾。

2018 年 12 月 屯门

我们如何讨论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

■ 李许涛 *

2018 年 10 月 28 日，重庆市万州区，一辆公交车在万州二桥桥面与一辆小轿车发生碰撞后，坠入河中。事件发生以后，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一时间成为全国网民关注的焦点。

这里所说的“事件”，不单单是说这个令人心情沉重的事实本身；也不仅仅指，从车辆坠江，到“谜底”被揭示、舆论从纷纷扬扬到最终消散的过程中，各种权力——媒体的、官方的、大众的等等——纠缠不清的关系；更包含着，整个社会对于这样一个公共事件的讨论方式和理解角度。也正是这些各种角度的讨论和理解，包含并形塑着我们当今时代的公共意识。

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自 11 月 2 日官方通报调查结果（乘客与正在驾驶中公交车司机发生激烈争吵并互殴，导致车辆失控，与小轿车相撞，冲破护栏后坠江）以来，人们对于事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情绪、社会公德、素质 / 文明、技术、性别。

* 李许涛，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1.情绪

从坠江事件发生到官方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中间隔了四天时间。在这四天的时间里，围绕在这一事件周围的各类打捞进展、原因猜测、剧情翻转等持续吸引着舆论的注意力。而调查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于是，几乎在瞬间，一种全社会的共同的震惊感被激发出来。这种震惊感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微博的评论、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的精选留言里，出现了一大批谩骂或嘲讽（司机和女乘客的）式的言论。这是人们最直接的情绪表达。以新浪微博 @ 人民网为例，在其转发官方公告后，截至 11 时 53 分，按热度排序居于首位的获得 2.9 万赞的评论，便是谩骂式的：

除了这些发泄情绪式的评论之外，还有另外一套基于情绪的评论。这类评论认为，司机和乘客如果有一方情绪不冲动，悲剧就不会发生；“冲动是魔鬼”，大家都心平气和的就好。进而，有的媒体专门发表评论文章，呼吁人们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以参考消息的微信公众号 11 月 2 日转发官方通告后的留言区为例，一共十三条的精选留言中，有五条都是谈到“冲动”“冷静”：

2.社会公德

不论是基于情绪的讨论也好，或是其他讨论的角度也罢，它们都不是相互独立、界限分明的，而是彼此纠缠在一起的。在这些毛线团一般的混杂的评论里，我们发现，关于社会公德的讨论也可以被单独作为一个线索。关于公德的讨论，围绕这样几个关键词展开：冷漠 / 戾气、社会规则、家庭教育。

（1）冷漠 / 戾气

个人的冷漠、自私、冲动、戾气，我们的确可以把它们视为某种情绪 / 情感。而针对在公交车坠江事件的议论中，这种冷漠、自私、冲动、戾气，不仅是被视为个人性的情绪，而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现实。很多评论矛头指向的，便是这一社会性的冷漠 / 戾气。

中青评论微信公众号在 11 月 2 日的评论文章认为，“把公交车带入深渊的不是失控的方向盘，而是致命的情绪”。文章认为，“谁都会有情绪，但任由情绪主宰行动，归根结底还是对规则缺乏敬畏之心”。

新京报评论微信公众号在 11 月 2 日的评论文章认为，“让重庆公交车失控坠江的，是司乘互殴的‘戾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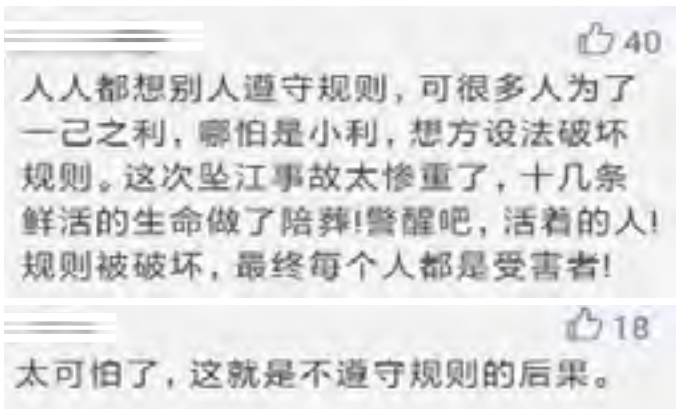
团结湖参考微信公众号在 11 月 3 日的评论文章认为：“很多时候，冷漠未必是冷漠，而是不知所措”。文章认为人们对围观者的指责太过苛刻，这些围观者之所以“无动于衷”，更大原因在于“不知所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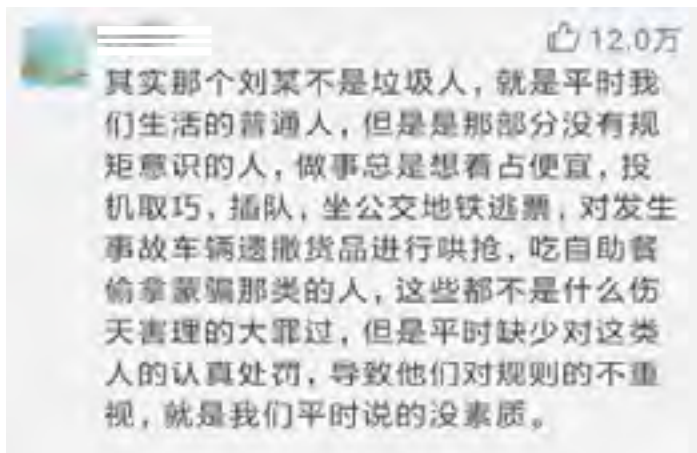
可是，如果冷漠不是冷漠，而是不知所措，那么又是什么让人们最终在这样的时刻不知所措？如果戾气时常导致悲剧，那么，此种戾气又是如何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时时累积酝酿，伺机而动？

这些问题，却鲜有评论深入。大多数的指责和感叹，都在“在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一类笼统的指摘 / 撇清中止步。至于，雪花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却少有追问和理清的勇气。

（2）社会规则

就像中青评论的文章所说的那样，戾气也好，冲动也罢，“归根结底还是对规则缺乏敬畏之心”。而在网友的讨论中，最常见的对于规则的讨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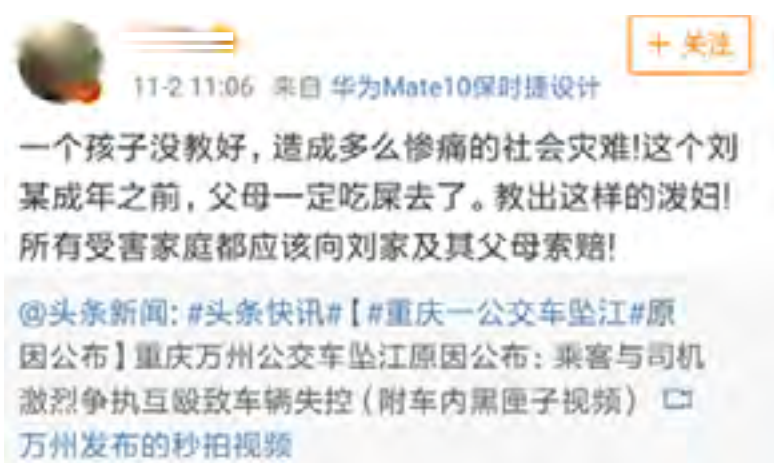


在这一类评论中，同样缺少的是对于社会规则究竟如何被制定、如何被执行，以及当规则被不同群体所所破坏时，违规者面临的不同“惩罚”的思考。

显然，违规必究，从来也不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准则，而每一片“雪花”所要承担的违规后果，也绝不相同。也许，正因为如此，不断触犯那些看似违规代价为零的规则，却也已经成为更为无权无势的“雪花们”的自觉。

（3）家庭教育

对于社会公共教育的缺失无从讨论，以作家六六为代表的一些人，则将目光放到了家庭教育上，家庭教育无疑“必须”在避免社会性的冷漠与戾气上有所作为。只是，这样的“必须”，究竟能有多大作为，却是公共教育缺席之下令人更加疑惑的问题。



3. 素质/文明

关于素质 / 文明的讨论，主要有两个面向：一方面是认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素质存在着代际差异，中老年人的素质和价值观没跟上时代的发展。这类评论之所以大量出现，或许是因为它极易让人们联想到，那些被社会舆论视为扰民的广场舞大妈，那些在公交车上对没让座的年轻人恶语相向甚至拳打脚踢的老人们，等等。但是，年轻人的素质就一定比中老年人好吗？或许，网友的另一种评论可以为此作答：“社会进步太快了，群众价值观，素质没跟上”。这种评论，不再将年龄作为有无素质的分野，而是提出了“社会进步太快”与“素质跟不上”问题。但是，所谓“进步”，便是带着价值判断的，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是朝着好的方向前进的话，那为什么人的素质不行呢？仅仅是社会变革和人素质的变化的速率不同的问题吗？还是说，这种“进步”本身就有问题？

如果网友关于素质的讨论尚且是朴素的话，那么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媒体，则试图推动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于是，出现了关于文明的讨论。人民日报直接抛出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一场文明革命？评论认为，“在‘仓禀实’之后，我们或许尤其需要思考‘人的现代化’这一课题，以一场文明的革命，构建起与我们不断提升的物质文明相适应、与我们大国身份相匹配的精神文明”。

只是，在这里，“物质文明”的说法只强调了物质水平本身，却不去谈论这物质文明背后的生产关系，只注重 GDP，却不去探讨这样的 GDP 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今天的精神文明，正是这样一种“仓禀实”的最直接的上层建筑。不在经济基础的部分实现革命，如何迎来上层建筑的革命？

人民日报追问重庆公交坠江悲剧：我们是否需要一场文明革命？

澎湃新闻 今天

11月2日，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公布调查结果。48岁的乘客刘某因为坐过站而跟司机吵架，并持手机砸司机头部，司机用右手抵挡、还击，后来急打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越过中心线，与对面的小车相撞后，撞断大桥护栏坠入江中。

这样的代价沉重到让人窒息。对此，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网等央媒发表评论道：“我们社会也需要一场文明革命”、“社会公共安全水平与社会公德素养密不可分”、“对规则和文明的捍卫更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

四十年，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有了极大进步，但精神文明提升却依然有很大空间。有网友说，反腐败让干部作风为之一变，今天，我们社会也需要一场“文明革命”。所言极是。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诸如诚信黑名单等制度规范倒逼规则意识与法治思维的提升，让这个社会少一些规则的“无知者”，法治的“局外人”；另一方面，我们依然需要不断唤醒我们古已有之的善意与良知，用德治荡涤社会风气、推进社会文明，让身边多一些美德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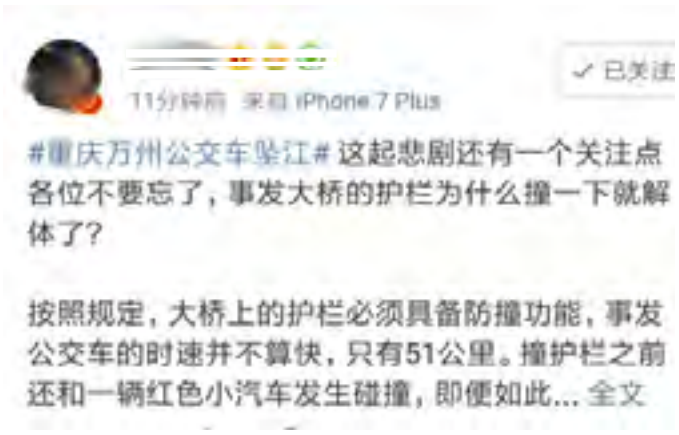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日千里。“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的国家，其人格层面的养成、精神层面的蜕变，要想浓缩在短时间内完成，恐怕比GDP的增长更为困难。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英格尔斯的一本书在中国很流行，书名就是《人的现代化》。**今天，在“仓廪实”之后，我们或许尤其需要思考“人的现代化”这一课题，以一场文明的革命，构建起与我们不断提升的物质文明相适应、与我们大国身份相匹配的精神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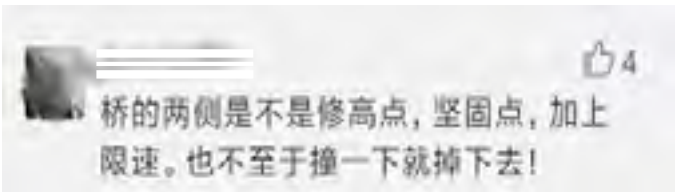
4.技术

关于技术的讨论，是各类讨论中最强调实际效果，也是寄希望于通过技术、防范社会灾难的部分。它主要在于两个部分，一是对出事桥面的护栏质量表示怀疑，认为护栏质量不达标；二是认为公交车司机的座位周围应该加装护栏，或增加安全人员，以保护司机驾驶过程中不被干扰。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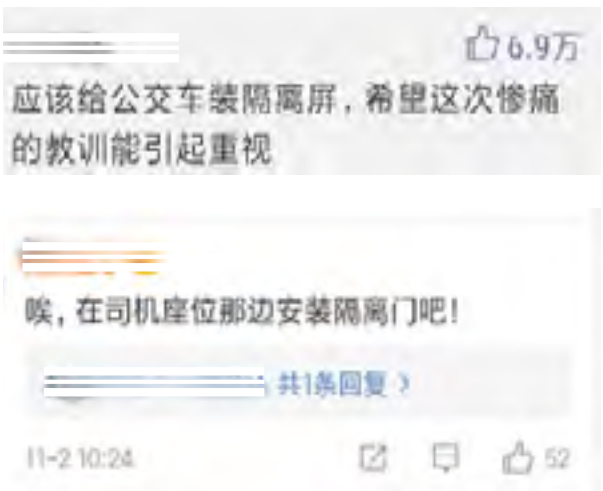
早在 10 月 29 日，新京报评论就发了一篇名为《重庆公交车坠江：该给大桥防护栏升级了》的快评，文章认为，如果大桥护栏采用 2017 年交通运输部的相关施工设计规范的标准，那么公交车应该不至于坠江的。但是由于大桥建造较早，当时的标准落后，而类似的很多大桥护栏也只是为了防护行人，并没有考虑保护车辆，因此，即便大桥护栏升级花费不菲，也应该对大桥护栏进行排查升级。

而在 11 月 2 日，官方通报事故原因之后，新浪微博大 V@ 王志安也发微博质疑大桥护栏质量。





除了对大桥护栏的关注，人们也将目光集中到对公交车驾驶室上：



5.性别

在讨论中，也出现了性别的维度。首先是在事件尚未调查清楚之前，一些媒体和网络大 V，将人们的目光引导到与公交车产生碰撞的女司机身上，一时间形成了对女司机的讨伐。

其次是在事故原因公布之后，在人们的讨论中“泼妇”“大妈”等成为了出镜率极高的词汇。这不仅仅是说，由于这次事件中刚好有这么两位女性，所以人们才会对她们进行讨伐，而是事件中的这两类人，极易勾连起人们对于“女司机”和“大妈”的习以为常的污名化认知。

其实，不论是性别也好，或者年龄的区分也罢，它们所体现的是相似的思维模式：那就是，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常会将问题的原因归结于一部分“他者”或者“非我族类”之上。而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只要改造 / 摈弃这一类少数群体就可以了。

总的看来，本次坠江事件的社会舆论，主要围绕以上五个线索展开。从中，或许可以窥得今日人们普遍拥有的对危机 / 灾难做出反应的感觉结构。

然而，如果此次事件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公共事件的话，那么，看清这一感觉结构中的巨大缺陷，恐怕便是第一步。

老钱做账

■ 霍维克*

老钱是我发小，三十出头，最近四年在一所大学的文科教研室里担任财务助理。因为人看上去比较老道，又管钱，我就改口喊他“老钱”逗他玩。他倒也不反对，说同事们也有这么喊他的。每年二三月，老钱总是格外热情，约我聊天喝茶打发时间。按他自己的说法，去办公室虽然像在疗养院一样悠哉，但也难免无聊：9 点多到，泡茶、划手机，11 点多准备吃饭，下午扔扔飞镖、看看购物网站，到 4 点多走人。老钱唯独期待吃完午饭的那半个多小时，天气好可以孵太阳。北方城市的冬末，太阳还是很暖和的。

当然，老钱也只有在二三月才能这么堂而皇之地偷懒。道理很简单，教研室没钱。这四年下来，老钱摸出了学校财务的规律：三月开始申报项目和经费，通常五月中旬到六月可以下拨，国庆节以后会检查经费的使用情况，用掉一半算合格，十二月中旬财务关账，没用掉的经费就会回收。老钱的忙碌程度也跟这个时间表基本一致，二三月主要检查有没有要记下的欠款、有没有要整理的票据，但也仅限于此，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经费一到，老钱就不再有找我聊天喝茶的闲心。他的心思，全都花在做账上了。

*霍维克，一个喜欢写作的 80 后。

“真实、有效、首次报销”

老钱最喜欢做图书的账，要求最简单，只要发票开“图书”二字、抬头写着大学的名称都可以报销。后来规矩稍微严格了一点，超过500元需要附上购书清单，但也不麻烦。这两年财务处虽然挂出了填写纳税人识别号的通知，但措辞很温和，因为学校是事业单位，不强制。老钱收到图书票之后，简单核对一下就可以入账。

老钱读本科的时候负责了一个小组的创新项目，有3000元的经费。但不久小组成员没了兴趣，老钱一个人也做不出这个项目，就打算不了了之，反正经费分文未动，也算对得起良心。可挂名的指导老师不同意，觉得老钱这么做“太傻”，便提点了“门道”。于是老钱跟室友买了好几套原先不舍得买的书，把小组成员推脱的理由改写成了项目结题报告里的不足之处，倒也顺利过关。老钱书架上的《剑桥中国史》《傅译巴尔扎克》，还有好几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送我的两本清末谴责小说，都是用那笔经费买的。后来老钱读了硕士，专业课里用到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的那两三册，巴尔扎克也读掉了一半多，虽然跟“创新”没了关系，但既然这些书派上了用场，也就权当国家的钱用在刀口上了。

有了这个做项目的经验，老钱自己买书也会特别留意发票，虽然一开始也说不清留着干什么用。硕士的时候，学院通知每个研究生可以交800元的图书发票作为培养费，其他专业的同学也说自己老师有时候会问有没有图书发票。再后来，他听人说在一个购物网站上买自营的食品和日用品也能开出图书发票，只要记得买一本自营图书就行。一句话，图书发票是大学里人见人爱的硬通货。等到老钱管教研室的财务以后，一切就更加明白了。

报销图书发票，只需额外填一份二联支款单，再到财务系统里预

约个报销时间，把预约单、支款单第一联和发票一起交到财务大厅的收账处就算基本完成。支款单是跟着财务处的经费卡一起发到项目负责人手上的，有实验设备费、图书资料费、印刷费、会议费、邮寄费、国内差旅费、市内差旅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等二三十个格子，根据要报销的名目和金额填进对应的格子，下面还有总计和项目负责人、经办人签名等几栏。教研室的那几笔科研经费都是资深教授们申报下来的，老先生们多半数学不好，不耐烦算小账，只交代老钱经费分两块，一块是教研室的公共支出，一块是各个老师自己做研究用，老钱主要负责公共的那块，3000 元下不需要报告。财务处认可签名章，所以支款单填到“项目负责人签名”这里，老钱都会直接盖章，在经办人处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老老实实记账——老先生们不讲究可不是老钱不负责的理由。教研室每两个月都会做一两场讲座，涉及到海报设计、文字记录整理等等，还有文章的翻译校对、学生的答辩评阅，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管是让学生做还是请人帮忙，于情于理都是需要支付报酬的。可按学校的财务规定，科研经费中所有劳务费不得超过 20%，基本不够用，但因为购置图书上没有限制，就有了先垫出劳务费、再用图书发票冲抵报销的办法。老师手头的图书发票不够，就问学生要。如果碰巧是让研究生帮的忙要给报酬，就索性让研究生自己提供发票作为劳务费。

老钱知道教研室这么做是没办法的办法，勉强还算得上是实报实销的变体。因为教研室的大小事务比较公开，也因为自己管财务，他基本能弄明白为什么要给劳务费，给的数额看起来也都比较合适。可他也听其他系的一些研究生说师门聚餐可以用图书发票冲，估计在操作上差不多，这算不算在科研经费上动歪脑筋？

老钱这么想，是因为他刚开始管财务的那一年，教研室还有一笔 5000 元的行政办公经费，主要用来买办公文具和纸、墨之类的耗材。

当时老钱业务并不熟练，只记得临近年底老师问他教研室有什么要添置的，后来买了两盒黑水笔、六盒长尾夹、六盒回形针、40 个按扣式文件袋、四箱 24 瓶装的矿泉水和一支录音笔，老师和同学如果需要都可以用。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老钱当时买完以后开发票选了“办公用品”，被财务大厅收账处被退了回来，要他补上订单详情，并且提醒他以后买办公用品都开明细。其实除了交报销材料经常需要长尾夹和回形针以外，教研室并不缺文具，录音笔也已经有了几支，更不用说楼道里的茶水间装有冷水和热水两个龙头。这么回想起来，老钱估计当时有点突击花钱的意思，尽管用办公经费买这些都看上去名正言顺。

教研室每个季度会出一期《研究动态》，老师们的编著或专著平均下来也差不多是一年一册，这些都会按惯例寄给有交集的单位。因为邮寄费可以报销，老钱有时会主动帮忙，邮寄做账一条龙，倒也省下了他叮咛“留好发票”的功夫。虽然快递小哥可以直接到教研室来收件，老钱一般还是会去邮局，倒不是考虑省钱，而是老钱不想让这种保持联系、互通有无的小事显得紧急。还有一点，快递小哥的身边不一定有发票，可能要等到下一次寄件的时候才会拿到，而邮局可以当场给定额发票，而且一般比较慷慨，等于提前把以后要用的边边角角的费用报了出来。不过后来快递小哥可以随身带一个 POS 机大小的发票打印机，老钱觉得也挺方便。最近两年各地在试点电子发票，老钱对这种新事物比较谨慎，担心没法报销，好在财务处很快贴出公告，说电子发票打印出来一样可以报销，只要在上面写上“本人承诺此发票真实、有效、首次报销”这几个字再签上自己的名就可以了。跟图书发票差不多，填好支款单、签字盖章、交到财务处之后，邮寄费很快就会到银行卡上。

老钱常跟我说，自己做的账越多，越觉得图书、办公用品和邮寄做起来容易。

“车票不慎遗失，故不报销，特此说明”

十月和十一月通常是老钱最忙碌的时候，一是要应对检查，二是要赶在年底关账以前尽可能把当年的经费都报销完。虽然忙，老钱还是会经常用微信跟我联系，只不过通常都是抱怨做账里的麻烦事。

科研经费里有一项叫做市内差旅费，指的是在本市坐公交、搭地铁、打出租的花费。教研室报销的市内差旅费主要还是出租车票，倒不是公共交通不方便只能打车，也不是不需要坐公交地铁，实在是因为按照报销要求来坐公交、搭地铁太麻烦。财务处不认交通卡充值发票、只认公交车票和地铁单程票，所以要报销就需要特地去拿几元钱的票据，并在市内差旅行程单上填写坐车时间、上下车地点、事由和金额。教研室的老师都受不了这死板，而且金额也不大，所以索性不报。

出租车票以前也是要填行程单的，但因为多数是打车去机场，单程两百多，花点时间填表也算值得。后来听财务处说科研经费当中出租车票报销可以不填行程单（行政办公经费照旧要填），老师们就拿来了好多。跟图书发票一样，出租车票当中也有不少是冲抵劳务费的。老钱比较头疼的是，财务处要求每笔报销的出租车票不能连号，可老师们时不时拿来一长条三四张发票，而且都是五十元以上的，算是比较大的开销。这也好理解，老钱自己打车也一样，只要看到计价器上还留着前一趟车的发票，结账的时候就跟司机说“师傅你发票都给我吧”。不过老钱脑子转得快，心想这么大个学校这么多教职员工这么多经费，同一辆出租车前后两单接了同校师生的概率也不见得小，于是把连号的两张出租车票分到两张支款单上，果然没有问题。自那以后，老钱经常会把长长的出租车票像扑克牌一样分组，另外还会留两三百的出租车票，新票来了如果有问题还能替换。老钱管这

个叫“配票”。

还有比“配票”更麻烦的。读硕士的时候，老钱一直挺喜欢参加各种讲座会议，一方面是内容新颖，中间还有茶歇，另一方面，请演讲人在校内招待餐厅吃饭这事有时候也会叫上学生，当然，老钱更看重的是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而担任财务助理以后，老钱很快领教了办讲座和会议的另一面——报销。

不管是讲座还是会议，到了财务处那里统一都算作会议费。老钱一开始并不清楚报销会议费需要什么材料，只是按照老师关照的要求，去招待餐厅拿吃饭的账单，黄色的。如果演讲人来自外地，通常会在校内宾馆住下，老钱因此要拿住宿账单，红色的。虽然餐厅和宾馆都可以派人把账单送到教研室，但没有固定时间，老钱还是觉得自己跑腿靠谱。一黄一红两张单子，才刚刚第一步，后面还有劳务费、车费等其他开销，准备文件和跑部门也少不了。

财务系统里有一个专门处理劳务费的界面，但一般教师只有勾选名单和填写金额的权限，录入的权限只在财务处自己手上。这样一来，做劳务费之前需要先拿着校外人员信息登记表和身份证件的复印件跑一次财务处，他们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处理信息登记的事。材料和手续看起来都不复杂，只不过港澳台同胞提供的证件需要多加留意，只接受通行证。让老钱很不习惯的是，信息录入之后财务处也不会主动通知，只有请项目负责人到系统里查。金额通常是不能照实填的，还要估算一下税款，一般如果实发1000就填1200，实发2000就填2500，填到签收单上。劳务费不让单独报销，需要跟其他会议报销材料一起拿到财务大厅的现金结算窗口领现钱，扣完税之后通常还会比实发的劳务费再多几十块或者一两百块。国内的劳务费就去邮局汇款，港澳台和国际的因为一般都是由负责讲座的老师先行垫出，

所以交给老师，余下的“税款”进教研室的保险柜。汇款通常也交给老钱，至于汇款的手续费，那就是他平时多报出来的那点邮寄费的用武之地了。

不过两年前财务处有了两个变化。一个是推行非现金结算，结算劳务费不再发放现金，全部采用银行转账，银行卡必须是五大国有银行的借记卡。另一个是下放校外人员信息录入权限，只要是中国大陆的身份证，就可以连同银行卡信息一起录入。对老钱而言，原先跑财务处登记和汇款这两个步骤变成了为银行卡信息留底和算税率，他为此研究出了一套税前申报金额的分段函数计算公式，常用的是“160+0.8x；0.84x；0.76x+2000”这三种。这样花力气精算，主要还是基于人情和财务上的考虑，给的劳务费不过一两千，如果还要扣税实在难看，可如果按原来的办法报销，一方面等于增加了教研室的开销，另一方面，给多了人家也未必领情，还可能造成其他误会。如果遇上的是中国大陆以外的演讲人，还有一个额外的手续——他们通常没有五大国有银行的借记卡，所以还需要额外写一个现金代领说明。非现金结算的现金代领，其实是进老师的卡，再由老师转给演讲人。

教研室有时候还会承担演讲人的差旅费。财务处起先只给报销火车票，还分了“院士或省部级”、“教授或厅局级”和“副教授及以下”三个档次，座位的等级和报销的额度都有差别。目前执行的标准是“院士或省部级”一等软席或高铁动车商务座、“教授或厅局级”一等软座或高铁动车一等座、“副教授及以下”硬席或高铁动车二等座。报销需要往返的车票，另外还要填写一份国内出差审批单和一张国内差旅结算单。后来机票也可以报销，不过要用公务卡购买或者通过指定代理商。财务处规定只能报销往返的差旅费，从哪里出发就要回到哪里，可演讲人的情况千差万别，碰到单程的或者不回出发地的就要由老钱来想办法。国内差旅结算单的最后一栏是“情况说明”，后面还有一行小字：如车票遗失，请在此栏说明。老钱一下就知道怎么办，

刷刷写下“返程车票不慎遗失，故不报销，特此说明”。

如果是中国大陆以外的演讲人坐飞机来，差旅费的报销就麻烦了许多。财务处需要登机牌、行程单和发票来审核机票信息，实际操作起来，步骤多、耗时长。返程的登机牌原件要等，两周不算慢。然后是提供购买机票的发票，如果没有发票就需要提供包含有机票金额的订单，说明币种，出行人要在金额边上签字，另外还需要本校邀请人的签字。接下来是出入境信息，因此需要演讲人的护照个人信息页、签证页和出入境章。也有不需要签证页的，比如日本，中国对持日本护照的游客 30 天内出入境免签证，老钱一开始不知道，讲座后拿着日本教授的护照翻了半天。审核通过以后，就要拿着这些材料到财务大厅的外汇业务窗口，按照当天的汇率结算机票的人民币价格。差旅结算单不再需要提供，但审批单照旧。

剩下的就是报销的文件了，主要是三样，邀请函、签到单和会议决算。按理说会议海报印刷的费用也应该跟会议费一起打包报销，可单次印刷费用较低，打印店觉得开发票扣税划不来，所以一般印刷费都是挂账，到了年底单独结账报销。做第一笔会议费的时候，老钱还在教研室翻箱倒柜，想把发出的邀请函原件找出来。问了一圈才明白，这邀请函其实是财务审批流程当中需要，只给各个行政部门看的。于是老钱不再找邀请函，坐在电脑前，噼噼啪啪打下一通“鉴于您在该领域的杰出成就，特邀请您参加……期待您的到来”，推算个比较合适的日期，然后打印、盖章，邀请函就算做好了。签到单不是问题，开始之前就已经写好标题打印出来在门口的桌子上放着，一共有二三十个签字。不过也遇上过几次没做签到的，都是后来零零碎碎补签的。有了这个教训，老钱再负责签到的时候就一律用新的 A4 纸，虽然没标题看起来不正式，但老钱想的是签完赶紧复印几份，万一哪次再忘了做签到也不至于太被动。

只要不涉及国际差旅费，前面两样都可以在教研室里搞定，顶多再跑一次学院盖个公章。可到了会议决算这一步就没那么迅速了，要由科研经费主管部门的领导签字和部门盖章才可以正式送财务大厅报销。教研室的三四笔科研经费归不同部门管，有的是学术发展处，有的是文科发展处，有的是国际交流处。老钱把之前做的各项材料拿长尾夹夹好，跑去科研经费对应的主管部门签字盖章。每个部门的规矩不一样，文科发展处的科研经费由处长直接审核、签字、盖章，学术发展处则要三审，先是联系文科学院的科长看一遍，再要副处长看一遍，最后才是处长签字，但盖章还是由副处长盖。老钱很少遇上只跑一次就把签字和盖章都搞定的好事，往往是处长不在办公室，让老钱贴个便签纸说明情况、留下手机号。补材料也是常有的，有时候会要求提供新闻报道和照片，有时候会要求提供演讲人的简介，有时候因为对台湾机构的表述不当需要重写。当然，主管部门也不是天天有审阅报销材料的功夫，实在忙的时候，就只扫一眼有没有大问题，然后咚咚敲下两个章——原来处长签字这一格里用的是手写签名章。

手续齐备以后，老钱就会预约好报销时间，把报销材料拿到财务大厅去。财务处的报销预约可以显示两周以内的预约情况，二月到九月初的预约都不困难，七天以内总能找到绿色“可预约”的日子。六月底放假前因为集中处理全校各个学科点的答辩费用，加上有些科研经费刚刚下发着急使用或者还欠款，会有一波预约的小高峰，前一周大多是红色的“已满”。十月开始报销数量增多，十一月更加紧张，老师们之间打招呼也变成了“去财务处啊？”“有预约单吗？”。老钱还听说，一些老师为了报销熬夜熬到零点，因为预约报销的系统时间跟自然时间一致，零点一过就会更新信息、开放预约。另一些老师的策略是，从九月份开始每天上班一开电脑就预约报销，有需要就用，如果暂时不需要还可以拿给其他老师做人情。还有的索性守株待兔，每天问有没有其他老师手上有预约单可以捎带进财务大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把报销材料送进财务大厅，一大半问题已经解决。

教研室的出差频率不低，单独报销火车票的手续不算麻烦，就是一份国内出差审批单和一张国内差旅结算单。另一方面，火车票的金额大，学生手上又多，拿来冲账也很顺手，只是审批单上的出差事由和日程安排要小心琢磨。对于春节期间和暑假期间的火车票，财务处会查得更严格一些，所以老钱一般只报单程，出差事由写三五天的调研考察，“调研期间食宿自理”，情况说明一栏还是那句话，“返程车票不慎遗失，故不报销，特此说明”。有一次老钱信誓旦旦对我说，报销费用变少不会有麻烦，以后情况说明这一栏再多写半句“本人承担一切由此产生的责任”。然而真到了后一次冲账，老钱犹豫再三，还是没写“承担一切责任”的豪言壮语。

“预计科研教学使用效率：1000 小时 / 年（整个设备）”

我也问过老钱，科研经费应该都有预算，报销也都有固定流程，怎么会每次都这么繁琐。老钱叹了口气，他这些年做账遇到的最大的苦恼，是教研室花钱没规划。填经费申请表的时候肯定都做了专门的预算，可问题是，教研室从来不把那份预算当真，具体怎么花钱，都是等经费下拨以后“见机行事”。老钱还说，这后面还有一段小故事。

几年前，上一任校长突发奇想，把申请经费的数额作为一个考核指标，要求各学院年年有进步、年年有增长。教研室的老师们虽然需要资金支持，但用这种“激励”的手段实在太过难看，所以刚开始是决定不申报的。哪知道学校那一年申报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项目全部落选，因此学院领导一面到校长那里立下军令状，一面亲自说情、请资深教授们出山，希望拿下一两个学校力推的项目。反复权衡商量之后，教研室主任答应每年出面申请学校的科研经费，而且至少要申请到一个学校力推的

项目。而学院方面的让步是，只要是教研室申报下来的科研经费，学院内的审批尽量从简，学校部门的审批材料也会尽量配合，并且不多过问。后来其他学科点拿下了几个大项目，学院增光不少，加上领导换届，审批从简的优惠也就一点点收紧，好在对教研室的影响有限。其实在教研室主任答应申请科研经费以前，教研室的老师们已经有了共识，觉得需要为科研教学打基础、为学生搭平台，因此都同意先争取科研经费、再到教研室内讨论怎么使用。这几年单是老钱知道的名目，就有学术发展处的“科研基地建设试点”、“学科点三年发展规划”、文科发展处的“X山激励专项基金”、国际交流处的“国际一流学科发展计划”。

老钱也认可教研室的这套思路。不过以他做账的感觉来说，有两个让他不放心的地方。一个是教研室通知老钱做账报销都比较晚，因此老钱积累出的经验、窍门常常用不上，不得不重复犯错、做无用功。有些经验虽然只是提醒，比如跟演讲人联系时提醒保存好机票订单、登机牌，演讲前带上身份证件等等，但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十月十一月的讲座，如果多这一两句提醒，基本不必担心财务处的关账日期了。另一个不放心是超标。财务处对用餐、住宿等报销有一系列国家和地方标准，有一些贴在网上，有一些贴在财务大厅的柱子上。因为没有直观的汇总表，加上这些报销标准好像一直在变动，老钱好几次都被财务处退回来。几年前有一笔暑假前的会议费，老钱从 9 月初一直弄到 11 月底，来来回回跑了十多趟，柜台里边实在不愿意再被这张单子折腾，暗示了一句“分母大一些就可以达到标准了”，老钱也谨记在心。分母不是说变大就变大的，还需要其他人一起帮忙，这些事教研室的老师们知道不知道、体谅不体谅，老钱心里也没底。

因为不放心，寒假结束以后老钱就问教研室主任有没有可能做一份相对细致的规划。没想到两周以后，老钱就收到了主任的微信回复，一是同意和感谢老钱的建议，二是罗列了教研室预估的全年事项和大致开销，

三是请老钱看一眼即将上报的一笔经费预算。老钱本来只是想吃一颗定心丸，结果意外地参与到了教研室的重大决策当中。预算里老钱只修改了一个地方，把表格里的“7*800=6000”里的“7*800”去掉了。虽然谁都看得懂那个等式想表达的意思，但这么写也摆明了是一道做错了的数学题。

预算下拨以后，老钱准备采购一台碎纸机。教研室原先那台小的已经不能正常使用，加上老钱做账过程中有很多应该及时销毁的文件材料，算是刚需。本来上一年就打算买的，但因为碎纸机属于列入政府采购目录的设备，需要提前申报、在经费当中单列，并且必须委托设备处申请政府采购。所谓委托设备处，就是到设备管理处的系统里填采购申请表、等待审批。表格里内容繁多，款式、用途、摆放位置、保管人等等，老钱也都知道该怎么填。在接近末尾的地方有一栏“预计科研教学使用效率”，单位是“小时 / 年（整个设备）”。老钱心想，碎纸机每天工作 1 小时已经有些夸张，估算下来全年 200 个工作日，所以填了 200 小时 / 年。没想到点击确认却跳出窗口，“为了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使用时间过低的新购设备将不予通过审批”。那就按 365 天、每天工作 1 小时算，填 400 小时 / 年？跳出了同一个窗口。不得已，老钱填了 1000 小时 / 年，没想到却顺利通过了。每天 5 小时用碎纸机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

“强化财务纪律、整治压缩报销腐败空间”

前几周，老钱代表教研室参加了学院的一个会。给老钱的通知说得很模糊，只是强调了“务必出席”。到了会议室也不见席卡，老钱就挑了第三排靠边的座位坐下，放下笔记本和水杯盖子，算是占座，然后去茶水间泡茶。

泡完茶回来，会议室基本上坐满了。书记和院长也先后进来，照例是请坐在后面的老师往前坐，第一二排不要空着。安顿好会场以后，院长讲话。学校三个月前调来了新的副校长，主管文科，兼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最近会来学院调研，一是了解科研情况，包括对经费的使用摸摸底，二是了解党风廉政建设进展。院长建议各个学科点、各位科研项目负责人先做一次自查，同时整理一下目前使用经费上面存在的问题，写一份小结，学院会安排时间听取反馈。

院长接着讲了很多科研进度的考核指标以及在全校的排名，包括进多少人、申报多少称号、发多少文章、在绩效工资中占多少比重等等，然后是书记讲党风廉政建设。这些絮絮叨叨老钱都不太关心，反正他明白，自己出现在会议室，是因为学院要为副校长调研做准备，尤其是科研经费的使用这一块，而自己是教研室的财务助理，算是“业务范围”。刚才院长讲“摸摸底”的时候，老钱就在心里过了一遍教研室的账，感觉应该不怕查，但又不好意思离开会议室，划手机和睡觉的影响也不好，所以就盯着桌上的水杯盖子发呆。

会开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算是难得的短会。结束讲话之前，书记特别提了一句：“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不成问题的问题》，科研经费自查以后请大家都抽时间看一看，小结里可以结合着写一写，学院听取反馈的时候也可以结合着谈一谈。”

这部《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根据老舍的同名小说改的，讲的是两位农场主任在管理农场方式上的明争暗斗。书记提这部电影，大概是想暗示学院的各项经费投入不少，可最终的考核指标和全校排名却平平淡淡，就好比电影里的农场，虽然物产丰富却总是赔钱。不过老钱觉得，书记要么是不当家不知油盐贵，把科研当作只要投钱就能有产出、不需要动脑筋投精力的买卖，要么是故意装傻充愣，假装不知道少数名不副实的“专家”来参加“学术活动”只管讲空话、打太极。老钱的依据是，学

院网站的“学术动态”栏里有不少写着书记出席或者书记致辞的稿件。

小结还是要写，老钱却有些无从下笔。这几年管财务、跑部门，老钱听说了一些挪用科研经费的事例，也见过那些胡乱填写的报销单据，自然理解财务处的难处。而且老钱自己也同意需要对财务进行管理，因为经费来自国家拨款、来自纳税人。可另一方面，现行的财务制度和审批流程也实在让人感到气愤：学校号称各部门要为教学科研服务，但具体操作当中总是会有大量毫无道理的规定。比如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报销材料需要盖章，主管部门一定要照片佐证，必须有本人清晰的人像，必须包含会议名称或以学校大门作为背景，不少于五张，好像拍照才是学术会议的核心议题。财务处则只关心符合不符合自己的报销规范，同样是市内差旅，一个人哪怕提供同一天的好几千元出租车票，只要符合规范就一样不会过问，而如果坐最近流行起来的专车，就算是真实发生的费用、正规的票据，也会因不符合财务规定而无法报销。如此种种，到头来还是逼着老师和学生在财务上造假。老钱同样不理解学校考核科研成果的方式：用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得到资助的等级或者花掉科研经费的多少等等可量化的指标来考评，老师和学生成了造数字的机器，炒冷饭的研究数值上反而更好看，还怎么好意思说大学是教学科研单位、有创新精神。

可这些感慨，老钱实在不敢写下来。都在一个学校里，就算不提具体的人名或部门，还是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接下来十之八九会遭人嫉恨、被穿小鞋，尤其自己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还不如找几篇现成的文章拼贴一下，虽然这个气自己还要继续受下去，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就算说了，除了自己被穿小鞋，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搜索的结果里，有一篇是新华社的追踪报道，有一节的题目是“强化财务纪律、整治压缩报销腐败空间”。复制、粘贴，这就是老钱小结的题目了。

“得闲饮茶”

又是三月，老钱又开始热情地约我聊天喝茶打发时间。见了面，老钱的脸更圆润了一些，可眼袋也更重了。不用说，又是被做账摧残的。

老钱说了一大通，照例是财务报销的种种问题，我也照例只听不说。大概是说累了，又或者是真的想知道我的看法，老钱问了句“你怎么看？”然后喝了口茶，“‘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是外人，看得清楚，直说吧。”

我不是财务出身，也不在高校系统里工作，除了偶尔看到一些对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的批评文章，关于大学财务的种种主要是从老钱那里听来的，总觉得没有太多发言权。尽管如此，两点感受越发清晰。其一，绝不能把大学只当作纯粹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其中的行政系统盘根错节，官僚气息颇重。老钱说的那些审批手续，名义上都是“为了报销”，但实际上，这四个字似乎也是不同行政部门展现自己权力和相互推诿扯皮的主要借口。另一点是科研和财务的微妙关系。把小组成员推脱的理由改写成到结题报告，“创新项目”的 3000 元就能安全过关。那么如果是在申报项目之初就心怀鬼胎呢？科研会不会成了拿钱的幌子？而如果经费使用情况在科研考核中占较大比例，加上报销时的这些规矩，是不是意味着科研其实是被财务牵着鼻子走？

不知怎么的，我又想起了高中时考试前对考试纪律的三令五申。高中的时候，每月都会有一次停课的正式考试。开考前，广播里总会宣读考试纪律，提醒关手机、不要作弊，如果作弊违纪被抓就要处分等等。可考试结束以后，总能听说有个别胆大的带着小抄或者手机进了考场，在一连串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最终成功抄到别人的试卷。于是那几年里，考场布置的要求越来越高，先是要求擦掉教室后面的板报，然后是派专人拿着金属探测器站在门口，临毕业的时候，教室里都配上了监控

摄像头。考试的排场越搞越大，进考场的排队时间越拖越久，可没人敢保证作弊违纪就此绝迹。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考试纪律里有关于处分的规定，但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执行过，而不愿守规矩的同学其实就那几个，可能多少有些裙带关系。这么说来，他们屡屡“成功”也不见得是艺高人胆大或者监考老师疏忽大意；只要摆上那套考前检查，监考的责任就已经免除了一大半，至于增加出来的时间成本，则转嫁到了那些守规矩的同学头上。学生间也是有骂“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但也做不了更多。

我这么没头没脑地说着，老钱却突然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说我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个故事讽刺两个部门。老钱正打算再多说几句，手机却响了。教研室主任告知老钱，财务处最近出了两份通知，一份是改进报销流程，一份是财务处试点派驻联络专员，请老钱尽快学习，并把要点整理出来。于是老钱神神秘秘来了句粤语“得闲饮茶”，我们也就此分别。

改进和试点以后，做账的事，会有改观吗？

献给当代平民女性的颂歌：评《江湖儿女》

■ 刘亭亭 *

2018 年，贾樟柯导演的最新电影《江湖儿女》延续了他电影生涯一以贯之的纪实风格和现实主义主题关注。与贯穿《站台》《三峡好人》《天注定》等作品的纪实风格一脉相承，在《江湖儿女》里，贾继续采用非明星化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赵涛（饰巧巧）、廖凡（饰斌斌）演绎电影领衔角色，并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出演小城贫民、混混、流动劳工，以求真实、朴素地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1] 在影视风格里，他继续使用大量的长镜头和慢镜头，借助户外自然光，克制使用色彩元素，保持画面的逼真性和透明感。[2] 巧妙的是，他继续将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非现实意向、情节散落在影片各处（比如小镇青年在黑帮大哥的葬礼上跳拉丁舞、UFO 的出现等等），使得影片在现实主义之外多了一层荒诞批判的意味。[3]

《江湖儿女》也有区别于他之前所有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影片围绕女性角色巧巧的叙事视角和情感体验展开。与《三峡好人》经典的开篇三分钟长镜头类似，《江湖儿女》也以一个手持长镜头开篇。在一辆摇摇晃

* 刘亭亭，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社会科学系人类学博士，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所访问学者。

1 Lin, Xiaoping, “Jia Zhangke’s Cinematic Trilogy: A Journey across the Ruins of Post-Mao China”, in Lu and Yeh, eds., Chinese-Language Film, 2005, pp. 186-209.

2 赵栋 . 电影《天注定》的叙事学审视 [J]. 戏剧之家 ,2018(21):75-76.

3 徐春萍 . 贾樟柯电影中的纪实风格及其非现实元素——以《三峡好人》《山河故人》为例 [J]. 电影新作 ,2018(02):90-94.

晃的公共汽车上，导演为我们展现了山西大同的众生相，嘈杂的公交车上的人们眼神迷惑、空洞、呆滞，孩子昏昏欲睡，男人漠然抽烟，他们没有交谈，在不明目的的旅程中人们彼此疏离。在这个长镜头的末尾，女主人公巧巧不经意地出现了，她作平常的打扮，没有被刻意突出。镜头停留在打瞌睡的孩子脸上的时间都比她多，若是观众不熟悉演员赵涛的容貌，几乎察觉不到这个核心人物的出场。这个镜头给予了巧巧平凡人的设定，且奠定了影片以巧巧的第一视角展开的独特视角。

从这个镜头开始，贾樟柯开始为当代平凡女性吟唱颂歌。跟贾樟柯以往的电影里面的女性角色相比，巧巧的身份并不绝对平凡，她是黑帮首领斌斌的女朋友，具有一定的故事色彩。但她的不平凡并不来自于她自己，斌斌的弟兄们对巧巧毕恭毕敬，称呼她为“嫂子”，不是因为她本身的能力，而是碍于斌斌的权势与盛气凌人的作风。通过多个段落叙事的精心编排、演员精湛的演出，带领观众为巧巧的喜悦而喜悦、沉重而沉重，再为她的绝处逢生而雀跃。影片一方面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面临重大转型和道德坍塌的情况下，女性所面对的情感失落、家庭理想破灭、性骚扰和肢体暴力等困境；另一方面，导演拒绝扁平化地将女性处理成单纯的命运承受者和“受害者”，相反，他以悲悯、鼓励式的情怀歌颂了巧巧所代表的当代青壮年女性，在现实困境中所展现的坚韧、顽强品质和复杂的主观能动性。

本文围绕以下三组关系详细评析影片的女性主题。第一，巧巧与爱情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巧巧与她的男朋友斌斌长年累月的关系变化，和情敌林佳燕的互动，以及跟长途火车上陌生男子的雾水情缘。第二，巧巧与传统家庭伦理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巧巧对年事已高的父亲给予的持续不断的关照。第三，巧巧与影片关键词“江湖”这个概念的关系。

一、巧巧与爱情：毁灭与重生辩证交织的女性命运

在影片的最初，在巧巧与斌斌的关系里，巧巧全然地以斌斌的附属人物存在。这首先表现在巧巧陪伴斌斌跟他手下兄弟打麻将的场景里，巧巧的眼里只有她深爱的男人，但斌斌却将注意力先分给了正在进行的麻将游戏，再用来处理兄弟们之间的金钱纠纷。另一个场景也能集中体现巧巧的从属地位，在嘈杂的迪斯科歌厅里，斌斌要跟他的男性友人商讨重要事宜，斌斌对她轻声说了一句："巧巧。"她收到了让她回避的信息，她非常懂事，马上离开了座位，给予男友跟他的男性生意伙伴讨论"重要事宜"的空间。这个阶段的巧巧，与万千恋爱中的女性一般，渴望爱情的稳定，将浪漫置于生命的中心。这种渴望不仅定义了她跟斌斌现实的关系，也指涉了她对于未来完满人生的幻想。她是个性格直截了当的人，她不忌讳直接表达自己的欲望：她多次规劝斌斌离开江湖（黑社会），作为她的家属（煤矿事业单位的家属），一起去新疆建立一个只属于他们二人的家庭。

女性对于爱情的渴望从不发生在历史、文化的真空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爆炸性发展、欲望的流动、人性的繁复、阶级与城乡关系的急剧变化形塑着当代人的情爱关系。贾樟柯的多部电影都捕捉了这一社会现实：稳定的、从一而终的爱情在当代中国失去了浪漫神话的庇护，男人的承诺不可靠，女人对爱情有多执著，就会有多失望。这种爱情不稳定带来的出轨惊恐和分手忧伤，可以说是当代女人共同的情感结构（雷蒙·威廉斯使用"情感结构"的概念，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4]

斌斌不仅多次拒绝了巧巧成家的邀请，他还执著地将她彻底带入充满暴力和不稳定性的江湖。斌斌被多人围殴的关键时刻，巧巧鸣抢为他解围，

4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这直接导致了她为他蹲坐牢狱，足足五年之久。刑满释放，斌斌并没有在监狱门口迎接她。他甚至躲着她，在她不死心的追查之下，她发现斌斌早已移情别恋，跟比她更年轻貌美的林佳燕在一起了。

比起五年牢狱，斌斌的软弱躲避和见异思迁才是巧巧面临的真正灾难，使她的心灵成为废墟。在残破的、光线暗淡的旅店房间，斌斌作出这样的解释："你知不知道，我出狱后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一个人接，曾经的马仔都开上了宾利，这都是什么滋味？"这个解释使巧巧尴尬、痛苦，原来斌斌并不跟巧巧分享对于未来的想象，这个男性的未来安排围绕在金钱的不断攫取和江湖地位的巩固，爱情只是他认为的社会对于成功男性的奖赏。

《江湖儿女》之所以称得上一部恢弘的女性赞歌，绝妙之处在于对巧巧在绝望的关头（她在被偷了身份证和钱包之后，立马发现了斌斌的变心）所采取的行动的编排。在贾樟柯的眼里，生命的喜悦和绝望共生，女性身上的毁灭与新生可永恒地互相转化。

首先，她对于情敌林佳燕的态度相当镇定，她没有从任何肢体或者言语的暴力攻击情敌（多个女人争抢男主角、打小三的情节没有出现）。因为她很清楚，这是她跟斌斌之间的事情，与他人无关。

其次，在她对爱情彻底失望之后，她坚强、果断地重新建立了生活的支点——她自己。凭借她的聪慧与机敏，她先混入陌生人的婚宴酒席吃饱了肚子，再使用行骗的手段从负心汉商人那里讹诈了一笔钱，途中她还成功使用诈术支开了想要性骚扰她的摩托车司机。时间大幅度退后，她重新回到了大同，凭借往日的人脉关系和管理能力把麻将馆打理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她用顽强的行动证明了，女人并非必须依赖男人。影片接近尾声时，她能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接济中风后半身不遂的斌斌。在郊外的山坡，许多年前意气风发的斌斌教会她开枪，那时候的她胆怯懦弱，在开枪的一刻害怕地扭过头去不敢看。就在同一个地点，许多年后，她帮助残疾

的斌斌重新学会走路，她站在他的前面，张开双手，鼓励他行走，此刻的她目光笃定、成熟，她可以给身边的人能量。贾樟柯还拒绝这样简单化的书写，他镜头里的巧巧有她的徘徊、暧昧和挣扎。这表现在回去的长途列车里，巧巧遇到了一段短暂的情缘。巧巧遇到了徐峥饰演的满口生意谎言的克拉玛依男子，她似乎一眼就洞察出了他的骗子属性，她冷静地看着他讲述 UFO 探险旅游的项目。但她对这个男子产生了片刻的喜欢与依赖，她与他在列车中拥抱、接吻。

二、巧巧与父亲：中国女儿的传承与牵挂

虽然巧巧与父亲的关系并不是《江湖儿女》的重点，导演对这对关系的着墨不多，但这是唯一一对本影片交代过的隔代关系。这对关系有其现实性的意义，高度提炼了社会转型时期隔代斗争精神的传承和当代女性对家庭伦理不懈的坚守。

这对关系首先对巧巧的顽抗个性做了代际的铺垫。在面临大同矿业体制性衰落的格局里，体制工人被长期拖欠工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展现出来随波逐流的态度，目光疲惫、日常闲散。其中一个工人这样说：“煤价不行，我们班组的工也停了。”他没有意识去改变这件现状，也没有理论分析的工具去理解社会经济格局的转型。巧巧的父亲却与众不同，他是一名熟练操用社会主义时期斗争话语，具有坚持精神的矿业工人。影片的 15 分钟处，巧巧的父亲以画外音的形式出场。在社区广播里，他说道：“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我们不是私人侦探，但刘金明（厂长）你的那些事我们都侦查清楚了……是谁给你的权力，让你把国家资产流失，为什么要把职工食堂承包给你的小舅子。”市场经济改革的洪流不息，集体主义重工业注定要走向衰落，这时候父亲的斗争话语不合时宜，令人尴尬失笑。巧巧无

奈地放下一笔钱，劝父亲：“该吃吃，该喝喝，不要操矿上的心。”

巧巧不同意父亲的斗争路线，但他们身上却有一致的倔强抵抗精神。这种交代使得巧巧后来在绝境之处的逆转显得合理。她的手段并非社会主义时期“铁姑娘”那样的激进，顶着“半边天”的荣誉，高举国家女权主义之歌。她知道这样的女权精神已经不适用。她有一系列入世的生存伎俩，包括欺诈、自保、讲义气、动用人际关系。巧巧的应对困境的方式也体现了中国第六代导演的特色，第六代首先区别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将电影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阶级斗争工具，也区别于第四代与第五代那样具有明确的美学追求、全局性的恢弘叙事和鲜明的个性风格。第六代导演中的佼佼者贾樟柯着重捕捉小人物在特定情势和处境下的反应，对体制、国家、市场和地下经济都既有依赖、又有批判性疏离的态度，形成多重政治效忠的格局。贾樟柯电影里面人物处境跟目前的社会情境贴合，人们没有绝对单一的意识形态信仰，而是在商业利益、人情世故、法治底线和家庭伦理各种错综复杂的信念网络里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5]

另外，借助巧巧对于父亲的关怀，贾樟柯继续陈述了他对中国女性另一共通情感结构的理解。“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不是有条件的”，对于这个问题贾没有给答案（虽然大众话语都这样说）。贾的理解是，女儿对于父亲的爱，是无条件的。这不仅表现在巧巧持续地给被欠发工资的父亲经济补助，直到她后来进了监狱，父亲依然是她最大的牵挂。她对探视她的朋友说，父亲身体不好，请你多加照顾。她个性倔强，不轻易求助于人，但这是她在弱势处境里不得不做出的请求。在后来巧巧与斌斌重遇的时候，她首先跟他说：“我的父亲去世了。”父亲对她意义重大，这是她首先要与斌斌交代的情况。

5 贺萧，王政．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 [J]. 社会科学，2008(12):141-154.
王政．浅议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的发展 [J]. 社会学研究，2001(5):34-44.

三、巧巧与江湖：现在，我是江湖中的人

充分理解《江湖儿女》对女性角色血肉丰满、意义深刻的塑造，不能忽略巧巧这个角色对于江湖这个概念从排斥、不理解，到理解、下定义的成长过程。

“江湖”这个极具象征性意味的词汇，经常性地在中文民俗、小说、歌曲、电影、电视中出现。“江湖”并不指向一个实际存在的场域或实体，它的意义是发散的，大体上指约定俗成的，围绕非正式经济运作的、具有一定无政府状态的、由男性主导的黑社会领域。[6] 由于“江湖”这个概念的意义如此发散，巧巧对于它的理解就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好像斌斌那样认为的，他从来就是江湖中人那样）。巧巧对于江湖的理解更多的是因应她的生存策略选择的改变，针对各种客观压力的回应，也从此体现了这个角色在生命历程里的成长。

影片的前期阶段，巧巧对于江湖的理解是困惑的，她也拒绝成为那个概念的一份子。她几次问斌斌江湖是什么，斌斌的回答是含糊的——因为他认为江湖是从事非正式经济行为的男人的本质，本质到无需多做解释。巧巧未能理解斌斌，但她从斌斌对待爱情的态度里逐渐体会到了这个“江湖”对女性整体性的排斥。在动荡的、充满暴力和危险的地下经济里，门派忠诚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信赖和合作关系密不可分，这既是情感意义上的（斌斌相当看重兄弟们对他的认同与尊重）、也是经济层面的（通过实际互惠的合作，男性商人之间形成密集的网络）。门派的团结组织在男性情感和经济的网络里被安排、整顿，这种网络里女人的地位是从属的、边缘的、失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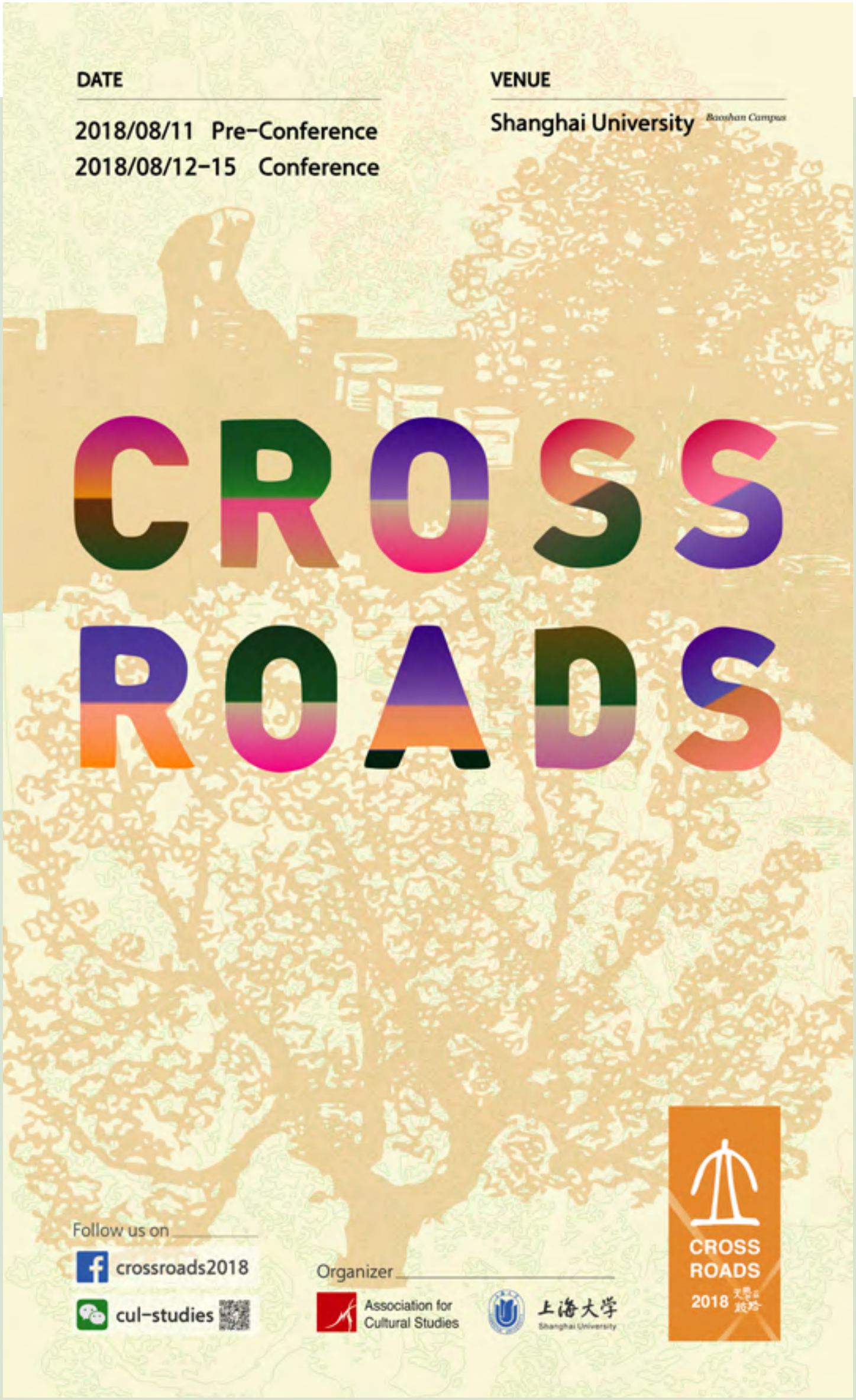
6 Yuen Wai, Helena (2012): “A Journey across Rivers and Lakes: A Look at the Untranslatable Jianghu in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online article]. Electronic journal of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7, 58-71.

多年以后，巧巧认为她成为了江湖的一份子，并且她掌握了江湖的核心精神，就是对友人的情义。体现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巧巧解释她对斌斌没有情了，只有义。她说：“江湖，不就是一个义字嘛”。在排除重重困难之后，巧巧成功反转了江湖这个概念内含的男尊女卑的权力秩序。她在原先的熟人网络里重新建立了一套理解人情世故的方案，她获得了为这个关键概念下脚注的力量。她不再是被动的、命运棋盘上任男性安排的棋子，她掌握了要不要跟斌斌这段情感关系，这段情感关系属性是什么的定义权力。这也是《江湖儿女》最能体现女性能动性的地方。

结论

从五四运动至今，中国现代妇女运动走过百年。第六代导演贾樟柯以赞许、同情、支持的态度为当代中国女性吟唱了一首赞歌。正如文本所述，在他的电影结构里，他将女性的丰富主体性围绕在爱情、家庭伦理和非正式经济展开探讨。贾樟柯拒绝了当代主流商业化电影对女性角色的处理：他拒绝启用脸蛋低幼化、身材火辣的一线芭比女明星，拒绝将女性角色扁平化、附庸化处理。在他的细腻处理底下，女性不是政治利益交换的牺牲品，也不仅仅是男人的帮手，他表现出了中国女性在爱情想象、传统家庭伦理、江湖义气和法律法规以及各种亚文化潮流所交织的复杂关系网络里，勇敢活出的一生。

■ 现场　Crossroads2018 “无畏在歧路”



Crossroads 2018

无畏在歧路

返回目录

天晨在岐路

上海大学

伟长楼

2018/08/ 11　青年场

2018/08/ 12-15　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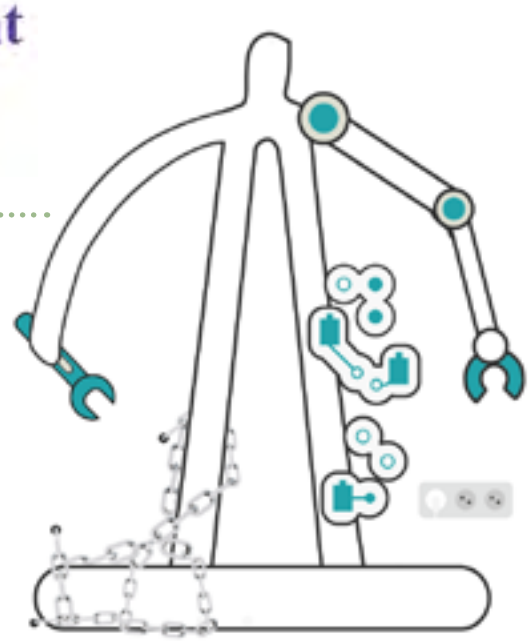
J 楼

CROSS
ROADS
2018 天晨在岐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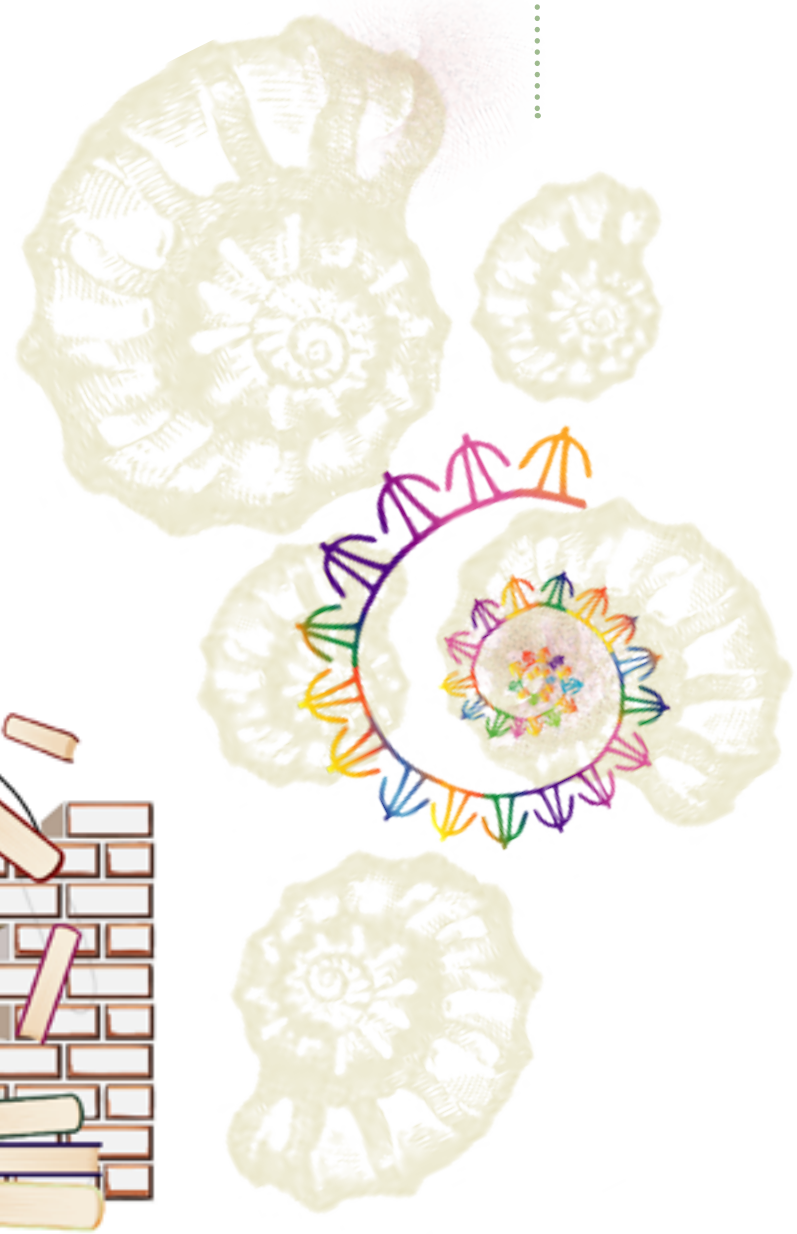
■ 现场　Crossroads2018 “无畏在歧路”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Labour Right and Post-work



Ideas & Practices for the Alternativ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Its Transformation

Political/Cultural Unconscious of the Youth

“性别在燃烧”

国际文化研究学会第 12 届 Crossroads 双年会性 / 别议题小组会议掠影

■ 杨玲 *

性 / 别 (gender and sexuality) 议题向来是文化研究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本届双年会也不例外。据笔者粗略统计，在有组织的 140 多个小组会议 (panel) 中，直接以性 / 别为主题的小组会议约占 15%。由于每个会议时间段都安排了十多个平行的小组会议，不少想听的场次均因时间冲突未能到场。本文主要分享笔者有幸聆听、参与的四个性 / 别主题的小组会议，并试图从这些零散的学术见闻中管窥国际性 / 别研究的一些发展动向。

一．性/别与国族

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及新媒体系的高级访问学者 Raka Shome 组织的“性 / 别、国族和现代性”小组会议旨在探究现代性逻辑、民族主义和性 / 别之间的交错关系。四位来自亚洲和北美的资深学者就现代性与法律、性别与国族、国族与商品文化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 杨玲，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性别与文化研究。

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教授陈锦荣(John Nguyet Erni)的论文《无认同的性权利与来自比较法的经验》(“Sexual Rights without Identity and Lessons from Comparative Law”)从国际比较法的视野探讨了性少数人群的人权问题。国际法通常会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不同的司法制度达到某种程度的“认识等值”(epistemic equivalency)。基于这个假设，论文考察了作为国际法扩散例证的《关于将国际人权法应用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相关事务的日惹原则》，并将它和香港司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W诉婚姻登记官》(俗称“变性人婚权案”)联系在一起，审视了司法制度中的民族国家问题，如地方性的司法实践与跨国的人权义务之间的张力。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性别与妇女研究系教授 Minoo Moallem 的论文《作为商品的国族与作为国族的商品》(“Nation as Commodity and Commodity as Nation”)是其 2018 年出版的新书《波斯地毯：作为跨国商品的国家》(Persian Carpets: The N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Commodity)中的一章。该书认为波斯地毯作为一种商品，不仅将生产和消费，劳动和休闲，物质和非物质，东方和西方等不同世界联系起来，还跨越了公共和私人、宗教和世俗、文化和经济、现代和传统、家园和离散、艺术和商品等多重边界。小组会议上，Minoo Moallem 以印着战争图案的地毯为例，分析了商品和国族之间的关系。由于国族的观念是透过商品文化而变得可知、可感，国族不仅是想象的共同体，也是在殖民现代性以及资本、劳动、表征体系的跨国传播的语境中生产出来的商品。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马兰清(Gina Marchetti)的论文《分裂的女人与中国梦》(“Divided Women and the Chinese Dream”)借用 W.E.B. 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异化理论和“分身”(doppelganger)的概念，分析了《安娜与安娜》和《小荷》这两部由女性导演的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双重性和分裂性。马兰清认为，当代中国女性生活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并被意识形态、阶级、族裔、语言撕裂的社会里，她们正在经历着类似美国

黑人因种族压迫而产生的“双重意识”。这些关于分裂的女性的叙事可以被解读为中国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的国族寓言。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加剧，女性日益象征着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大陆与周边地区、民族国家与跨国离散、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多重裂变。

Raka Shome 的论文《清洁与净化“现代”印度国家》（“Cleaning and Purifying the ‘Modern’ Indian Nation”）是她正在从事的关于“清洁印度”运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文化净化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2014 年，印度新任总理莫迪发起了改善印度公共环境卫生的“清洁印度”运动。Raka Shome 认为，该运动所使用的修辞话语以及话语背后的逻辑与印度现代性中的性别化身体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洁印度”的宣传经常打着保护女性和为女性赋权的旗号（如防止女性因户外便溺而遭遇性侵害），实则巩固了将现代女性身体想象为“洁净”的异性恋和印度教话语。此外，这场运动还多次使用印度教的隐喻，展现出一种受印度教影响的阳刚、尚武逻辑。

二、东亚酷儿流行文化

数十年来，东亚地区流行文化的汇聚和交融已经对该地区，乃至全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岩渊功一（Koichi Iwabuchi）、蔡明发（Chua Beng Huat）、蔡如音 (Eva Tsai) 等学者的积极推动下，关于东亚流行文化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为可观。“重新思考‘酷儿’：东亚的双性化身体”两场小组会议 (double panel) 运用酷儿视角，集中探讨了东亚地区的雌雄同体 (androgyny) 现象，为东亚文化研究和酷儿研究打开了新的视域。

小组会议的组织者是伦敦国王学院文化、媒介与创意产业系教员 Eva Cheuk-Yin Li 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的博士后 Michelle Ho。两

人都是酷儿亚洲 (queer Asia) 研究网络中活跃的年轻学者。小组会议的内容简介将双性化 / 雌雄同体视为 21 世纪东亚地区一个持续引发争议和被建构的场域。雌雄同体指涉的是暧昧而矛盾的具身化（embodiment），一种介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状态，它将男性 / 阳刚和女性 / 阴柔用富含争议的方式集于一身。目前性别研究多关注 LGBT 人群，针对性别含混、性别流动、非二元对立的性别身份的研究相对较为缺乏，这两场小组会议可谓是一次填补学界空白的尝试。由于时间冲突，笔者仅聆听了第一场小组会议。

该小组包括三篇论文。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员 Timothy Laurie 的《男性气质中的柔和学徒身份：韩国电影、韩剧和韩国流行音乐》（“Soft Apprenticeships in Masculinity: Korean Cinema, K-Drama, K-Pop”）以前东方神起成员朴有天、BIGBANG 组合成员 T.O.P 和 ZE:A 组合成员任时完为例指出，韩国偶像团体的成员涉足影视表演之后，常常会在影视剧中扮演一个特别阳刚的男性人物的徒弟。由于媒介平台的变化，这些具有“雌雄同体”形象的韩国“小鲜肉”也会展演出不同的男性气质。Laurie 的论文对韩国学者 Sun Jung 关于韩国流行文化中的男性气质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推进。Sun Jung 曾针对东方神起、裴勇俊等韩国明星的跨国流行提出了“柔和男性气质”（soft masculinity）的概念。她认为这种男性气质吸收了儒家传统对“文”的强调，同时深受日本漫画和偶像文化的影响。不过，Sun Jung 没有涉及男性气质和媒介平台 / 形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东亚地区高人气的男子组合成员往往是影视歌多栖发展，Laurie 的发现无疑为东亚男性气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

Michelle Ho 的《从“男装”到无性别：日本的双性化身体》（"From Dansō to Genderless: Androgynous Bodies in Japan"）聚焦了日本的易装（特别是女扮男装）文化以及日本时尚界近年来出现的融合男性和女性风格的“无性别”趋势。“男装”在日本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 8

世纪，宝冢剧团的男役则是当代男装文化的代表。通过对东京男装文化的民族志研究和无性别的女性模特的媒介分析，Michelle Ho 认为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将二者当作一个连续体来考察，能够为日本及东亚的雌雄同体现象开启新的对话空间。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 Priscilla Tse 的《操演雌雄同体：香港粤剧中的易装女人、明星身份与粉都》(“Performing Androgyny: Cross-dressing Women, Stardom, and Fandom in Cantonese Opera in Hong Kong”) 也讨论了易装现象，不过，她的研究对象是粤剧中的女文武生，即男主角的女性扮演者。这种女扮男装是 20 世纪香港粤剧的一个突出特点。和 Michelle Ho 一样，Priscilla Tse 采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通过剧场表演和粉丝俱乐部的活动，深入观察女文武生的舞台形象以及她们与女性粉丝在舞台上下的互动。Tse 认为，女文武生公共和私人形象中的性别暧昧激发了女性粉丝的同性依恋，正是这种同性之间的亲密情感维系着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

三、中国酷儿文化

作为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的大规模国际文化研究会议，主办方对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给与了大力支持，促成了一场名为“当代中国的酷儿文化”的新书发布会。发布会涉及两部英文新书：《耽美、Cosplay 和中性偶像：中港台酷儿粉丝文化》(Boys’ Love, Cosplay, and Androgynous Idols: Queer Fan Cultur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2017) 以及《酷儿同志：后社会主义中国的男同性恋身份和同志行动主义》(Queer Comrades: Gay Identity and Tongzhi Activism in Postsocialist China，2018)。前者是一部论文集，由芝加哥艺术学院视觉与文化研究教授 Maud Lavin、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杨玲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助理教授赵婧 (Jing Jamie Zhao) 合作编辑。后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媒介研究助理教授包宏伟 (Hongwei Bao) 的首部专著。两部著作都对中国本土的酷儿政治和文化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试图颠覆以西方为中心的性 / 别知识和理论的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和呼应。《酷儿粉丝文化》主要聚焦了女性酷儿粉丝社群的文化实践，彰显了跨国文化流动对两岸三地流行文化的影响；《酷儿同志》则主要围绕男同的身份认同和行动主义，强调了社会主义遗产对当代中国同志身份和酷儿政治的奠基作用。《酷儿粉丝文化》将酷儿和跨文化的视角引入粉丝文化研究;《酷儿同志》则从激进左翼的立场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酷儿理论进行了对接。

考虑到中港台政治文化语境的差异，《酷儿粉丝文化》按照地域分为三个部分。中国大陆部分包括六篇论文。杨玲和徐艳蕊的《中国耽美粉丝社群与自下而上的文化全球化》围绕中国耽美社群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特点，论证了草根社群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Shi-chen Chao 的《Cosplay, 可爱和伪娘：作为假女孩的男性角色扮演者的酷儿化可爱》探讨了爱丽丝伪娘团的跨性别操演中“酷儿”和“可爱”的双重特质。杨玲的《“大同世界”：中国网络〈黑塔利亚〉粉丝社群中通过耽美萌生的跨 / 国族主义》审视了同人文化中性别政治和地缘政治、国族主义和跨国主义，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复杂交汇。赵婧的《在“伊甸园”里将后〈拉字至上〉的 Shane 掰弯：中国粉丝关于凯瑟琳 · 莫宁的八卦》认为中国粉丝关于西方同性恋生活的八卦构成了一种酷儿西方主义，目的是质疑中国主流社会的异性恋父权制。周舒燕的《从网络耽美社群到央视春晚：网络狂欢的转化性力量》勾勒了王力宏和李云迪的同性恋传闻的发展始末，指出“狂欢”这一概念对于分析中国网络空间的局限。周潞鹭的《东方不败、网络粉丝社群与后毛时期中国的传奇性酷儿偶像的性别政治》分析了观众对新版《笑傲江湖》电视剧中的东方不败形象的多样化解读。

该书的香港部分由两篇关于中性偶像的论文组成。Eva Cheuk-Yin Li 的《渴望异常（queer），协商正常：何韵诗的粉丝社群在其出柜前后》对比了何韵诗出柜之前和之后，粉丝对其性取向的接受状况，探讨了粉丝

如何协商正常与异常之间的紧张。Maud Lavin 的《大陆偶像李宇春的香港粉丝：选择性归属、性别暧昧和扎根的世界主义》聚焦了大陆出生、移居香港的李宇春粉丝如何利用李宇春所代表的世界主义和中性气质来协商归属感。台湾部分包括两篇关于耽美的论文。Weijung Chang 的《探索“日本性”的蕴意：台湾腐女 BL 幻想的个案研究》审视了台湾腐女的日本情结，她们对于日本形象中的熟悉性和陌生性的协商。Fran Martin 的《热爱 BL 的女孩：在台湾作为思考之物的 BL（修订版）》运用“世界建构”（worlding）的概念，论述了日本 BL 漫画对台湾粉丝的意义。日本神奈川大学跨文化研究副教授 James Welker 和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 Alvin K. Wong 担任《酷儿粉丝文化》一书的点评人。前者指出 BL 在亚洲各国的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共性，后者分析了酷儿粉丝文化对于华语语系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领域的启发。

《酷儿同志》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二到四章）探讨了同志身份的浮现及其表达。第二章以上海的酷儿空间为例，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力量如何塑造了中国都市的同志主体和欲望。第三章考察了“同志”这一术语在现代中国的谱系，一个原本指代革命主体性的词语如何被华语世界的酷儿人群挪用，以表达性主体性 (sexual subjectivity)。第四章通过接受同性恋心理矫正治疗的男同“病人”的日记，审视了他们主体性的转变过程，揭示了 1949 年以后“自我”观念的变迁。该书的第二部分（第五到七章）聚焦了酷儿群体的媒介和文化行动主义。第五章通过大量的访谈资料，讨论了崔子恩的酷儿电影和政治，描画了一副酷儿活动家的“画像”。第六章围绕范坡坡、石头、明明等年轻电影人组织的酷儿电影节的放映活动，探讨了酷儿公共空间和社群的打造。第七章针对广州人民公园的男同与警察的冲突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讨论，分析了同志社群自我动员的潜能。西交利物浦的赵婧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 Howard Chiang 担任该书的点评。两人都认为《酷儿同志》为中国和华语语系的酷儿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包宏伟在另一场小组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化蝶：西亚蝶和他的剪纸艺术》

（Becoming Butterfly: Xiyiadie and His Papercutting Art）延续了他对新自由主义情境下同志身份认同和主体性建构的关注。论文以西亚蝶，一位陕西农村出身的剪纸艺术家的生平和艺术为线索，追踪了他从民间艺人到艺术家、从已婚男性到自我认同的男同性恋者的多重身份变化，细致地分析了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 的酷儿生活及其主体化（subjectivation）和去主体化（desubjectivation）的模式。比如，西亚蝶本人“不问世事”，过着非政治性的酷儿生活，但他却一再被海外媒体政治化。包宏伟认为，西亚蝶“成为中国酷儿艺术家”(becoming Chinese queer artist) 的过程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进程紧密相关，并受到跨国 LGBT 话语、国际艺术市场、新闻和纪录片叙事等多种力量的形塑。西亚蝶在新自由主义下的商业化和政治化生活展现了一种“剪纸主体性”（papercut subjectivity）。

从上述几场小组会议中，我们或可总结出当代性 / 别研究在研究视域和方法上的三个特点。首先是交叉性 / 交错性 (intersectionality) 的分析方法，即不再把性别当做单一的分析范畴，而是考察性别和国族、现代性、法律、宗教等其他社会因素的交织、互动，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性别机制的运作。其次是不再只是在单一的民族国家框架下来理解性别，而是关注日益频繁的跨国家、跨地区、跨文化的交流对性别观念和文化的塑造。再次是突破认同 (identity) 政治的局限，不再假设存在某种稳定的性 / 别认同，而是考察这些认同被权力和话语生产出来的方式，关注成为主体的过程。

乡村的全球性：Crossroads2018 参会感想

■ Jennifer Macasek *

我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小镇长大的时候，感觉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缺乏全球视野，后来离开老家去大城市上大学才慢慢打开了我的视野，于是开拓视野就变成我读博士的目的之一。这次来上海大学访学，很有幸参加了夏天的 Crossroads 国际文化研究大会，我在大会里也发现了具有全球视野的团队，从中获益良多，于是特别想谈谈此次参会的感悟。

参会的时候，我在美国的社交媒体里看到一个美国教授参加美国社会学大会的报道。该教授说大多数的小组其实只是讨论美国的现象，但是他们不会说“我在研究美国的现象”，他们只会说“我在研究某某现象”。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当为标准，完全没有想做什么比较，或者承认别的地方不一定是这样。而另外一个教授则留言说她研究的是加拿大，但是她不愿意在标题里写明“加拿大”，免得没有人去听。当然，这届大会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的研究兴趣是 1950 年代至今中国文学里的乡村形象变迁。之所以会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源自我的生活经验——我就是从美国的乡村里走出

* Jennifer Macasek，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攻读文学博士，2018-2019 至上海大学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乡村文学，研究兴趣是 1950 年代至今中国文学里的乡村形象变迁。

来的“土博士”。因此，很高兴这次的 Crossroads2018 大会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当为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这样我就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乡村，甚至全球乡村的情况。

在参加了一些关于乡村的小组讨论以后，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小组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加速的城市化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乡村，甚至一些地方的乡村已经被消灭。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乡村还有什么可以保持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村民还想不想留在乡村？乡村应该怎么发展，还是减少甚至取消比较好？

有个小组的讨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的第一位学者报告了一个浙江村庄的村民都想念他们以前集体生活的现象，尤其想念他们一起听广播的情形。这样他们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有了对话的共同基础。而且，这样比较容易认识到政策的改变对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位学者的报告是一个情况很不一样的山东村庄，那里的村民的生活方式比较苦，比如房屋都比较破，没有钱修缮，他们想不出来自己在乡村的未来。他们只有一个梦想，即政府把土地征收，给他们补偿，他们可以在大城市重新开始生活。 这两个村庄有很明显的不同，但是这些不同是从哪里来的？城市生活有什么吸引力？这个吸引力是从外面城市来的，还是内生于本地的状况？这些都引起了我的思考。

反过来，另外一个主题是留在乡村的人应该怎么办？怎么帮助他们面对城市化的入侵？似乎旅游业是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旅游业在不同的地方有很不一样的结果。比方说，某个报告指出，在发展旅游业的小镇，大家都期待普及电力设施， 但是因为旅游公司的权力比较大，旅游区的设施总是优先发展，本地生活区却常常被忽略。而另外一个报告则提到其他小镇有两个在建的大型跨国连锁酒店建得非常豪华，然而不远处的本地生活区仍有很多没人关心的破败房屋。

所以，旅游业当然带来了好处，但是它的好处不一定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

这是当代乡村共同的问题，不过，学术的方法不足以深入问题本身。我参加的印尼的一个小组讨论就是另外一种办法。这个小组参会者都不是学者，他们是村长，商人，等等。他们介绍了发展印尼乡村的不同经验和办法。例如，村长介绍他们的一个项目，教留守儿童传统的音乐和舞蹈，甚至举办一个节日庆典。这样就可以增加村民对于乡村生活的认同。而商人的报告是帮助农民卖咖啡豆子和邀请游客来观看种咖啡豆子，这样就可以减少对中间商的依赖，提高收益。当然，他们在提问环节也承认这些项目里存在问题，比方说，村庄之间对游客的竞争。因此他们也强调具体办法的特殊性，在一个地方有效的办法，别的地方不一定奏效。一个村庄的成功源自它们在地的文化和需求，不一定适合别的地方模仿。所以，重要的是学习发展的原则，而不是完全模仿发展的办法。

无可否认，不论中国还是印尼，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都依赖于地方的特殊性。作为听众，我们究竟可以从这些不同的演讲里得到什么样的整体性启发？例如我们可以从某个小镇发展旅游业遇到的困难里学到些什么？可不可以用这些经验帮助别的小镇？ 如果差异太大，找不出共性，那么我们为什么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小镇之间的特殊差异，我们得出的结论就一定会有误差。我从纪念 Arif Dirlik 的小组讨论听到一个好的提法：所有差异不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还要分清什么差异比较重要，什么不那么重要。

因此，我们不只要注意研究的内容，还必须反思研究的方法论。在这个层面，有几个演讲给了我很多启发。例如，我们的研究前提与路径对结论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 Maria Rojas 的建议很好：在研究乡村问题的时候，要注意研究的视野，反思研究的假设里有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要先查明真实的情况，才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例如，Rojas 和 Cheikh Gueye 都觉得乡村与城市之间不是分裂的，而是连续体。Rojas 提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说乡村就是贫穷的，而应该深入考察乡村的贫穷与城市的富有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才可以有效的发展乡村。

而另一方面，Gueye 觉得研究当下的城乡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想象这对关系的未来可能。比如为什么乡村居民想要搬到城市，而城市居民却觉得乡村有吸引力？其中包括了什么样的潜在可能？于是他提到了城市化造成的生态问题。一方面，乡村的吸引力可能来源于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可不可以再利用这样的吸引力促成城市居民返回乡村，减少城市生态的压力。虽然他们讨论的对象不是中国，但是他们的方法论和结论可能对思考中国的状况有启发。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特别成功的国际会议。我特别欣赏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努力，同时也很有幸参加此次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会，它让我重新反思有没有充分考虑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论。

最后，我对大会也有一些小建议，比方说，如果两个小组的研究话题很相似，但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不同地方，那么可以把这两个小组放在相同教室的不同时间段，如此两个小组就可以互相提问，促进交流的效率，帮助我们多开拓视野，发现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联系。

Crossroads2018 中的保洁阿姨

■ 吴月 *　张少璞 **

与其他所有国际标准的学术会议一样，Crossroads 大会为参会人员准备了茶歇，地点就选在 DJ 楼一楼的两间教室里。于是，相较于其他的分会场，有这茶歇休息教室的 DJ 楼一楼，也就成了会场的交通枢纽，热闹得很。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来来往往、愉快交谈的参会者，匆匆忙忙的志愿者，还可以看到忙碌于打扫的保洁阿姨。在大会期间，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在分会场，经常与保洁阿姨们打交道，一来二去，也就熟识了起来。这一天，我们正好路过茶歇教室，此时茶歇时间已过，教室里还有不少参会者，或是聊天，或是准备发言。教室外面的塑料椅上坐着保洁 Z 阿姨。见到 Z 阿姨孤坐着，我们便请阿姨到茶歇室里吃点东西，补充点能量。谁知 Z 阿姨却一摆手，笑着对我们说：“穿我们这种衣服的，不好进去哟！”我们听了，很是震惊，下意识地觉得不妥，更执意邀请阿姨到里面吃些点心。Z 阿姨推脱不过，便随着我们进去，拣了些带着包装的食物后就匆忙出来。

较之于大会上的学术讨论、思想交锋，保洁阿姨可不可以进茶歇教室，似乎是一件小事。但这样一件小事，却总是让我们不断想起，既希望借此想明白自己那一刻的下意识的反应，也企图由此增加对于大会 / 现实的理解。

*　吴月，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苏州星星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实习生。
**　张少璞，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曾参加过工友之家志愿服务。

一直以来，我们总是说 Crossroads 的顺利举办，是所有工作人员和参会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想象中，这里的“工作人员”，既涵盖了由本系师生组成的会务筹备组、来自各地主动报名的志愿者，也理应包括负责场地、设备等维护的保洁阿姨、器材师傅等全体成员。这原本是我们在大会筹备之时便已经形成的理念——所有成员都应是会议的共同缔造者、参与者，而不仅只是服务人员。然而，在会议现场，当保洁阿姨以工作服为由，拒绝我们邀请的时候，这让我们猛然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我们瞬间的震惊和下意识的不妥，实际上在于阿姨的言行与我们从大会筹备开始就相信的理念相背离，甚至是打破了一种“假象”，看似其乐融融、互帮互助的我们和阿姨是彼此的“同志”，但阿姨拒绝的理由却在告诉我们，我们顶多只是同事，还是隐约有着上下级的同事。当时执意的邀请不过是生硬地妄图圆上“共同”的口号，但在后续和保洁阿姨更深入地交流和思考后，我们明白了在这一轮看似简单的邀请和拒绝背后，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参与主体间的“对话”。

事实上，从一开始，阿姨进入会议的方式就和我们，乃至志愿者有着很大的区别：保洁阿姨是与大会签订合同的劳务派遣公司派遣来的员工，她们以契约的方式确定了与大会的关系，会议内容并不重要，她们只是按照要求完成自己既定的任务。简言之，这是一份工作。工作意味着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完成规定的工作量并获得工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工作态度，一身深蓝色的工作服就是对于工作态度最好的约束。即使是在工作期间，坐在长椅上稍作休息时，工作服仍在提醒着她们工作规范的存在，而领班是这种规范的强调。领班穿着与众不同的白色衬衣，行为举止也更为“庄重”。领班有权与“上级”沟通交流，选派“表现好的”员工来承担额外的会议工作，甚至也有不小的权力来给保洁阿姨们“分配福利”，当然这也要看阿姨的“表现”。当面对我们的邀请，阿姨脱口而出“衣服不合适”时，外在的监督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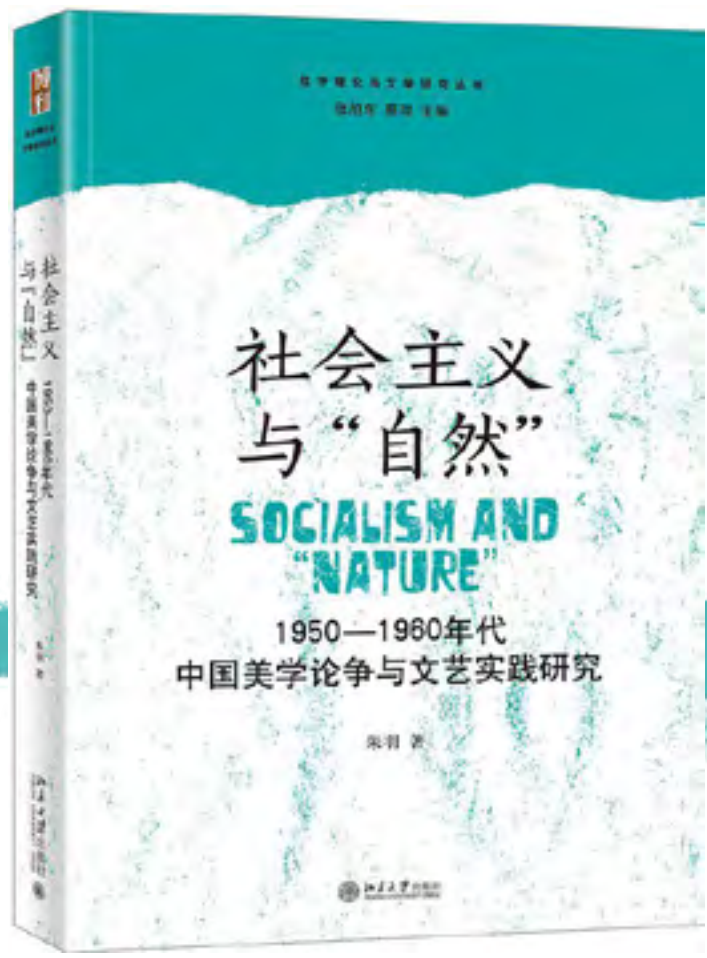
无言的竞争机制已然使得工作规范内化为阿姨们的自我要求了。阿姨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也紧紧围绕着这样一种工作制度而生长起来。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工作伦理也使得阿姨极为认真地对待、尊重自己的工作，她们认为在工作中是能够创造尊严与价值的。在大会结束后，我们再次和阿姨们交流，回忆起大会期间的共同工作时，阿姨们也很是高兴，还与我们介绍到大会期间保洁阿姨们主动帮忙的事情：比如雨天地滑，保洁阿姨们就帮我们拖干地面；会场无人，阿姨们就帮我们锁好教室；筹备组忘了给工作人员餐券，阿姨们便帮那位工作人员索要 …… 很多筹备组与志愿者们没有照看到的地方，都是阿姨们在帮我们默默照料。这些并没有在劳务合同中明确规定的工作职责，在阿姨们看来也是她们应该做的，可见阿姨们被工作紧紧束缚的主体也能创造性地发挥我们预想不到的价值

而回到我们和志愿者，我们恐怕很难将大会期间自己的劳动称为工作。志愿者们基于自己对大会的理解，怀抱着各自不同的期望投放简历通过筛选而来，虽然表面来看是无酬劳动，但也大都得到了非物质性的收获。而我们作为大会的主办方则必须“人尽其用”，使出浑身解数地促成会议的成功举办，这是学术体制内的生产。我们不断地强调非物质劳动的价值，强调“互助”的重要性，尽管我们有一定的“劳务费”，但那显然不同于工资的概念。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解、对于一些普世价值的相信和追求以及体制内对学生的要求建构了我们的主体。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参加了这么多会议，却只在 Crossroads2018 中我们才有意识地关注到阿姨，才会认为邀请阿姨进入茶歇室是重要的。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我们急切地希望用行动打破我们之间的隔阂。但我们忽略了观念的塑成非一时一日之功，也不是一件事就能得以扭转。更为重要的是，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不同想法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生成机制，不同的机制间要如何得以对话和交流，仅仅是居高临下的“关怀”是行不通的。

在 Crossroads2018 大会中，因为有一以贯之的“共同参与”的理念，因为身为文化研究双年会的主办方，我们格外关注平等、阶级、互助这些问题，保洁阿姨的拒绝才会显得突兀，从而引发思考。在会议结束后，失去了“共同参与”光环的召唤，突兀的问题便又变得“日常化”了。有心的交流、真挚的情感尚且不能冲破隔阂，而日常现实中的相遇实则隔阂更深。比如，最近为了迎接卫生检查，保洁阿姨进入宿舍帮助学生打扫却遭到学生噪音、隐私等问题的怨言一事尤其能说明这一点。在 Crossroads2018 结束后，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两种主体间真正的对话，彼此理解，认识到各自的长处和软弱，在经验的对照中、在差异间寻找新的主体性产生的可能性，一种真正地知识上和生活上“共同参与”的主体性，一种能够在当下社会中“改变文化”以至“改变世界”的主体性。在这个万事万物都迅急飞驰、一切设备都更新换代、所有媒体都高声喧哗、任何价值都匆忙折旧的时代里，这一主体性的确立却并非一朝一夕可及。但如果没有持久的警惕和学习、日复一日的反刍与思考、以及细水长流的勇气与信心，又何谈“漫长的革命”呢？

无畏在歧路，志愿者留影

返回目录



作者：朱羽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8-10

目录

导论

一、自然界、自然状态、自发性与客观性：从历史经验出发
二、辩证唯物论的“自然”、观念史中的“自然”与批判理论的自然观
三、三元框架中的历史实践与“自然”
四、文艺实践与形塑“自然”
五、本书章节安排

第一章“自然”与新世界：围绕社会主义“山水”及“风景”的考察

第一节 新山水、新国家与新主体——以国画改造话语为中心

一、“真实”的“山水”与“世界（观）”的改造
二、意境、红色山水与革命主体的空间化

第二节 “社会主义风景”的文学表征及其历史意味——从《山乡巨变》谈起

一、“观察”及与自然的和解
二、视觉与声音：“风景”的意义问题

第三节 青年，“栓心”与人化的自然——以《朝阳沟》为例

一、“政治课”的失效与“自然”的浮现
二、劳动、伦理与属己的自然

第四节 “民族形式”、“多元一体”与“风景”

一、“中华民族”的位置：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与“少数民族”议题
二、新中国文艺实践与“民族形式”：以“风景”为线索的追问

第二章 中国美学大讨论中的“自然”

第一节 客观美与“自然”问题

一、中国美学讨论的历史与理论脉络
二、客观美与社会主义实践的自我确证
三、“自然美”与“社会主义”

第二节 自然美：常识与教养的争执及其它

一、超历史的自然美，或内在于社会的“自然”
二、被动的自然与审美主体性
三、自然美、教养与“解放”

第三节 劳动、美与人的“自然性”

一、“劳动美”与美学话语的转型
二、“劳动”及其美学评价的谱系学分析
三、“劳动－艺术”论争：重思人的自然性

第三章 叩问“自然”的界限：“大跃进”中的劳动与文艺

第一节 作为“文化革命”的群众文艺实践

一、克服臣属性：文化革命与无所畏惧的“主人”
二、“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与消灭社会分工的设想

第二节 新民歌和新壁画中的劳动、自然与主体

一、生产与本源：重新定位群众创作
二、“自然”之中的“自由”：劳动、丰裕与“新”

第四章 社会主义喜剧与“内在自然”的改造

第一节 笑的批判：旧喜剧与新喜剧

一、高与低，新与旧
二、成问题的“笑”
三、正面形象与崇敬的笑

第二节 喜剧主体与“新人”

一、“人不仅仅是人”与“革命的分心”：新喜剧的主人公
二、“裂隙”：歌颂性喜剧的美学政治

第三节 “革命”与“分心”——以 1950-60 年代新相声为例

一、新相声的基本机制
二、大跃进与新相声的转型
三、1960 年代的新相声及其“革命 / 分心”机制

第五章 激进时代的“心”与“物”

第一节 激进时代与“心”的线索

一、“一分为二”、辩证的生活与“领导权”的挑战
二、“心理”的“剩余”：1960 年代心理学批判视域中的“情感”及其他

第二节 激进时代与“物”的线索

一、“见人”与“见物”：“经济”的政治及其挑战
二、“新人”与“物”：从《丰收之后》到《艳阳天》

结语

图例来源

参考文献

后记

“见人”与“见物”

——“经济”的政治及其挑战*

■ 朱羽*

（一）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频频提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议题并号召全党干部批判性地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 他在组织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曾发表过这样一席话：

> 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愈读愈有兴趣。但是，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其实每小时都没有忘我。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的。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他过去说，技

* 本文节选自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 朱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大学中文系。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思想，美学与批判理论。

1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尤其是第489-500页。

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富反坏右，一部分干部，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想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多数人想干共产主义。因此，必不可免地要有斗争，要有长期的斗争。[2]

“见物不见人”是毛对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路乃至整个苏联政治经济学路向的一个核心批评，其中也折射出毛自己关于政治与经济之关系的基本看法。他非常敏锐地见出，所谓“社会主义秩序”同样会产生“物”（尤其“技术”）对于“人”的压抑；而且此种压抑要比阶级剥削更加隐秘，更难得到反思。在 1958 年下半年的历史语境中，“物”的问题与上述引文所提及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有着内在联系。同时，对于“物”的反思，也与“大跃进”时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高亢基调有关。具体说来，“物”除了指毛所谓“技术决定一切”或者说物质—技术条件决定论外，主要关乎“物质利益原则”或“物质刺激”。张春桥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开启了 1958 年–1962 年“资产阶级法权”讨论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从此点出发来驳斥苏联政治经济学思路及其中国“跟从者”的：

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

2　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 年 11 月 9 — 10 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会，2000 年，未公开发行版），第 43 页。

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3]

张春桥的引文可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找到。[4] 他对那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信条为“尚方宝剑”的“经济学家”们十分不满，谓之“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同时，张对解放后实行的工资分级制度颇有微词，并且憧憬解放前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之“平等”状态的恢复。但是在 19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的历史环境中，张的论说并未成为主流。《人民日报》在刊发张文时就特别点出其“片面性”，而且此种想法立即招来了更加系统性的批评。撒仁兴（据说是关锋、林聿时、吴传启合用的笔名）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则呈现了当时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主流看法：

张春桥同志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很好的。这篇文章，歌颂供给制，批判片面地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刺激，批判把“按劳取酬”看作是不可动摇的永恒原则，对于这些，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是，我们觉得这篇文章缺乏理论分析，说服力不够，而且有片面性，有许多重要问题并没有说明白。例如，我们要大破资

3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3 日第 7 版。

4 参看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 490-495 页。

> 产阶级法权观念，但是，是否在实践上要立即彻底废除资产阶级式的法权？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在过去几年以至目前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如是不可避免，共产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它？按照作者的论述，似乎他主张目前要立即完全取消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并不承认（至少是没有明确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是不同意的。尤其是这一点：张春桥同志似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制度说成是等级制度；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不把上面这些问题弄清楚，那是会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造成混乱的。[5]

撒仁兴点出一种无法摆脱的客观性甚至历史必然性：目前无法在实践上彻底废除“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在此前提之下，撒文做了一种微妙的“切分”：用共产主义原则观察问题、训练干部、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但在实践上是否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则需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确定。[6]在作者看来，此种思路体现出共产党人“实现最终目的和从现实出发、变革现实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的统一”[7]。当然，这一基本对策的提出，首先关乎当时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把握：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因而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已被废除（虽然还有残存，比如“定息”）。如今主要问题在于消费品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式的法权”。[8]因此也就不难理解，1958 年至 1962 年的“资产阶级

5 撒仁兴：《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哲学研究》1958 年第 7 期，第 20 页。关于命名，值得一说，此文作者强调：“我们不必咬文嚼字，在上述意义上，把‘按劳分配’的法权叫作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或者叫作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或者叫作‘资产阶级法权’都是可以的。”，第 23 页。

6 撒仁兴：《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哲学研究》1958 年第 7 期，第 21 页。

7 撒仁兴：《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哲学研究》1958 年第 7 期第 27 页。

8 参看撒仁兴：《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哲学研究》1958 年第 7 期，第 22 页。撒文中还有“以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挂帅对待‘按劳取酬’不过是一股小小的逆流”一语。（同上，第 27 页。）在文革后期语境中，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尤其指责 1958-1962 年讨论的“狭隘化”，所谓“把本来是讨论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引导到工资问题的争论上”。

法权讨论”尤其聚焦于“按劳分配”问题。就此一要点，撒文划出两条具有“原则”意味的“线”：一、“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但它不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而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二、以共产主义原则破除“等价交换”的观念，而不是以资本主义思想去替代它。[9] 或许是感觉到此种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切分”略显机械，撒仁兴在谈及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具体策略时，赋予了“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强调：“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要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主要就是推行义务劳动和半供给制（有条件的地方）结合起来，结合对某些人所存在的糊涂观念和问题进行辩论，结合对劳动态度的批评和表扬，结合批判雇佣观点。”[10] 这等于在暗示：单纯的政治思想教育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劳动“习惯”及其“理性”，因此需要制度因素介入。进言之，真正有效重塑劳动这一“第二天性”，需要调动民主评议与形象—美学机制，同时配合新的制度实践。思想或观念如要有效地运作于“经济”领域，势必需要某种必要的“转码”。同时，“经济”领域尤其是微观的日常经济实践与劳动行为，也无时无刻不在稳固或抵消某种特殊的观念形态。因此可以说，“物”的领域也在不断生产出某种“人”的特性。这个并非完全外在于“社会主义教育”但未被其完全穿透的领域，恰恰是社会主义实践最需谨慎对待的领域，也是我们的重读尤需注意的领域。也正是在 1958 年以降关于“按劳分配”的某些具体讨论中，此一维度彰显了出来。

首先，有讨论者强调“按劳取酬”的计算“总是只能算一个大概，如果都锱铢必较，那就是以资本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的原则了。”[11] 这不啻是希望在“按劳分配”内部设置一种“限制”：为了抵御滑入“按

9　撒仁兴：《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哲学研究》1958 年第 7 期，第 30 页。

10　撒仁兴：《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哲学研究》1958 年第 7 期，第 31 页。

11　刘敏：《“按劳分配”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理论战线》1958 年第 9 期，第 12 页。

酬付劳”，就需限制个人层面上的经济理性——“锱铢必较”，并且引入“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但作者同时强调，不计报酬的思想并非无根，只有客观上实现了“按劳分配”制度，使个人“用不着担心他自己的劳动有无报酬”，主观上的“不计报酬”才成为可能。可以发现，这里已隐约勾勒出一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观念形态：对于所付出的劳动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必有正当的回报持有信念；在此基础上，激发起为此社会制度无偿贡献剩余劳动的冲动与意志。但是，如何具体地克服“锱铢必较”的态度与习惯呢？这就要涉及大跃进时期对于“计件”工资的批评了。因为计件的弊端在于“时时刻刻要在集体和个人之间斤斤计较，就可能使有些人感到他和集体之间所存在的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就不只是不能各尽所能，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都发生动摇了。”[12] 显然，这里涉及“物”对于“人”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是“计酬”形式对于人之劳动习惯的影响。有趣的是，作者并没有马上引入思想教育，而是认为“计件”与“计时”之争本就在施加“教育”：

> 计时比计件要好一点的，是人们并不要在每日每时做每件活路时都只考虑到自己的收入；当然人们也有时会想到他的收入，想到要设法增加他的收入，但这种想法就很可能是和要求生产发达的想法相联系的，因为只有生产大大地发达了才有可能普遍地提高工资。……不要钞票挂帅的意义也就在此；人们的脑筋总是不能同时想到两件事情的，只有更少的想到钞票，就可能更多地想到政治。[13]

很大程度上，作者是站在“常人”立场上来探讨计酬形式与人之改造

12　刘敏：《“按劳分配”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理论战线》1958 年第 9 期，第 13 页。

13　刘敏：《“按劳分配”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理论战线》1958 年第 9 期，第 13 页。

的关系。其要点不在于让“政治”强行进入人的头脑，而是先在头脑中逐渐挤压“钞票挂帅”的空间，来为“政治”的进入清理“场地”。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分配机制来调节“人”与“物”之间的固有联结方式。这也就在“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之间设立了诸多“过渡”环节。社会主义的“治理”特征亦可由此凸显。

因此，“计件”工资制度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经济分配形式，而更应注意其作为意识形态机制也在不断塑造人的行为倾向与心性状态。讨论中，有论者敏锐地指出，“计件工资制度矛盾突出的单位，不少也是政治思想工作很强的单位。”[14] 也就是说，政治思想工作想要有效地渗透进经济体制，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原因正在于分配形式不断地释放出抵消政治思想工作的力量。计件工资制着眼于“人性”的低端——“见物不见人”。它呈现出“管理”压过“政教”的倾向：

> 计件工资制基本上是一种每时每刻地、直接无限地以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数量与质量（更确切地说，主要是产品的数量）为转移的劳动报酬支付形式，也是一种单纯依靠物质刺激促使劳动者关心个人的劳动成果从而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经营工具。[15]

进言之，这种“经营工具”无时无刻不在生产过分关心“物质利益”的“个人”意识。在当时的评论者看来，计件工资制绝非按劳分配的最好形式。正如上文所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理念努力凸显的是朝向共产主义劳动的可能性，最终诉诸的则是“群众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人翁感觉”，诉诸一种劳动的主动性，一种将“劳动”从狭隘的经济理性中解放出来的

14　金若弼：《计件工资制是不是按劳分配的最好形式》，《学术月刊》1959 年第 3 期，第 50 页。

15　金若弼：《计件工资制是不是按劳分配的最好形式》，《学术月刊》1959 年第 3 期，第 51 页。

集体意志。但这种新的“劳动理性”对于后革命时代来说是极为陌生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劳动理性的形塑，却也不是仅仅依靠政治思想工作，或者说“显白”的意识形态运作来实现的，而是纳入了必要的“管理”要素，即重视分配形式这一“物”的中介作用。当然，在当时的语境中，任何单纯聚焦于“物”的方式一定会被“祛魅”。任何尝试依托所谓“科学方法”与“技术测定”来全面“控制”经济活动的做法，都被视为已然先行压抑了“人”的要素，以至于放弃了形塑“新人”的承诺。[16]

也正是在批判“见物不见人”的脉络中，计件工资制就成了固化“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制度。在最坏的意义上，它不断强化旧有的劳动态度。这就将我们引向了“按劳分配”讨论中涌现出的另一处洞见——“资产阶级法权”的残留根本上是作为“习惯”而存在的，尤其表现为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心性、习惯。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性”—“计划”的“透明性”要求下，个人劳动直接是由全社会统一掌握的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一切生产劳动都是为了整个社会而进行的，那么分配也必然要服从全社会的需要。”[17] 但是困难在于，“分配形式并不是仅仅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形式，还要直接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取决于产品的数量。”[18] 更关键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被消灭了，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基本上保留了商品生产的经济形式。……几乎全部的个人消费品，都是通过商品交换形式而分配给消费者的。”[19]“按劳分配”无法从根本上触动商品交换形式；尤其是计件工资制这样立足于“物质刺激”的形式，反而会强化劳

16　参看金若弼：“技术测定对于经济活动的细致分析，无疑地有它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但这种限于物的作用以及当时条件下人的作用的分析，并没有把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足够的估计在内，从这一点来说，技术测定又不是最科学的，也不是最先进的。”（《计件工资制是不是按劳分配的最好形式》，《学术月刊》1959 年第 3 期，第 53 页。）

17　黄逸峰：《试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与按劳分配问题》，《财经研究》1958 年第 9 期，第 3 页。

18　黄逸峰：《试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与按劳分配问题》，《财经研究》1958 年第 9 期，第 3 页。

19　黄逸峰：《试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与按劳分配问题》，《财经研究》1958 年第 9 期，第 4 页。

动者的“雇佣观点”。这种“雇佣观点”毋宁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 劳动者仍然习惯于把自己的劳动视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一种赚钱谋生的手段，习惯于劳动和货币的这种交换关系，因而仍然把为社会而进行的劳动视为个人与社会的交换关系。这种观念是在几百年、甚至从商品生产最初产生时即已开始的几千年的长时期中所逐渐形成的，当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改变的。[20]

此种劳动者自我“商品化”的倾向当然不限于经济领域，它也与现代“个人”意识紧密相关，因此会以种种变化了的形式存在于政治、伦理乃至审美领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不断压缩着此种观念及其变体。集体性、阶级性和党性的话语机器在政治、伦理与审美上获得了领导权——至少是显白层面的“领导权”。但是，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具体的分配环节，资产阶级法权最终以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潜伏了下来：

> 劳动力虽然已经不是商品，但是仍然被用来作为换取一定量的劳动产品或货币的手段，它仍然具有占有一定量的社会财富的权利，劳动者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仍然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等价交换关系。[21]

此段引文中，“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等价交换关系”一语尤须注意。一方面，作者是想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者与社会（更确切地说，分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个层次）之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等价交换关系，即不是“商品”关系。但悖谬的是，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这种关系又不得不呈现为等价交换的形式甚至是依附于这种霸权性

20　黄逸峰：《试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与按劳分配问题》，《财经研究》1958 年第 9 期，第 4 页。

21　黄逸峰：《试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与按劳分配问题》，《财经研究》1958 年第 9 期，第 4 页。

形式。由此，古老的习惯依旧能够找到它可以附着乃至“复活”的媒介。针对这种“形式”的持存，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种回应可以借用里特尔（Alfred Rhetel）的理论来表述。在后者看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交换过程中，人的行动是社会性的，但头脑是个人的。[22] 与之相对，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中，行动是社会的，头脑也要是“社会”的（当然，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甚至在残留的商品交换中，头脑也需要是“社会”的。但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无法通过急促而激进的方式改变。深陷于此种法权观念的人们也不应为其陷落而背负伦理乃至政治上的罪名。我更愿意强调的是，1958 年的“按劳分配”讨论需被把握为一个呈现历史辩证法的瞬间。它使我们看到：“按劳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萌发，但不可能在社会主义中完全“实现”。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它只能是一个过渡。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按资分配），它是“实现”了，但又不能够固化而需扬弃自身。这个辩证瞬间即“按劳分配”的“矛盾”显现时刻，也可视为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的一种提喻。它显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生活的强度，并且关联着集体性、新人的形塑，关联着价值规律的利用与限制等重大问题。事实上，单纯强调“按劳分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也确实是一种盲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公有制是根本前提。劳动者的培养、福利体系的建设都是不可忽略的要素。更为关键的是，“按劳分配”不能提升为主观确定性，从而错误地养成一种“属我”的劳动的绝对性，最终生产出“个人主义”的任性。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按劳分配”已经是在体脑劳动相互区分的框架里展开的，因此极容易产生出各种“意识形态”：譬如能力等级论、劳动神话（压抑自然）、知识分子神话等。但是，这个辩证的瞬间也很容易就闭合起来。辩证的张力很可能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被耗尽：一是过度强调政治思想工作与人的主观能动

22　参看 Alfred Sohn Rhetel, Intellectual and Manuel Labour, p.29.

性，以看似激进却在制度实践上无所创新的方式对付“雇佣观点”，即放弃了社会主义实践治理上的复杂性。二是剥离经济活动的政治本质，恢复“按劳分配”的神话，引入受到超保护即被中性化的科技、管理手段介入经济。在此意义上，“见人”又“见物”的辩证法依旧需要获得其后世生命。值得继续追问的是，这种辩证法是否获得过叙事表现，是否被重写为文艺经验？

（二）

1962 年以后逐渐明晰起来的“革命接班人”议题以及整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历史潮流，实际上包含着极为明确的政治经济学实质。特别是对于“日常领域”阶级斗争复杂性的确认，关联着对于“物”之难题性的承认。正如“按劳分配”讨论所揭示的那样，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核心焦虑之一，正在于商品货币形式的持存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增殖的“物质刺激”要素。然而，现实的实践又无法绕开或无视这一“必然性”。如果说按劳分配的辩证法尚隶属于分配层面，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价值规律”（亦译为“价值法则”）概念及其引发的争论，则是此种“矛盾”更为普遍的表达。[23] 在 1952 年出版（同年十一月中译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关于“价值法则问题”的基本看法为：

> 价值法则首先是商品生产的法则。它像商品生产一样，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过，而且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例如在我国，也继续存在着，

23　1950-60 年代中国关于“价值规律”的讨论主要有三次，相关触发事件分别为：一、1951 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出版引发学习与讨论。二、1956 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展开。当时讨论的中心是：国营工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是不是商品？商品生产的范围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还有多大？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中是否还占重要地位？三、1958 年人民公社的诞生使商品生产有了若干新的变化。见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 年第 10 期，第 7 页。）

诚然，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限制了的。[24]

显然，斯大林是在马克思所规定的“价值”（劳动力的耗费）线索上展开讨论的。他既不承认价值规律是一种恒久的法则。在理论上，只要商品生产消失，价值规律就会消失。社会主义实践亦可有效地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生产资料公有制、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的作用所限制的，因而，也被大致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我国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所限制的。”[25] 然而他也认为，价值规律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后者被确认为“剩余价值法则”[26]），它要远为古老，标志着旧社会的顽强生命力。只要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形态，那么价值规律“总还影响生产”（譬如涉及经济核算问题）[27]。斯大林的这一论说成为中苏讨论“价值规律”的根本出发点。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经济学界开始“修正”斯大林的说法，强化“价值规律”的作用与地位。[28] 中国重估“价值规律”问题，一方面受到苏联相关讨论的影响，更源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历史情势，譬如中共八大通过一系列关于调整某些农副产品的价格、开放农民自由市场、自由选购、改善计划工作体制与方法的决定。[29] 颇为戏剧性的是，1958 年“大跃进”开始、人民公社诞生之后，“价值规律”问题再一次被推到经济论争的风口浪尖，其取向则与苏联政治经济学界判然有别。[30] 我接下来的讨论并非经济史的梳理，也不是一般经济理论的讨论，

24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28 页。

25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 17-18 页。

26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 28 页。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大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 30 页。）

27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 14 页。

28　可参看副岛种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孙尚清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 年，第 131-132 页。

29　参看陈克俭：《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作用的几个问题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6 年第 6 期，第 13 页。

30　副岛种典批苏联，褒中国，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经济的这一激进性。参看副岛种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第 29-30 页。）

而是针对几篇探讨“价值规律”的代表性论文展开症候式阅读。正如上文所示，“价值规律”根本上关联着“商品”，与“市场”也有莫大关系。虽然商品与市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已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但是仍可视为旧世界顽强的持留。而从话语特征上来说，这一旧的力量被把握为“自发”，新的力量则表现为“自觉”。在这个意义上，“价值规律”正是恩格斯所谓旧世界“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法则一样与人们相对立”的“社会行动的法则”最为顽强的表达。社会主义政制则有信心驯服这一准“自然”法则：

> 在国家市场领域里，价值仍然是计划价格及其变动的基础，从而价值规律对于价格的调节作用是存在的。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决不是自发地，而是在服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下，被自觉地加以利用的。……[在自由买卖的市场中]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作用，在可以约制的限度内，并不就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后果。……如果一切都靠计划规定，管得太多太死，对于生产与消费反而是不利的。[31]

此段引文的有趣之处，是希望在计划内部保留某种自发或自动的环节，从而形成一种自觉与自发的辩证配置。顾准发表于 1957 年 3 月的长文，更加彰显此种取向。当然，顾准的论述脉络本身十分值得注意。在他看来，那种以为商品生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两种所有制并存的斯大林式看法，未能看到问题的实质。社会主义“商品”及其价值规律之所以“必要”乃至“必然”，是因为“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32] 当整个社会尚无条件实行产品直接分配时，商品必将持存，资本主义复活的危险也始终存在。[33] 只有接受这一历史前提，才能具体地讨论社会主义实践。现实地看，现实社会主

31　汪旭庄：《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中的作用》，《财经研究》，1956 年第 2 期，第 3 页。

32　参看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 年第 3 期，第 32 页。

33　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 年第 3 期，第 31 页。

义为了完成自身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必须实行经济核算，而且这是“保留着资本主义经济核算的形式，改革其内容而形成。”[34] 顾准以一种决绝的语气指出，“社会主义同样必须严格核算所费劳动与有用效果间的关系……历史经验证明，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35] 正是在经济核算所指向的“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他质疑了“计划”的绝对性，提出“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矛盾统一体的观点：

> 于是经济计划就成为这样一种计划，它规定有关生产分配及产品转移的全局性的、关键性的项目；它规定各个生产企业的经济指标；但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对全部产品分配与转移规定得具体详明，丝毫不漏，因而是绝对指令性的计划。……一个实行广泛社会分工的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实行计划经济，才能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同时也只有它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计划经济，才能广泛动员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计划所不能细致规定的地方（事实上过于细致的结果，一定与实际生活脱节）自动调节生产、分配、产品转移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提供许多制订再生产计划的根据。生产规模愈大，生产分工愈细，消费水平愈高，经济核算制度就愈为必要。……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经济核算制是存在于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因素，由于经济核算制，社会产品全部转化为价值。可是人们常常不敢承认这一事实。[36]

顾准所秉持的是一种经济学家的“理性”，此种理性联通着强大的现代性建制——比如无法避免的生产分工。由于“经济”话语始终在处理“物”

34 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 年第 3 期，第 32 页。

35 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 年第 3 期，第 33 页。

36 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 年第 3 期，第 34、36 页。

及其机制，因此，经济学家尤其抱有掌握“现实”的自信。但不能不说，此种“现实”多少是经由经济理性来表述的：“为经济核算制度与个人对消费品的选择，总是一种经常存在的力量，要购买便宜的东西，生产较贵的东西。”[37] 顾准在这里强调一种运作于“底部”的、为俗常意识所领会的“规律”，而且他坚持认为此种“力量”内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因此，计划经济指令的全盘掌控，既不可能，也未必可欲。经济领域的适度“自动调节”成为计划经济体制良好运作的必要环节：

> 经济计划规定一个合理的限度（这个限度因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此限度内，任令经济核算制发挥对生产、分配及产品转移的自动调节作用。所谓“自动”，就是不必事事规定在经济计划内，事事由经济领导机关决定，而是由生产企业之间，或生产企业与劳动者、消费者之间，经过价格结构，与工资率以外的劳动报酬补充规定，自动进行产品的转移或劳动报酬的分配。……[这种作用]是价值规律在经济计划规定限度之内，而又是在计划经济本身之外，调节生产与流通。[38]

既在计划之内又在计划之外的“矛盾”修辞，不失为一个富有意味的症候。顾准非常自信地认为，以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述为依托的主流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只处理“事物的外观”而未及“事物的内部关系”。一旦触及“物”的真正秘密，就会得出价值规律制约经济计划的结论，而“经济计划要成为一个正确的计划，又非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不可”。[39] 我所关心的，并非顾准这一经济学说所具有的“思想解放”意义，而是其潜在的政教乃至美学“教义”。如果说计划理性生产出一种“透明性”与“自觉性”的政治—

37　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 年第 3 期，第 41 页。

38　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 年第 3 期，第 44 页。

39　参看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 年第 3 期，第 48 页。

美学图式，那么，此种计划内部包含“自动”环节的经济设想又与何种“人性”的界定相关？它又能产生出何种意义与感觉的偏好？退而言之，这一构型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干扰主导政教—美学话语的“潜文本”？

需要说明的是，顾准对于“价值规律”作用的阐释，只是当时四种主要阐释之一。[40] 但它属于一种积极解释。人民公社化后，此种解释尤其遭到质疑。主流看法尝试切断经济核算与价值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加明确地将商品生产及其“价值规律”视为一种必将消逝的历史现象。[41] 不过，相对于顾准而言显得更加“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讨论人民公社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时，依旧强调了价值规律“无所在，无所不在”的特征。[42] 譬如薛暮桥就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产生了诸多混乱的认识，其中最极端的表现是认为人民公社接近于全民所有制而且快要进入共产主义，商品生产快要消亡，因此价值规律也快要不起作用。[43] 于此，价值规律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写为“等价交换原则”。薛的看法是，人民公社执行了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方针，并不就会朝着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由于中国各个地区生产条件不同，将人民公社发展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不可能，也“不合算”。相反，农民生活资料中的商品性部分所占比例可能会越来越大。[44] 薛的分析不失为一种提醒：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远非走向所谓“自然经济”，也不是传统的封闭乌托邦设想，而是深刻地卷入了现代性进程。在此，“自

40　围绕“价值规律在当前作用问题”，至 1958 年主要有四种不同看法：一、价值规律对流通领域有调节作用，对生产领域只发生影响；二、对生产、对流通都起作用，但都不起调节作用，而是起促进作用；三、对一切商品生产和流通都起调节作用；四、对流通起调节作用，对生产不仅是影响（那太消极了），而是由积极的促进作用。（大凡：《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的学术讨论》，《财经研究》，1958 年第 9 期，第 33 页。）

41　参看大凡：《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的学术讨论》，《财经研究》，1958 年第 9 期，第 34 页。

42　薛暮桥：“所谓等价交换，就是每一种产品都按照它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交换。……价值规律是“无所在，无所不在”的东西，当你没有违背它的时候，它似乎并不存在；如果违背了它，它就立刻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 年第 10 期，第 11 页。）

43　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 年第 10 期，第 7 页。

44　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 年第 10 期，第 16-17 页。

发”与“自觉”的话语配置又一次出现了。但薛暮桥很有意味地略去了顾准所谓的“自动调节作用”：

> 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而价格政策则是主观决定的、是人们对价值规律的具体运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存在，价值规律就一定要起作用，要它不起作用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不是作为不受人们支配的自发力量而起作用的，在一般情况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已被国家自觉地、有计划的利用，利用它来达到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45]

乍一看，薛暮桥关于“价值规律”的核心看法与顾准并没有根本分歧。而且他更加明确地将价值规律类比为“自然规律”：

> 价值规律是客观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它就不能由人们的意志来改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图，有意识地运用客观规律，是完全可能的，但必须以遵守客观规律为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可能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而不使其自发地调节生产，发生破坏作用。但从可能变为现实，还必须认识它、掌握它。假使你违反了客观规律，它就仍然要自发地起作用。天空中的闪电是自发地起作用的，点灯里的电就是听从人的指挥发生作用的。但如果你违反了电的自然规律，就是已被掌握的电，仍然会违反人的意志，烧死人，烧掉房子。价值规律也是如此。[46]

不过，我们也需注意，紧接着上文，薛暮桥用一种“增补”的方式划定了自己的立场，即在利用“价值规律”的同时，需对之加以限制：

45　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 年第 10 期，第 16 页。

46　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 年第 10 期，第 19-20 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编者注：着重号替换为楷体。）

> 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对价值规律的作用作过高的估计。……在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上，如果无限制地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调节消费品的销售，而否认国家计划的作用，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各种重要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必须用国家计划来调节；当然国家在调节生产和流通的时候，仍然必须掌握正确的价格政策。对各种次要的产品，如果不可能通过国家计划来调节，也可以由国营商业机关通过供销关系计划，通过国营商业机关同各生产单位所订立的加工订货合同，通过某些消费品的定量供应制度，在必要时辅以调整价格作为辅助的手段。国家既不应当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任意违反等价交换的原则；也不应当滥用价值规律来调节各种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更不应当抛弃了国家计划而依靠价格规律来进行调节。[47]

薛暮桥这里的论述包含着对于“价值规律作用”的某种“切分”。一方面价值规律要求各种产品的价格以其价值即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某产品的价格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就会影响它的生产数量或销售数量，此即价值规律所起的调节作用。薛认为这是“一种作用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的前一种作用必须受到重视，而后一种作用只有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才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然受到限制而且始终需对之警觉。[48] 与薛暮桥态度相近的，是王亚南关于价值规律的论述。后者认为，从积极处说，多费劳动吃亏、少费劳动得益这一朴素的价值规律表达形式，意味着先进与落后的分野，

47　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 年第 10 期，第 20 页。

48　参看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 年第 10 期，第 19 页。

由此可形成一种“争先进赶先进的社会客观强制力”。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确立的计划经济制度可以有效地遏制价值规律自发的消极作用，在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之间创造出更加“透明”的关系，从而“直接给予他们以生产刺激”：“在这里，没有剥削阶级从中打埋伏，布疑阵，投机捣把，成本价格或生产价格能相当确定地反映价值；直接生产者的货币收入，能比较直接地反映他们的劳动质量。”[49]但王亚南坚持，以历史的辩证逻辑来说，价值规律是会终结也必须要终结的：“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促进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来加速我们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更快地来完成两种过渡，因而辩证地达到消灭商品生产、终结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50]

在 1959 年写成的《论价值》一文中，孙冶方则同时质疑了薛暮桥与王亚南的看法。首先，他引用了薛暮桥这一类比，但进一步强化了“价值规律”的准自然规律特征。在他看来，薛暮桥后来一段“增补”是弄巧成拙了：

> 既然对于价值规律，同对于电、对于一切自然规律一样，应该主动地去遵守它才能自觉地运用它，使它听从我们的指挥；那么照斯大林的说法，对它有“任何的违反，即使是很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引起程序的破坏”。因此，在这里就无所谓“滥用”或“无限制地利用”。……他所说的“无限制地利用价值规律……，而否认国家计划的作用，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等等，显然是指放纵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政策问题，是政治路线问题，这与价值规律是两回事。[51]

49　王亚南：《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1959 年 5 月 15 日第 7 版。

50　王亚南：《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1959 年 5 月 15 日第 7 版。

51　孙冶方：《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研究》1959 年第 9 期，第 47 页。

从此处可见，孙冶方也进行了一种“切分”：将社会主义改造乃至国家经济计划视为政策，而以“价值规律”为更为客观的、独立性的“经济规律”。他要求经济学者“把资本主义这个鬼同‘价值’和‘价值规律’这两个概念分家。”[52] 并且十分决绝地给出了“价值规律”的定义：形成价值实体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存在和运动的规律。孙冶方坚持说，只要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得承认：不管是在何种社会（包括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必要劳动消耗量和个别劳动消耗量之间的差别将始终存在。这种微妙的“差别”之存在，被他视作推动社会前进、落后赶先进运动永远存在的基础。[53] 换言之，一种“经济理性”将始终存在：“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是意味着要把劳动耗费同劳动成果比较。因此，重视“价值”概念，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就意味着重视经济效果。……在共产主义社会不能只讲生产，而不计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代价。”[54] 这样，孙冶方也就将“价值规律”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甚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之间的关联切割了开来。在此基础上，他质疑了王亚南一文最后的表述。其实，真正能体现孙冶方之关切的，是其对于“觉悟”措辞在处理经济生活时的限度之强调。那种仅从“思想意识问题”或“共产主义觉悟不高”入手来处理经济生活矛盾的想法，被孙斥为“唯心论”。[55] 孙的做法是，完全切开“觉悟”与重视“经济效果”之间的关联。从而为经济生活领域赋予了某种相对自律性。有趣的是，这也暗示出，这里恰恰是社会主义实践需要悉心运作、谨慎对待的领域。某种意义上，孙冶方放弃了那种“自觉”与“自发”相对峙的话语，而是强化了“客观的政策”与“主观的政策”

52　孙冶方：《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研究》1959 年第 9 期，第 48 页。

53　参看孙冶方：《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研究》1959 年第 9 期，第 63 页。

54　参看孙冶方：《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研究》1959 年第 9 期，第 61 页。

55　参看孙冶方：《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研究》1959 年第 9 期，第 61 页。

这一配置。并且非常明确地将社会主义体制视为一种高度理性的、甚至是深深植入了经济理性的体制。这尤其表现在他对于劳动量可精确计算的设想中：

> 至于计算技术的困难，在发明了电子计算机的今天，正确计算产品的全部劳动消耗（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消耗）是完全可以办到的，问题也在于大家先要有重视计算社会必要劳动的认识。而且据专家意见，如果不按每一产品来计算，而以每一行业（产业部门）来计算，就是不求助于电子计算机，就用数学中的近似法也可以计算得出全部劳动消耗。至于各种复杂程度和熟练程度的劳动的折算，我们可以按照工资收入标准折算，因为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工资制度基本上是合乎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因此，以计算上的困难作为理由（不论这困难是技术的原因或是社会的原因造成的）是不成立的。[56]

这里显然有着计算机托邦（computopia）设想的痕迹。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确计算的欲望与上文“按劳分配讨论”所提出的不可“锱铢必较”的看法形成耐人寻味的对照。孙冶方对于觉悟措辞之无力的确认，难道不是在暗示，现实的经济生活自身恰恰在生产一种抵消的力量，一种另类的“觉悟”？孙的言说从根本上动摇了王亚南所谓“三驾马车”——社会主义基本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价值规律[57]——之间的平衡，而以“价值规律”为真实的客观规律。但是，这种以准自然规律来理解经济活动及其运作法则，却可能会不断强化“物”的逻辑以及“人”自身幽暗的一面。或者可以说，这里在呼唤着一种更加深刻的辩证法，即在主动性与被动性，在“唯物”即立足于事物内部关系与“觉悟”之间找到一种中介。“社会

56　孙冶方：《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研究》1959 年第 9 期，第 53 页。

57　参看王亚南：《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人民日报》1959 年 1 月 17 日第 7 版。

主义经济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就不能是传统意义上的“规律”概念。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副岛种典在同一时期对苏联经济学的批判在此值得征引：

> 我丝毫也不想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不过必须指出，上面的那样的流行的说法忘记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是在各个资本家要攫取最大限度剩余价值的盲目行为中，自发地发生作用的，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是在认识了那些客观经济规律的人们自觉地、合乎规律的行为中起作用的。第二，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并不是从资本家手里把生产资料夺取过来、宣布了国有化，它就开始起作用了。从资本家那里夺取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更正确地说，是它的先进分子），还必须以该生产资料为基础，来建立自己新的社会共同体。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问题不外就是建立新的社会共同体，并不断加以整顿、改进、使之更加完善。[58]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必定是新的社会共同体“自觉”后的产物。客观经济规律一定是受到人们有意无意的经济活动所形塑的。所谓“规律”只是指明，社会共同体的实践一定会对个体产生某种强制性，以及未必运作于个体的自觉层面。当然，这还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设想。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但包含了这种新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计划来实行），而且残留着旧的惯性；它本身表现为一种矛盾的构造。“市场”是此矛盾的核心表达之一。也可以说，它正是“价值规律”运作的现实空间，也成为可感的矛盾的空间。在1950-70年代，其形态之一即“集市”等机制的存在。这也是从文艺实践切入激进时代“心物”问题的根本前提。

58　副岛种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00页。

《热风学术（网刊）》稿约

1 本刊为立足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和思想议题的文化研究类刊物。这一立足，不仅是指聚焦于中国的当代性，关注中国问题，解析这一快速变动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更是指，在“亚际”、“第三世界”、“全球”等这一系列既是历史又是虚构的框架的选择和比照之下，重新放置和结构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和思想议题。

2 为保持文化研究的野气和灵气，本刊对来稿有两个“不在意”。一，不在意是否一定写成论文模样，欢迎以生动、恰当的文体形式，呈现“问题意识”和清晰思考的文字。二，不在意是否一定是首发稿，提倡各个友邻刊物和网站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推广。

3 在此共识之上，本刊欢迎各类来稿，来稿请注明是否首发。凡首发稿一经采用，即奉薄酬。其中，“专题”一栏为特约组稿栏目。如有专题的组稿建议和想法，欢迎来信，来信请注明“专题”字样。

4 来稿请用word文档发送至《热风学术（网刊）》邮箱（refengxueshu2017@163.com）。本刊会在收到稿件的一周内确认收到投稿；并于收稿后一个月内，回复作者是否用稿。

5 来稿一经录用，除在本刊刊登之外，也将在当代文化研究网及其微信公共号陆续发布。同时，本刊拥有授权友邻刊物和网站共享的权利。

6 为促进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和世界同行的交流，“当代文化研究网”将在当年的的《热风学术（网刊）》中选取优秀的文章（每年4篇左右），翻译并上传当代文化研究网的英文网页“文章”栏目，供对相关议题感兴趣的英文研究者和读者阅读。

封面故事：《现实与穿越》

这是难得的阳光充足的一日，天气暖得让人想要在草地上打滚儿。

E 是一个快递小哥，这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月月满勤的他谎称自己生了病，破天荒地跟公司请了半天假。不明就里的领班也没有多问，只是在电话里简单地应允了一声，顺便嘱托 E 若是有事可随时联系帮忙，便草草地挂断了。E 知道，在像 S 市这样的大城市里，人人都要为生计奔波，没有人会有太多的闲暇来关心旁人。即使是像领班这样的好人，他对 E 的关心，也总让 E 觉得隔了点什么。

罢了，不去管它了，既然已经冲动地请了假，便想想怎么安排这奢侈的半日吧。

疲惫的身体倒是让人想睡，可是用这忙里偷闲的半日假来睡觉实在是太过浪费了。去网吧？倒也跟着朋友去过几次玩玩游戏什么的，可总觉得没什么意思。看电影去？倒是挺喜欢的，可是自己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看总是让人想睡觉的，去影院看每次几十块钱的门票又实在让人心疼……

忽然，E 想起来了前几天在看的小说，今天太阳这么好，不如到前街公园去晒晒太阳看看小说也不错。一路上，E 便回忆着之前看过的情节，就这样想着想着，前街公园也便到了。E 来到了那个他时常待着的地方，那是一棵枝桠纵横的榕树，下边有一个石凳。E 曾经躺在石凳上看了好几部网络小说，什么《斗破苍穹》、《鬼吹灯》之类的都是他喜欢的。不过，他现在在看的这个写的是一个穿越的，——唉，要是自己也能穿越就好了，要是自己变成了快递公司老板，一定要多给大家发点钱，尤其是领班……

这样想着想着，在暖暖的阳光的沐浴下，E 竟然睡着了，而当他再次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

热风学术网刊

主　　编 _ 罗小茗

学术编委 _ 雷启立　孟登迎　潘家恩　朴姿映（韩国）　滕　威　章戈浩

责任编辑 _ 王欣然　　美术编辑 _ 刘 睿　　编辑助理 _ 李许涛

《热风学术（网刊）》来稿邮箱　refengxueshu2017@163.com

本刊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 15 日上线。

版权声明：自由转载 - 非商用 - 非衍生 - 保持署名。　creative commons

请登陆“当代文化研究”网 -“网刊”栏目，下载《热风学术（网刊）》杂志：

http://www.cul-studies.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47

热风学术期刊

扫描二维码，回顾往期。